

K250.6  
31  
237

# 革命史资料

1982.1.1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二·北京



A769753

**革命史资料**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限国内发行〉**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北京市西城区广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11月第一版·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20×1163<sup>1</sup>/<sub>32</sub> 印张：7<sup>2</sup>/<sub>16</sub> 字数：184,300

印数：1—15,100册 定价：0.84元

统一书号：11234·60

# 目 录

- 关于反对“罗明路线”的真相** ..... 罗 明 ( 1 )
- 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一次  
重要指示的前前后后** ..... 朱仲丽 ( 29 )
- 和王明一次不欢而散的谈话——斯大林  
    召见——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  
    ——路途遇险——王明的无理要求——六  
    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
-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 袁 光 ( 43 )
- 往返于津沪之间的秘密使命** ..... 周仲英 ( 61 )
- 转战清河易水边** ..... 帅 荣 ( 80 )
- 新世纪剧社** ..... 傅 铎 ( 98 )
- 湘西岁月** ..... 何宣太 ( 110 )
- 马家坪歼敌记** ..... 马兆祥 ( 126 )
- 陶铸同志率领我们抓匪首** ..... 朱林光 ( 137 )
- 狱中生活** ..... 李沐英 ( 144 )
- 回忆旅法华人大会** ..... 沈沛霖 ( 165 )
- 党的优秀儿子——鲁生烈士** ..... 许 杰 ( 168 )

## 日 记

张子意同志长征日记片断 ..... (175)

## 专 访

难以忘却的往事

——访李德生同志.....本刊记者 石肖岩 (199)

## 综 合 资 料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高 军 (203)

“团结御侮文件”及其产生

经过.....金立人 陶德民 (230)

# 关于反对“罗明路线”的真相

罗 明

（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三三年春。正当第四次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刚刚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sup>①</sup>，认为省委已经“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二月二十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开展了起来。

同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局的代表在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对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报告，会议还作出决议，说“会、寻、安三县过去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领

---

<sup>①</sup>“闽粤赣省委”实为福建省委。

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就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还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四月十五日又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发表了所谓《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的所谓“罗明路线”。因此，这场斗争由福建发展到江西，由党内发展到团内，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之中，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这场斗争已过去四十八年了，而且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作了结论。这里，我仅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历史的回顾。

发动这场斗争不是偶然的。当时，我是中央苏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并不是因为我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提出了一条什么新的路线，而是因为我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一样，从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中，深切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提出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是因为我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对福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所作的指示，并从当时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紧急措施，抵制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做法。

他们在批判我的文章中，讲到所谓形成“罗明路线”的历史根源时，说我“在立三路线时代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说我“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

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闽西在罗明同志这一长期的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事实的真相怎样呢？现在让我从有关福建闽西工作的实际情况说起。

大革命开始后，福建西南部在两广区党委领导下，一九二五年五月中于厦门建立共青团的组织，一九二六年二月建立党的组织，派了二个党员去闽西工作。九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办的全国农讲所学员毕业，在北伐军入闽时，福建九人被派回闽西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

一九二七年一月，漳州成立闽南特委，领导厦门、闽南和闽西工作。我任特委书记。四月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特委估计事变将波及闽西，决定我和罗秋天前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四县指导巩固发展党和农运工作。七月间，党中央从武汉派陈明等同志来漳州闽南特委工作。特委又决定我去闽西迎接南昌八一起义军。九月中，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先后来上杭，要我和地方组织做支援大军的后勤工作，并要我们部署闽西各县的武装斗争。在“八七会议”、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等伟大事件的精神和实践的指引影响下。我们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四县采用建立农村据点包围县城的部署进行五个多月的工作。十二月间在漳州成立福建临时省委（后迁至厦门），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组织，我任宣传。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我从闽西回厦门，省委推我任书记，陈明改任宣传。三月九日平和县农民以长乐乡为据点，在县委朱积垒同志领导下，举行攻占县城的武装暴动。这是福建省农民武装斗争的第一炮。省委立即讨论和加强对平和和闽西各县的领导。

四月上旬,我和许士森、孟坚二同志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大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并作出了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进行斗争的指示。

此后,刘乾初同志任省委书记。闽西在省委和各县委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阮山、陈正、曾牧村、蓝为仁、傅柏翠等同志领导下,龙岩、永定和上杭三县继平和之后,于四、五月间先后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县联成游击区,成立闽西特委,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

我于十一月由苏联回国到达福建福州,省委召开扩大会,由我传达“六大”决议,并决定我到厦门和前往闽西游击区进行传达。当时闽西特委召开扩大会,由我传达“六大”精神后进行讨论,并部署游击区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

我还由三县游击区到上杭和长汀两县城参加地下组织会议进行传达和部署工作。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下旬回厦门。刘乾初同志已调外省工作,我奉命接任省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后来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而开创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从三月中旬起三下闽西,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并在上杭古田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极为重要



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使杭、永、岩游击区逐步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从此，闽西的武装斗争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但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诬蔑毛泽东同志等领导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什么“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下令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同时，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那时，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长回来传达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但我和王德同志等省委多数同志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发动武装暴动，也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进军东江，我们把意见上报中央，因而被指责为“右倾保守”；以后，我们虽然保留不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由于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成立行动委员会，在城市于夜间搞飞行集会等指示，犯了“左”的错误。同时由于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长回闽西传达中央关于闽西苏区划归广东，红军向东江出击的决定，结果红军出击三次，每次都受强敌截击而被迫后撤，使闽西苏区和红军遭到了重大损失。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奉调去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了临时中央，从而开始了历时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期。王明路线是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

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重复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和很快“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纲领。为此，要求“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实行总罢工，在苏区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以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这就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而提出的一条所谓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我到达上海时，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由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找我谈话。奇怪的是，他认为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错误，却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威胁说不承认路线错误就不分配我的工作。

在这前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和红军，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二年春，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江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临时中央却诬蔑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排斥了他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广东省委派邓发同志到闽西苏区传达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决议，并成立闽粤赣边区特委，邓发同志任书记。四中全会后，由于受到王明路线的影响。特委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犯了分兵守口的错误，在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损失。特委和政府机关被迫从永定的虎岗撤退到上杭的白沙。我于一九三一年四月被派到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长，

特委为保卫“虎岗”，决定派我到永定边区参加游击战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我和张鼎丞同志率领红军独立团在上杭、永定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间，闽西主力红军攻占汀州后，根据中央苏区前委指示，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由卢德光任书记，在他假称奉中央命令出外联系工作带巨款逃跑后，前委命我接任临时省委书记。这时临时省委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以汀州为中心，西向武平扩大，东向连城、新泉扩大，北与宁化、清流连接，南至饶和埔游击区，使闽西苏区扩大达十余县，并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成了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我任省委代理书记，张鼎丞同志任政府主席。四至六月，闽西苏区又配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主力红军攻占漳州并胜利会师，这对巩固闽西根据地和为第四次反“围剿”作好物质准备起了重大作用。这时闽西苏区的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大军，疯狂地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主力红军迅速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驻漳州的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很快的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陈济棠的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沙等地攻击。而我们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三千人。因此，闽西的情况，尤其是上杭、永定、龙岩边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闽西苏区党和人民的面前。

正在这个时候，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斥的毛泽东同志，在汀州傅连璋同志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他仍时刻关怀着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安危。那时，我因奉命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八月间得到好转后，毛泽东同志就找我谈话。他总结概括了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的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同志，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决定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同志主持省委工作。

我所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都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同志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们路经上杭白沙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我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说没有听到传达。他们对此很不高兴。他们还问我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去年四月十四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当时，我和许多同志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都很不理解。

他们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独立团独立连的配合，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确有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受了我们三次重大打击之后，遂集中几团兵力，三路配合进攻上杭的中心点白沙。我们按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照前次的经验，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沙。我们立即进行紧急动员，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围白沙，打击敌人。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打击和迫使敌人退出白沙。我们召开县级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随后，我们又和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同志一起开会，总结贯彻毛泽东同志指示五个多月来游击战争的胜利经验和分析当前斗争形势和任务。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里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边县边区参考。因此，会后我连夜赶写关于上杭、永定

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给省委。在此之前，我于一月二十一日亦到新泉了解情况，听知汀东的地主武装很猖狂，经常攻入苏区，还袭击我们长汀县委所在地河田。我从第四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显然，这个报告和意见违背了王明“左”倾路线的要求，因而后来成了所谓的“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例如：我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开头就写明对杭、永、岩工作另作报告。只提出对汀、连工作的意见，要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目的分明：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击敌人的“围剿”；二是防止驻龙岩的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硬说我“没有一句话说到闽西原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说“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苏区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的”。为此，他们说我们“退却逃跑”。这完全是违反当时的事实，断章取义的。这真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瑞金不久，就派出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他首先抓住我给省委的报告和意见，断定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直至红军长征，这一斗争才告结束。

## 二

我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二次写给省委的报告和所提的意见，以及当时闽西杭、永、岩反“围剿”斗争的实际情况。现在根据我的回忆，主要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我拥护、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建立、巩固

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路线。实际证明，根据这条路线，总结三次反“围剿”战争经验，对第四次反“围剿”所作的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抓着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闽西杭、永、岩苏区于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路线的影响，采取“分兵守口”以致被迫退出虎岗，是绝对错误的。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运动战，在朋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正确。

第二，总结了五个月来在杭、永、岩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中主要的运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第一次由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第七师，集中优势兵力，夺回了被漳州和广东敌人占领的永定县城，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以后由县独立团配合地方武装，又打退了敌人对合溪的进攻；第二次，驻上杭县城的广东敌人以一个足团的兵力进攻白沙。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距离白沙十几里远的山区隐蔽。晚上袭击进占白沙的敌人，使敌人吃坐不安，三天就退出白沙，我们地方武装进行追击和沿途截击，敌人死伤多，狼狈逃回上杭城；第三次，驻永定县城的敌人十九路军一营人，配合地主民团来进攻白沙，我们地方武装于中途利用地形伏击敌人，敌人死伤多，只好从山路逃往龙岩。上列三次对敌人打击的胜利，使地方武装和广大干群受到鼓舞，使他们更加相信游击战争

打击敌人的威力，更加相信游击战争能够打击敌人十九路军，保卫杭、永、岩和牵制敌人向苏区内地进攻。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于猛烈扩大主力红军，迫得边区各县把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连人带枪编入主力红军，新的地方红军还未能及时成立，就在此时，敌人乘机向我们各边区进攻，致使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和恐慌。到了二月下旬龙岩和永定县城的敌人十九路军和上杭县城的广东军阀部队配合，以几个足团的兵力向我们上杭县中心区白沙进攻，我们估计敌人较强，就照前次的经验退出白沙，县各机关退到上杭旧县，并动员地方武装包围白沙，向敌人袭击，决心不断打击敌人迫使敌人退出白沙。当时我们上杭中心县负责同志开会总结游击战争经验和部署工作后，我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杭、永以及闽西党委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他力量），很艺术的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是要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这是当时边区实际斗争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由于不加区别地在杭、永、岩搞“猛烈地扩大主力红军”，把地方武装整团整连整排连人带枪编入主力红军。赤卫队一时得不到地方武装的配合，眼看着敌人对苏区的破坏，群众的生命财产、粮食和耕牛受到损失，而不能及时给予有效的打击。本来游击区在敌人不断进攻的情况下，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是常事，但是由于以上原因，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应有的特殊恐慌，给我们的动员发动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目前杭、



永、岩党的最中心的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效的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对斗争的情绪和战胜敌人的信心，才能使群众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我在报告中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很显然这是我所反对的那种脱离客观现实离开武装斗争这一中心的空谈。至于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我和大家一样是极为尊敬的。但当然革命领袖也不是神，我们如果离开客观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客观规律开展武装斗争。同样也不能获得成功。

第四，在闽西的整个斗争部署上，提出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将新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的主力向北发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连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向发展。这样，一是可以巩固闽西苏区的后方，威逼十九路军不敢向汀州、瑞金进犯，使中心区免受威胁；二是能够和江西的广昌、宁都一线的中央红军相策应和配合，牵制从北面向苏区进攻的敌人，三是能威逼和打击进犯新泉、汀连和上杭白沙的攻人，使杭、永、岩避免陷于孤立，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顾此失彼，暴露弱点。此外，这一带团匪的力量较弱，目前还没有得到白军的配合，容易消灭，在斗争中，可以使这一带的地方武装得到锻炼，增强战斗力，以便很快地能与来犯的白军打仗，而且可以及时做好应付敌人进攻的群众发动工作，如果失去这一有利时机，这一带团匪得到了白军的

配合，就会在我们的后方和侧翼进行捣乱，增加我们的困难，象过去那样处于慌张应付的状态。

第五，各边区在开展游击战争中，地方武装要有基干队伍为核心多参加实际作战，从作战中锻炼。苏区内地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和比较能打仗的部队一起参加战斗，通过实践来学习战争的经验。要向外推进，先抓住较弱的团匪进行打击，然后就能更好地同白军作战。不估计地方武装的力量，一开始就硬打强敌是错误的。

第六，在扩大红军方面，要加紧动员迅速造成能战的主力，使目前两个师扩大成三个师，但扩大主力红军，边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应以长汀等苏区内地为中心和重点。因为长汀等县是新区，人口多，目前还没有与敌人直接作战，有利于进行动员扩大主力红军，请省委抓紧时机进行动员，多帮助长汀等县进行这一工作。由于边区边县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扩大主力红军比较困难，特别是杭、永、岩，是老区，于一九二八年夏秋间就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三县游击区，在长期斗争中，绝大部分青壮年已参加了红军，一部分青壮年和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参加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和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此外，是老弱妇孺。在敌人进攻和摧残下，很难大规模地扩大主力红军，但群众愿意参加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这些边区边县应先抓紧时机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它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从地方武装中逐步抽调力量去扩大主力红军就比较容易了。但不能再整团整连的连人带枪硬编。这是适应目前群众斗争的情绪和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第七，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对各县区的工作，为贯彻执行党的整个任务，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等具体情况，找到各县区的具体任务，过去党和政府的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采取一样的方法，一样的计划，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地上下层讨论，简单地作政治动员，机械地分配扩大红军的数字，这是不好的。

第八，在财政方面，杭、永、岩边区是游击战争环境，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员的生活无法维持。

上述报告和意见，是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时，自己作为福建省委和杭、永、岩的主要负责人，完全出于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提出自己的意见，按照组织原则由内部向省委报告，但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却把报告和意见视为大逆不道，大兴问罪之师。他们不看基本精神和事实，却采取断章取义，抓住一些片言只语，就给我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

他们从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贯彻其急于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进攻路线”出发，不区分中心区和边区的不同情况，一律要求猛烈地扩大主力红军。在我如实反映他们这一政策在边区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后，他们竟不顾事实，反而指责我错误估计形势，反映了“地主豪绅”和“富农”的情绪。诬我反对扩大主力红军，甚至我反映边区因避免暴露，“少先队

不戴少先队帽，妇女装假发（原先剪短了，国民党军队来后看见短发要抓要杀），用布包头，恢复旧装”的情况，也被他们说成是对工农群众作了“惨淡黑暗茫无前途的描写”。我在报告中明明指出，如果在杭、永、岩不抓住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根本，就请斯大林、毛主席等领袖来演讲也解决不了群众斗争的情绪问题。但是，他们却不顾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句话的重要前提，抓住后半句对我进行攻击。因此，他们得出结论，“罗明路线”是一条“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不了解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更不了解当时闽西主力向北积极行动，才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进攻的敌人，巩固后方，使杭、永、岩免受孤立，使汀州、瑞金免受威胁，并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要求各地分兵把口，硬打硬拼，这样才符合“进攻路线”。他们也根本无视我主动到杭、永、岩领导游击战争，无视我在报告和《意见》中反复陈述要在杭、永、岩坚持游击战争，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向北积极行动的建议，“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甚至进一步推论说罗明“所以主张向汀、连一带发展，不外是因为这一带只有团匪没有白军的缘故，如若白军一来，那当然只有像杭、永、岩一样又是逃跑了”。所以，他们说“罗明路线”是一条“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不懂得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只是空喊口号，照抄外国的经验。他们根本不顾中国革命的条件和苏区特别是边区斗争的具体环境，不仅要在苏区实行义务兵役制，搞红军的所谓“正规化”，机械地分配

扩大主力红军的任务，而且还要普遍搞什么拥苏、反帝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的“正规化”的群众团体。而当我提出反对千篇一律的简单化的政治动员，要找到适合地区特点的特殊任务，特别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主张边区为适合战争环境，精简一些机关团体，以利集中精力领导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攻击我们反对政治动员，取消党的领导，犯了“取消主义”的路线错误。

以上就是当时在全党进行批判的所谓的“罗明路线”的主要内容。

### 三

发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我是在上杭看到《斗争报》才知道的，后来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赶回汀州。

途遇张鼎丞同志从汀州来，我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说，他们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我说，我们工作上有许多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如果路线错误，为什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根据地能得到这样快的扩大？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区应有所区别，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那里是什么路线错误？谈到这里，两人对坐无言，十分愤激。

我回到汀州，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往瑞金进行检查。到瑞金后，中央局几个干部找我谈话，批判我的“错误”。接着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同我谈。我说，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县边区参加游击战争，为何说是“退却逃跑”呢？他们说，从路线上说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

发展的，例如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打就变成“游击主义”了。他问我，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我说，边县边区要进行游击战争，随时打击敌人的进攻，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采取三分之一的方法，逐步地分批地扩大主力红军。他当即武断说，这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我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进行反驳，列宁说：“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后来，中央书记和我谈话，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会上进行检查。

我在瑞金期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不能自由进出。有一个晚上，就在附近召开了一个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高呼口号，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揪我出去批斗，并高呼要把我枪决，后来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上台讲话，作了解释，气氛才平息下来。

福建省委于二月二十四日在汀州召开的省临时代表会，开展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员参加，福建省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会上作了检查。会上虽然对我进行了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讨论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说，毛主席号召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同志和我们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估计得很准确，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如果各区乡切实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受到更大的伤亡。当时中央代表插话说，“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没有什么奇怪的”。上杭、永定的代表坚持赞成采取三分之一的办法逐步分批扩大主力红军。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同志的新泉县委书记的职务决定。杨文仲同志也曾经给省委写报告，汇报了新泉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写报告和报告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把杨文仲同志说成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并且怀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光明磊落，彼此只有革命工作关系。杨文仲同志被批斗后调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

正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我们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周恩来、朱德同志和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导同志，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行不通，所以坚决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原则，诱敌深入二战宜黄，

缴枪万余，继续追击敌人取得了胜利。主力红军还在闽西连城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收复了连城、清流、宁化等大片地区。但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反以为是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往往采取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不仅对我，而且对其他省委负责同志也是这样，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着张鼎丞同志的鼻子说：“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也要“用铁拳进行粉碎”，“无情打击”。特别是当时是在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之后，突然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人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份子”。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许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我和其他犯了“罗明路线错误”的同志接近。

当时，参加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志，不少并不真实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省委派李明光、黄宜章、张恩垣等同志到前线去开展这一斗争。当他们了解情况后，反倒同情起“罗明路线”来了。有的随随便便应付了事，回去交差；有的抵制了这一斗争。例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军区政治代主任李明光同志不愿在连城前线开展这场斗争，在错误路线压制下，不能打游击战，因而在同敌人硬拼硬打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会。这些党的优秀



干部，都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受害者。特别像李明光这样的同志是值得党和人民永远怀念的。当时群众把连城县改为明光县。

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们还贯彻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例如，福建省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同志，由于不愿检查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在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并撤销了军区的一切职务。张鼎丞同志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而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同志是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广州全国农讲所毕业的学员，是龙岩党组织主要的创始人，说他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不断遭到打击，经斗争后先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后来又调到一个地方去领导几十人修筑工事，最后把他调到军区当勤务员的教员，以后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病逝。省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同志和省团委书记陈荣同志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同志，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同志，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同志，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同志，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同志都被调离了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其他县区的领导干部，也不断的受到批斗撤职，如永定县委的罗禄山、关坤林等同志，武平委书记陈玉梅同志，汀东县委的玉珍、熊丁州等同志，都受到打击或撤换。总之，“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各级干部大受其害。



我被批斗撤职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不久，《斗争报》又发表了一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和江西省委，并要求把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看后问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我没有到江西工作，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回答说：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可见，王明“左”倾路线发动的这场斗争，决不是个人的问题，也决不是局部地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中央苏区和全党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

#### 四

这场斗争，实质上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路线得以在整个苏区全面贯彻。

很清楚，他们可以撤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无法撤销为实践证明了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深刻影响和崇高威信。尽管他们诬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是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奇怪得很，在苏区还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套办法灵，而王明“左”倾路线那一套就是行不通。正因为如此，他们必欲在整个苏区进一步开展一场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执行这一路线的干部的大讨伐，而反对“罗明路线”只不过是公开打出的旗号而已。

他们在批判我的文章中就明白地宣称：“毫不迟疑的、坚定

的同罗明、杨文仲等的机会主义路线做斗争，是我们党顺利执行进攻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在批判邓小平等同志的文章中也写道：要“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边县党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其报告中也谈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

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把毛主席称作最好的领袖之一，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此大为恼火，对我说：你为什么把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相提并论？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又讽刺又挖苦，说：“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这难道仅仅是骂罗明吗？当然不是。

再来看一看他们批判我的一段话，也是寓意深长的，他们写道：“他（指罗明—引者注）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的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一贯的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对于闽西群众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大红军一来，他立刻高兴的发狂，大红军一去，他立刻失望得哭泣。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红军占领汀州，罗明跟着卢德光立刻抛弃了原有根据地，把省委搬到汀州，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东下占领漳州，罗明又发疯般地把省委一切工作丢开，随大红军同到漳州，至于如何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如何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巩固党的领导作用，如何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巩固与扩大苏政权，如何在

发动群众积极性的上面扩大地方武装，创造铁的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国民党的进攻部队，一切这些问题，在罗明同志看来始终是次要的，罗明同志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在，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是毫不足怪的”。这不仅是歪曲事实，而且是别有用意的。

所谓“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之一，是“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但是，我在《意见》中明明写着要“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这点他们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一贯的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那么又怎样说明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不断获得发展和壮大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单单挑出的两次军事行动作例子，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闽粤赣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决定闽西红十二军进攻汀州。虽然我没有参与作出这一决定，但我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次反“围剿”相配合的作用，当时我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起随红军独立团行动，在永定、上杭进行游击战争，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向白区新泉进击，占领了新泉。红十二军占领汀州后，进攻杭、永、岩的敌人受到我们地方武装的打击，已经退走了。那时，前委决定把闽粤赣边特委改为省委，是通知我和张鼎丞同志回汀州的，卢德光带款向外逃跑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红军前委命我接任省委书记的。当时省委抓住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形势，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不仅使杭、永、岩老区大部恢复，而且扩大了许多新区。向东扩大到连城、新泉，与宁化、清流等县相连，向西扩大到武平，向南扩大到平和、饶平和大埔游击区。闽西根

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后，省委不仅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而且还在新老区动员了大批青壮年扩大中央主力红军。毛主席曾先后三次去调查的上杭才溪模范乡，当时就是扩大主力红军最多最好的典范。这怎么能得出我“抛弃原有根据地”的结论呢？

一九三二年四月，因中央红军久攻赣州不下，中央在江口会议上决定把红军调往福建攻打敌人守备较弱的漳州。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到了汀州后，通知我召集福建省委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上述领导同志外，还有省委常委张鼎丞、刘晓、谭震林、郭滴人、李明光和其他省委负责同志。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分别作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作战部署和省委如何做好政治动员、供应粮食、组织运输、地方武装配合行动等的指示。会后，我陪同周恩来同志到长汀县地区检查准备动员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同志亲自打电话给省委要我随主力红军行动，以便与漳州厦门地下组织联系及时做好配合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指示，做了许多工作，积极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在取得了攻占漳州，消灭张贞伪师的巨大胜利后，我们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做了开辟新区、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开展抗日宣传，向中央苏区运送缴获的军事物资等工作、所有这些算不算省委的工作？我们跟随中央红军攻打漳州究竟错在那里？

他们所以这样毫无根据地对我横加指责，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军事行动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或者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违背了他们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我的“错误”不在于“抛开原有根据地”和“丢

开省委的一切工作”，而是在于我拥护这两次军事行动。他们拿这两次军事行动来攻击我，这倒是“毫不足怪”，其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

事实上，他们曾经给毛泽东同志扣上的什么“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古脑地扣在我的头上；同时，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福建闽西根据地，而且在整个中央苏区展开，还扩大到各苏区和全党，这就清楚地表明，这场斗争是他们早已开始的反对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继续和深入，是他们全面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手段。

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

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党。”

由于通过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把执行以毛主席为主要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打下去，就使得王明“左”倾路线及其一系列“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以进一步的全面的贯彻，结果使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为了如实地讲清楚事情的真相，不得不涉及了一些人物，包括当时处于中央主要领导地位并直接领导这场斗争的同志，就个人来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怨，他们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也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旦认识了错误之后，他们就坚决站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为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愧是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 and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另外，这场斗争年事已久，今天来进行追述，难免会有重大的遗漏和错误，我诚恳地希望了解这一事件的同志们共同加以研究，给予指正。



# 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 一次重要指示的前前后后

朱 仲 丽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一九三六年年末，党中央为了照料王稼祥同志虚弱的身体，彻底医治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腹部受到的重伤，决定送他到苏联医治休养。经过辗转，王稼祥同志抵达上海，由宋庆龄代为办好护照，乘坐开往海参崴的永苏客轮，转火车进入了苏联国土，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和雅尔塔附近的治疗休养，使稼祥同志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好转，特别是他在长征途中腹部伤口外伤性急性腹膜炎留下的毛病，经过手术，得到了较好的愈合。这时党中央考虑到稼祥同志担负的重任和他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同意共产国际的决定，由他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认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往的重要事宜，工作情况总的来说是顺利的。

## 和王明一次不欢而散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初，王稼祥同志刚刚从南俄疗养地返回莫斯科高尔基街的住处，苏联同志尼古耐夫告之，王明马上要会见他。稼

祥同志听后怔了一下，王明他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前无来往，这时他要见我干什么？稼祥仔细考虑了一下，便驱车前往共产国际的所在地。

见面之后，王明肉麻地吹捧了一番稼祥同志，接着恬不知耻地得意地说，他已由东方部副部长升为共产国际执委了，原来的西方部、东方部机构已全部取消，他除了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之外，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和东方各国党的工作。米夫，现在已属于他部下的工作人员了。王明自我吹嘘了一番，又天花乱坠地大谈所谓的“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我们可以在公开合法的政治局面下发展自己的队伍，又可以和蒋介石来第二次携手同行了。”什么“只要蒋介石抗日，我们就听他的。”还说什么“蒋介石抗日，我们就可以绝对服从。”等等。王稼祥同志听了十分反感。

说着说着，稼祥同志见王明的意图已露了出来，原来，他是想探听国内革命的形势，企图从稼祥同志口中了解具体详细的情况。稼祥同志听后，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热情地对他说：“你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犯了许多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希望你认真检讨一下。”对于稼祥同志的劝说，王明毫无认真对待之意，他借口不在国内，百般抵赖由于他的“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稼祥同志转而盛怒，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任军事顾问的？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李德为什么有此大权指挥军事工作？王明却推说没有给过指示，也不承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

由于话不投机，王明的意图没有得逞，又厚着脸皮吹嘘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器重他。根本不谈他历

次所犯的错误。最后王稼祥同志说，我和你谈到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代表了党的！是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的！告诉你，毛主席还在耐心等待你！话音一落，王稼祥同志拉开房门，大步地走了出去。

和王明的谈话算了结了，但稼祥同志感觉到，随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人民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王明这个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家伙又要蠢蠢欲动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

### 斯大林召见

果然，没过多久，尼古耐夫来看稼祥同志的时候，顺便告诉他，王明等人要回国去了。尼古耐夫说：“根据最近消息，中国人民对陕甘宁边区热情地向往，青年到延安去的一天天多起来了”。他又说：“我已从内部得到消息，我们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最近有可能接见中国同志，王明、康生、邓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就是你一个，请你准备一下。”

听说斯大林同志要召见，稼祥同志的心情十分激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斯大林同志了，他不顾素来不喝酒的习惯，和尼古耐夫各斟满了一杯葡萄酒，为祝贺能有这次会见，祝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热烈干杯。

当晚十一点钟，稼祥同志刚要就寝，尼古耐夫突然闯了进来，对他说：“今晚你必须迟睡觉了，斯大林同志就要召见，我们坐着等待消息吧。”

今晚？时间来的太快了！“今晚我以兴奋的心情去拜见苏联人民爱戴的、全世界人民尊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我很幸福。”

稼祥同志按照国外不可缺少的礼节，向尼古耐夫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尼古耐夫迫不及待地冲上前，一把把电话筒抓起来。只听他回答说：“是的，十一点半，懂了！好！”放下话机，他拈手看了看表，兴奋地对稼祥说：“十一点半见！十一点半见！现在还有不到半小时，十一点一刻准备好汽车，一刻钟就能到克里姆林宫。”说着，他已经拿起大衣，向着稼祥大声说：“我先到停汽车的地方等你！”

稼祥急忙整理衣装，他把一件熨平的白衬衫穿上，又整理了一下外罩的西装，匆匆忙忙对着镜子照了照，接着刷亮了皮鞋，便赶紧往外走去。

这次被接见的共有四位中国客人，王明是其中之一，他显得踌躇满志。

斯大林同志，时年四十七岁，他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是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家，是一个神采奕奕的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侧房里走出来，身穿深灰色西装，结着黑色领带，身材十分魁梧，嘴唇上边留着两撇独特的胡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身体发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

中国客人都站起来迎接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热烈握手之后，斯大林同志用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自己坐在正中间的沙发上。他先朝稼祥同志看了一眼，第一句话就亲切地问：“你是从中国来莫斯科的王稼祥同志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稼祥尊敬地点头回答。

寒暄之后，为了使客人们不感到拘束，斯大林同志风趣地说：“你们的俄语说的很好，节省了我们翻译人员的劳动了。”

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

“中国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现在有多少军队？”斯大林同志向着稼祥同志关心地问。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红军遭到严重创伤后仍然坚持到了陕北，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稼祥同志认真地回答。

当斯大林同志听后沉思的时候，王明马上插嘴：“还有三十多万人。”

稼祥同志毫不客气地当即纠正：“斯大林同志，是三万多，不是三十多万！”而康生却默不出声，暗中帮着王明撒慌。

斯大林同志发现他俩回答的数字不一样，当然是相信王稼祥同志的。他对大家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是战士，是真正的战士，首先需要的是能打仗的勇敢的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斯大林同志的吐音很清楚，言简意赅，点醒着在座的人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你们的抗日最近很成功。”听到这，稼祥同志很高兴，他不由自主地插话：“是的，我们毛主席主张积极抗日。民族矛盾已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他显然为了提醒大家。

大家在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季米特洛夫同志严肃地说：“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很正确，你们应该领会其精神。”

坐在沙发上的王明，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突然对斯大林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列宁学院院长卡沙诺娃包庇周文久、俞秀松等坏人，我特此向你报告。”王明谎造了一通“事实”，其实，他由于过去和俞秀松、周达文同志等人在莫斯科留学时有过争论，一直想报此怨恨。

斯大林问：“真有这事？”他严肃地对季米特洛夫同志说：“这事请你具体查清楚。”

当季米特洛夫同志回答之后，斯大林同志站了起来，他很认真地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接着，和大家热烈地握手告别。

这天夜里，稼祥的心里很不平静，他意识到毛主席已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威信，斯大林特意嘱咐问候毛主席是有深刻含意的。同时，他反复想了王明在接见时的一派胡言，他胆大妄为地隐瞒红军长征遭受损失的真相，是犯罪的行为。

不几天，在一次观看马戏的圆形厅里，稼祥亲眼目睹了王明和国民党将领张冲等人坐在一起，打得火热的情景，他几乎有些怒不可遏。他得知，那是蒋介石派来谈判苏联军援抗日问题的人员。王明靠上去，无非是想向国民党献媚。尼古耐夫对稼祥说：“王明在他们来时就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听说还要就军事谈判代表团的方便，与他们一块回国呢。”

### **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

一九三八年，原来准备早日养好身子，尽快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斗争的稼祥同志，受伤的病灶虽已长合，但由于肠子和腹膜粘连面积很大，还有一个较小的弹片留在腹内，需要一定时间观

察，才能确定是否再施手术，而被医生劝阻说服，继续安心留下。他除了工作、医疗外，还不断看一些有关世界工人运动动态的材料。

“五一”节到了！莫斯科还天寒料峭，雪花飘零，斯大林在红场检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外宾中有各国代表，王稼祥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庆祝全世界工人阶级节日的盛大典礼，他在想着，总有那么一天，中国人民也将在自己的首都庆祝自己独立解放的伟大节日。

稼祥同志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党中央，他准备在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前动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由季米特洛夫主持，邀请王稼祥同志参加。会上，稼祥同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说明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区别。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不会重犯陈独秀时的错误。这个看法被会议采纳了，并且讨论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交稼祥同志亲自带回国去，面呈中共中央。

临行前，季米特洛夫同志与稼祥及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代表任弼时同志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同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

人，不要再争吵了。”

稼祥同志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完全信服了。这是共产国际交给王稼祥同志的重责，回国后，必须口头传达这个精神。

稼祥同志笑容满面地与季米特洛夫同志告别。

### 路 途 遇 险

王稼祥同志带着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书籍，便马上动身回国了。

苏联的飞机将他送抵兰州，在中共兰州办事处休息了一天，一切准备停当，用三辆卡车装满了物资和一排押送的苏联战士，另外还有两个警卫员，两个机枪手护送稼祥。

汽车发动起来，便径直往东方驶去……

开始的路途是比较顺利的，稼祥把西装脱下，换上一件由兰州办事处给的白衬衫和军裤，戴上一顶军帽，他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红军的年代，回到了炮火硝烟的战场……，他盼望着早日到达延安……

稼祥他们一行继续东行，没想到，就在这天夜幕来临之际，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乒乓！”“乒乓！”几声枪响，在车队前边骤起。

“报告，枪声在正面，距离约二百米外，目标是向我们射击。”警卫员向稼祥紧急报告，大家一时紧张骚动起来。稼祥急令停车，他大声喊：“不要惊慌，听我指挥。”卡车关掉了车灯，苏联士兵在车上架好了机枪，其他人都将子弹上了膛。这时，



第一辆车上是那一排战士，第二辆车上是机枪，稼祥同志在第三辆车上。每辆车上都有五大口箱子，里边装满了各种物资，其中也有大批美金和法币，以及枪支和书籍。

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已经完全可以断定是一次袭击。

稼祥考虑到，这种袭击有两种可能，一是政治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有目的地行动；二是土匪行劫，因为这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想，无论如何，要保护党的机密和物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于夜色已覆盖大地，很难辨别别人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武器，形势显然对我十分不利。敌人的子弹开始纷纷落到汽车旁。

稼祥心急火燎，他命令还击，登时，机关枪和步枪纷纷吐出火舌。敌人也不甘示弱，用更密集的子弹射来，步步往前逼近。

由于人地生疏，又是处于遭到突袭的被动地位，因此，一阵对射后，稼祥发现车上的人在逐渐减少，枪声稀疏，他命令两个警卫员说：“你们赶快分头到车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一会，一个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第二辆车上几个机枪射手已经不知那里去了，有一个射手在那里直打哆嗦，我叫他开枪，他打了两下又停下来了。第一辆车上只剩下三个受伤的，都躺下了，其余的不在车上，情况不清，……”他没说完，另一个警卫员也跑回来，接上去着急地说：“首长，那些苏联战士，有的在路沟里，有的跑到田野里了，好几个都受了伤，……”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了前一个汇报情况的警卫员，他摇了两摇，倒在了黑幕中。糟糕！情况十分危急，不能再被动挨打了，稼祥在千钧一发之际，考虑到，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保护好文件和物资，一定要完成共产国际给予的重要

政治任务。需要动脑筋想计谋，把面临的不速之客稳住。

“砰”的一声，稼祥身前的汽车玻璃打碎了，他躲了一下，接着“砰”的一声，他的另一个警卫员又被击中，肩部负伤，贴在了车身。

很幸运，稼祥同志没有受伤。他边还击边不时换着隐蔽的位置，他发现，对方的枪声也稀落下来了。这时，他急中生智，冲着前面二十多米外的敌人大声喊道：“喂！前面是那个部队的？不要打枪了，你们是要钱还是要人？”这一喊果然起了作用，对方好象有些反映，稼祥为了不让他们有冷静思考的时间，又重复喊了一遍，他特意再加上一句：“喂！快说什么条件？不然我们后边还有大部队，你们小心！”他知道，这时候的胆大主动，是十分重要的。他的喊话完全会使对方误以为遇到了国民党部队。

“我们要钱！要东西！”对方的声音终于传来了，稼祥一听，悬起的心一下放了大半个，土匪，遇到了土匪，并非有预谋的政治暗杀事件。

“派一个代表来商量，当面谈判！”稼祥回答他们。

只见三个家伙提着手枪，缩头缩脑地走到了车旁，双方都打着手电筒，稼祥见他们头发蓬乱，胡髭拉茬，而三人却看不清对方只有稼祥一个人了。他们见稼祥是个书生样，穿的是军服，不象跑车的商人，车上也没有大货堆，心里冷了一半。有个傢伙粗声粗气地问：“钱在哪里？”说完打量了一下四周，就往一辆车上扒着看。

“你们找吧，好象在箱子里，可不知是哪一个”。稼祥冷静地说。他拿出一串钥匙，找到一把打开一个箱子，推到土匪面前让他们看，那是一箱书籍，土匪推往一边。稼祥打开第二个，里边

还是书，不过书下边有国民党法币伍百元。他是有意打开这个箱子的，意在打发走这些匪徒。

土匪见钱，分外眼红，立即装入腰包。稼祥关上箱子故意慢慢吞吞打开第三个，这里边也是书，还夹有衣物等东西。“你们随便看吧，刚才那个箱子放了钱，我马上给了你们……”稼祥有意这么说。可是，钱欲熏心的土匪只想要钱，他们用力推开稼祥，喊道：“你不要鸟斯文，给我动作快点！”黑黢黢的天，手电筒的光也极有限，土匪们又是外强中干，生怕后边部队跟上来，只用手瞎翻腾，顾不上仔细看。

当稼祥引土匪到第三辆车去的时候，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应该相信我的话，再磨菇下去，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我们是早开出的先头车辆。”这几句话柔里有刚，土匪们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们凑到一块，暗暗咬着耳朵。

稼祥想，要抓住他们紧张的心理，继续攻心。他计上心来，冲着土匪说：“我这里还有块手表，给你们吧！”说完，取下手腕上的表，一个土匪早已伸过手来，接过去，又放入另一个家伙的手心，看来，那是个头。

突然，那个头子喝令稼祥：“两手举起来，马上朝后转。”这一招稼祥一下没反映过来，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子，只听一个土匪小声地说：“把他毙了？”另一个声音回答：“不能打枪，要后边有队伍听声追来，我们几个还要命？快跑。”待稼祥转过身子看时，三个土匪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稼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重要文件和物资终于保住了。还能活着回去亲自传达斯大林和季米托洛夫同志的指示，真险！他四处寻觅同行的人员，可四处深一块浅一块，在荒野里，好不容易，

最后找到了那个负伤的警卫员和两个车子的司机。稼祥当机立断，把三个车上的东西集中放在两个车上，开车返回兰州。

车上，经过询问才知道，司机第一次参加战斗，所以遇到突如其来的情况就软瘫了；而随行的苏联机枪手，在和平环境里，没经过什么战斗的风险。

当夜，那些受伤的、逃跑的人员都陆陆续续被接了回来，大家总结这次遇劫的经验教训，觉得一是不应在傍晚动身，二是护送人员没经验；三是走漏了行动消息，而后一个是主要原因。

不便多在兰州停留，第二天一大早，大家照常起来，吃过早饭，整顿了一番，继续登上了征途。

车向西安开去……，路途再未遇到劫难，可经过劳山时，卡车又从山顶上翻了下来。王稼祥同志在车子里和同坐车的十几个人一样，幸而没有受伤，真是又平安地度过一大灾难。

### 王明的无理要求

稼祥到达延安了，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稼祥郑重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作了其它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主席。

当同志们得知稼祥同志回国后，都跑到王家坪他的窑洞里看望他，祝贺他身体恢复健康，也为他路途遇险未受伤害而庆幸。

这时，王明正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统战工作，仍在大肆鼓吹什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独立性。而且，他竟然放出谣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蒙蔽同志。他还未经过党中央同意，擅自用“陈国泰”的假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保卫武汉和第二阶段抗日

战争的意见》的文章，内容极为荒谬，一派胡言。

当王明得知王稼祥同志已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党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想，他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居然提出，要毛主席、党中央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自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由他主持党中央全会。

这是无理的要求和蛮横的态度，党中央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同志有力地予以驳斥，他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厚着脸皮函告王稼祥同志，请他速赴武汉与他单独会谈。

### 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

接到王明的信后，稼祥同志立即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这时他将王明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种种罪行再次仔细回想了一番，表示了对王明的深恶痛绝。特别是稼祥同志知道王明返国路经乌鲁木齐时还加害了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时，他万分的愤慨。他将王明的信交给毛主席后，严肃地请示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法叫他立刻回延安来！”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同志回到自己的住处，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稼祥同志指示机要部门立即

给武汉发去。

王明的阴谋失败了，他不得不收拾行装，从武汉到延安。后来，他装“病”了，据他自己说，患的是“心脏病。”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了，王稼祥同志为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口头传达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当“从中国等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几句话传到代表们耳朵里时，同志们异常激动，热烈欢呼，中国人民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终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了！王明，却象是挨了当头一棒！王稼祥同志终于完成了这个划时代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作者注：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他又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批判，使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了一个新的胜利！

#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袁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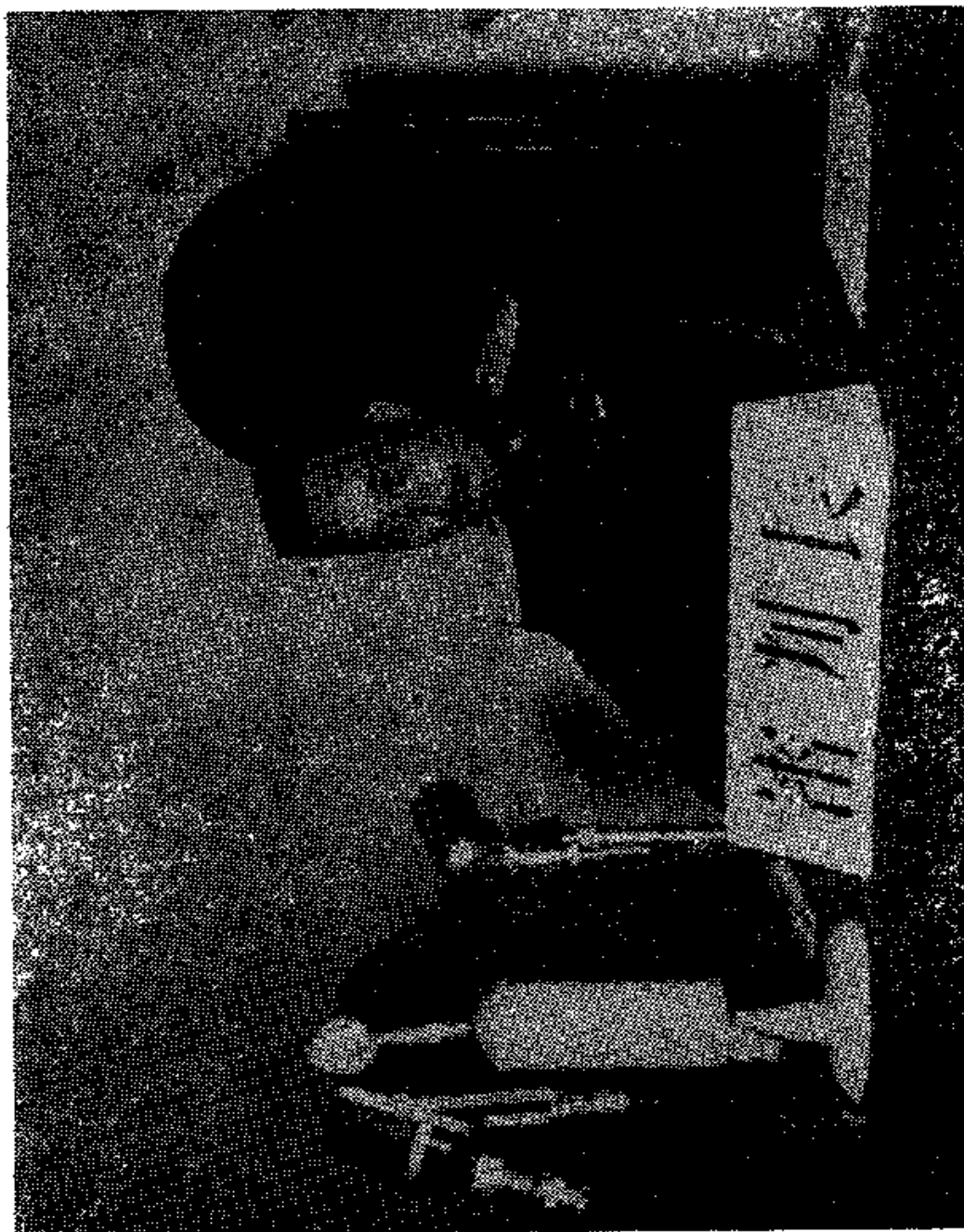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委员）

二十五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华战争中战犯分子的决定，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先后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武部六藏等案共四十五名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审判。

## 六亿人民的委托

一九五五年底，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不久，陈奇涵同志（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通知我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我听到组织的这一决定，心里很不平静。

在我国领土上，由代表中国人民的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审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这次审判，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个标志。怎能不令人激动呢！



审判长袁光同志



我作为特别法庭的一个成员，感到非常荣幸。在旧中国，法庭历来是卖国者的法庭，不仅从来不敢触犯帝国主义，反而为虎作伥。在被告席上，审判的都是爱国志士。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被从这种“法庭”押上刑场！这样的审判，恰恰是中国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一个缩影。在人民的法庭上，全面审判民族的敌人，这在旧中国是不能设想的，只有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才有气魄做得出来。在抗日战争中，我是八路军的一员，曾指挥部队同日寇进行过殊死的战斗。耳闻目睹了多少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对这些血债累累的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今天，我受六亿人民的委托，去审判民族之敌，是多么光荣和自豪啊！

当然，这个使命是艰巨而又复杂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颁布一套完整的法律，法制也还不健全，实施具有国际意义的审判，困难是很多的。我从事法律工作时间不长，对手又是一些很狡猾的高级战犯，难免有些紧张不安。虽然已有纽伦堡、东京、伯力几次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借鉴，然而到我们这次审判，毕竟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在审判中，既要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要体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放眼于未来。这对于我和其他同志，都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困难很多，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党和人民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一定要全力以赴，把审判工作做好。

### **认真精细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一月，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检察院、法院、司法部三个单位的有关人员，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分头开始了紧张的

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同志，是负责具体工作的。我们在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各负其责。检察部门跑遍全国，查证罪行，寻找人证、物证。我们法庭人员，主要是熟悉案情。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下，饱受了十四年之久的苦难，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之中，人民的生命损失便在一千万人以上，财产损失价值数百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是何等严重！尽管一些首要的战犯在日本投降后已经审处，我们现在要审判的战犯，是被我们逮捕或由苏联政府移交我国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些在押的战犯犯罪地点遍及全国曾经沦陷过的地区，战后又经过了很长时间，要查清他们的罪行，对要审讯的案件做到心中有数，工作是相当浩繁的。高克林同志曾对我们说过，案件一定要搞准，日本战犯是狐狸精，我们要认真对付。当时，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我们法庭的同志们，天天都在熟悉案情，研究如何审判。

我们审判的对象，是外国人，审判既要合乎中国的国情，又要合乎国际的惯例，涉及面很广。因此，特地请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等三人当我们的顾问。同时，我们又起草了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决定，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人大常委会，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经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我们就有了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律依据。这个决定的起草，是经过推敲的，从我们起草的第一稿，到人大常委会最后讨论通过的決定，从文字到内容都有很大改动，由此可见，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工作，是极其慎重的。

审判日本战犯的决定指出：

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在决定中，对于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做了明确的规定：

（一）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

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罚。

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合并论处。

（二）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

（三）特别军事法庭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应该用被告人所了解的语言和文字进行翻译。

（四）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他辩护。特别军事法庭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五) 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六) 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

有了人大常委会决定，我们的审判工作从法律上就已经完备了。

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进行的。在起草决议的时候，我们曾几次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情况。有一次，我们向总理报告说，有的同志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和灾难，坚持要在决议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赔款。我们当时都认为，既然苏联等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问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也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物，我们要求日本赔偿，也是理所应当的。周总理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当场明确地指示我们：“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那时，我们大家还有些想不通，认为太便宜他们了。以后的事实证明，还是周总理高瞻远瞩，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做出了这个影响深远的决策。我们放弃了对日本的赔款要求，至今在日本人民中仍传为佳话。

当时负责政府工作的董必武、彭真同志，对于我们的工作做了许多直接的指导。彭真同志多次召集我们开会，反复研究审判工作。他一再强调，不管审判任何人，日本战犯也好，其他罪犯也好，都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审判一定要遵循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这些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事项也抓得很细致。比如，我们最初曾计划把抚顺作为东北的一个审判地点，以后，又根据中央的指示，迁往沈阳。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沈阳制

造了“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有更特殊的意义。我们在沈阳重新设置了法庭，并把法庭设置的照片呈送董老，他不但一一过目，而且又报请总理审定。

廖承志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领导我们的审判工作。他是领导同志中的“日本通”，很注意这次审判在日本人民中间的影响。为了把审判搞得更好，除了经常把我们找到他家汇报情况，研究工作以外，曾两次到卧佛寺给全体人员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他从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讲到日本法西斯对本国人民的压迫，使大家对日本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明确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卧佛寺渡过了一个紧张忙碌的春天，当白兰花开放的时候，各项工作都基本就绪，同志们分赴东北和山西，准备开庭。

### 公正的审判

一九五六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日本战犯审判。

六月九日，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开庭。审判的日本战争罪犯是：前日本陆军第一七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第五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第五九师团第五三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第三九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第五九师团第五四旅团少将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第一三七师团第三七五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前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

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和第三九师团第二三二联队本部中尉俘虏监督军官兼情报宣抚主任鹤野晋太郎等八人。

这次审判，由我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是张向前、牛步东。首席检察员是王志平，检察员是权维才、田志洪、王宝祺。

被告人的辩护人由律师徐平、王敏求、孙仆、邓毅、韩风路等担任。

开庭那天，旁听席上坐满了专程赶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沈阳各界人民群众的代表和许多新闻记者。

上午八时三十分，我走上审判长的席位，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正式开庭。”八名被告被带上被告席。我通知被告说：“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另外，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当时，我们还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组织法，给予了被告人充分的法律权利。在开庭前五日，法庭将起诉书副本连同日文译本送达各被告人，辩护律师也同被告人会见。这些律师，都是水平很高的知名人士。我们为被告人聘请的翻译，也是第一流的。

开庭之后，我请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当日下午，开始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起诉书中列举了八名被告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坚决执行侵略战争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等罪行。其中，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命令部属大量掠夺和平居民的粮食和财物；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杀害我被俘人员；有

的命令部下把我无辜人民作为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或作为战场上的“扫雷工具”；有的对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有的用我国人民试验细菌武器的效能，从事准备细菌战的活动……。法庭出示了大量的物证，并传召证人出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这八名战争犯罪分子所犯下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

法庭首先讯问了被告人铃木启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在日本侵略军中先后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时，指挥所属部队对我河北省冀东地区和河南省浚县等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讨伐”，制造了六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十月，铃木启久为了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致使日军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和平居民，烧毁民房一千多间。

在调查这一罪行时，法庭传召了证人周树恩。这位四十四岁的农民，是当年在日寇对潘家戴庄集体屠杀时从埋人的坑里逃出来的受害人，至今身上仍留着日军残害的伤痕。他在法庭上作证，详细叙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铃木部队在潘家戴庄进行大屠杀的野蛮暴行。他的一家十二口人，被日军杀害了六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他满腔悲愤地诉说了这个惨景，又解开衣服，露出遍体伤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被告人铃木启久“噗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连连喊着：“饶命！饶命！”并承认：“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第二天，法庭继续进行事实调查。被告人藤田茂，被控犯下多种罪行，其中之一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在他担任联队长时，指挥命令部下包围山西安邑县的上段村，杀害和平居民一百余

人。法庭传召了幸存的受害者张葡萄出庭作证。当时，三十三岁的张葡萄和上段村许多无辜居民一同被日军驱赶到一口井旁，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和年仅四岁的女儿都被杀害后投入井内，她也被打伤投入井内。她当庭哭诉了家破人亡的经过，说到亲人们的惨死时泣不成声，旁听者和法庭工作人员都不禁为之落泪。被告人藤田茂在二十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满含愤怒对我罪行控诉的张葡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她的姿态是我今生到死也忘不了的。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部被日军杀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泪控诉时的悲伤、憎恨、痛苦，一齐在脸上表现无遗。她在愤怒到极点时，要奔过桌子这一边来抓我。这是日本侵略得到的真正回答。一想到她的遭遇，她内心的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那老婆婆的控诉到今天还深印在我的脑中。”

在法庭上，藤田茂的其他罪行，也都有证人出庭作证。在他当联队长到师团长期间，经常训示部下军官要用活人作“靶”，对士兵进行“试胆教练”，又曾下令“将俘虏在战场杀掉算入战果”。此外，藤田茂还有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残酷罪行。对于这些罪行，藤田茂供认不讳，表示：“一切都是事实，我愿接受任何严厉处罚。”

其余六名被告人也都有许多严重的罪行。其中，上坂胜曾制造杀害八百余名和平居民的河北定县北障村惨案。船木健次郎曾命令部下对学生和居民施放毒气伤害四百余人来显示毒气威力。鹈野晋太郎曾残酷地砍杀和虐杀许多我被俘人员。榊原秀夫是众所周知的细菌战部队——原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下的一个支队长，曾大规模培养细菌、繁殖跳蚤、搜养老



鼠，积极准备细菌战，并用和平居民进行细菌武器的试验。对他的罪行，除有证人出庭作证外，法庭还专门请了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孟雨等三名专家作为鉴定人出庭鉴定。

特别军事法庭的事实调查，充分表现了我国司法机关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和高度民主精神。起诉书上所控告的八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是根据九百二十人的控诉，二百六十六人的检举，八百三十六人的证词一件一件核实的。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八名被告人一一低头认罪。

调查结束后，检察员指出：庭审调查已经完全证实了起诉书中所控诉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虽然被告人的种种罪行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小部分，已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灾难。他要求，对本案各被告人必须给予应得的惩罚。对他们的惩罚，同时也将是对一切妄图再走日本帝国主义可耻道路的侵略分子一个严正的警告。

接着，律师为各被告人作了辩护。被告人铃木启久、藤田茂和佐佐真之助的律师说，被告人虽然是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但他们的重大行动必须受战地最高司令官的指挥。他还提供了被告人在关押期间的悔罪表现，请法庭作为对被告人量刑时考虑的因素，从宽处理。

辩护人进行辩护之后，公诉人就辩护词的某些问题提出意见，辩护人又再次发言，直到双方都表示没有意见需要再陈述时，我才宣布辩护结束。

法庭辩论结束之后，由各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八名日本战犯在法庭上都对自己的罪行表示了忏悔，愿意诚恳接受法庭的正义裁判。

铃木启久在最后陈述时说：“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起初曾企图隐瞒，但在中国人民对我人道主义态度的感召下，启发我进行了反省，认识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根据我的罪行，我在法庭上本无辩护的余地，但是，法庭给我指定了辩护人，还告诉了我法庭上的权利，我感谢中国人民，我诚恳地谢罪。”

藤田茂在最后陈述中说：“我在这个法庭里，接受了中国人民严肃的、光明正大的、实事求是的审判。现在我准备心甘情愿接受这个法庭的判决，以便改过自新。”

上坂胜在提到自己的罪行后说：“我这样的人，就是判处死刑，也不能弥补我过去所犯的罪行。”他表示：“愿意受接任何一种处罚。”

法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退庭进行评议。经过三天评议后，在十九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开庭宣判，宣读了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徒刑二十年，藤田茂、上坂胜徒刑各十八年，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徒刑各十六年，船木健次郎徒刑十四年，鹈野晋太郎、榊原秀夫徒刑各十三年。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在沈阳审判的同时，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富永顺太郎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个案件是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任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等八人的战争犯罪案。这八名罪犯除积极参加日本侵略战争外，在日本投降后，又在我国组织前日本军人参加反革命军队，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阴谋复活日本帝国主义。法庭判处富永顺太郎徒刑二十年，城野宏徒刑十八年，其余各罪犯

分别判处八到十六年徒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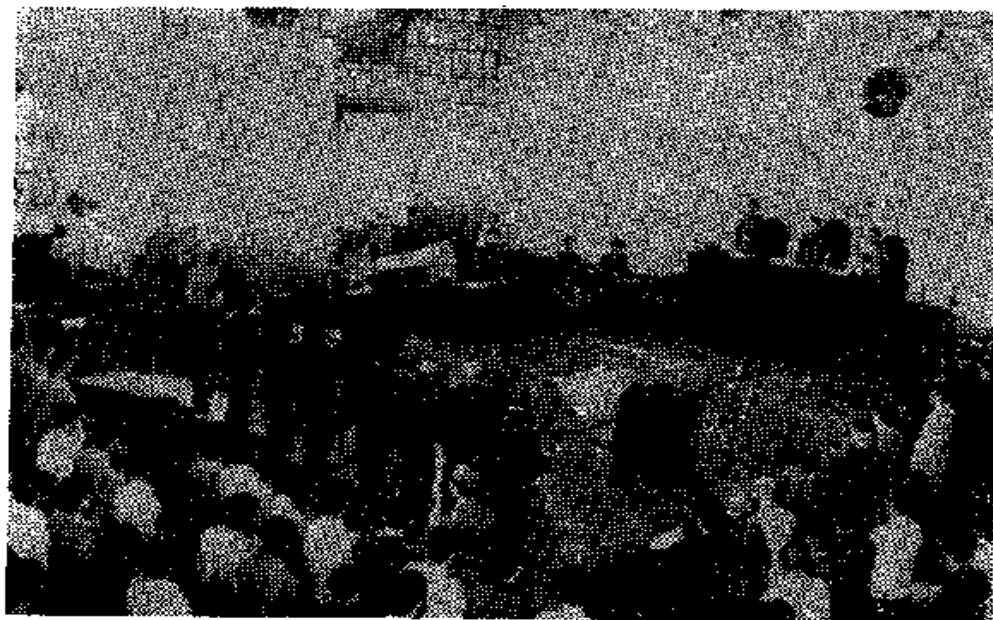
七月份，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又审判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二十八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都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过各种不同的重要军政职务，分别犯有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操纵或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僭夺我国国家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等罪行。

审判之前，为了核实日本战犯的罪行，我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谈话，让他出庭作证，去揭露武部六藏等战犯的罪行。在法庭上，溥仪详细供述了被告人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奉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操纵伪满洲国政府，统治和奴役我国东北人民的罪行。

溥仪说：“在伪满，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实权者，就是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满总务厅次官古海忠之。伪满的一切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是首先由武部六藏主持和古海忠之参与策划召开的日本关东军第四课课长、伪各部日本人次长等出席参加的次长会议（火曜会）上作出决定，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然后经过伪满洲国务会议和伪参政会议通过，并由伪满总理和伪参政议长先后分别向我作形式上的报告，经过我形式上的所谓‘裁可’和签名盖章后，伪国务院便发表实施。”溥仪还作证说：“在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伪各省的日本人副省长，各县的日本人副县长都是由武部六藏直接指挥，而伪各部的日本人次长、省次长、副县长都是掌握实权的。这就形成了武部六藏对伪满洲国的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操纵支配网。”

在审讯武部六藏时，因被告人患有重病不能到庭，法庭特派

审判员到被告人住地进行讯问，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一同前往，充分体现了法庭的人道主义。



审判日本战犯法庭

七月二十日，法庭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二十八名罪犯分别判处徒刑十二到二十年不等。其中，武部六藏判处徒刑二十年，古海忠之判处徒刑十八年。

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先后分三批释放了一千零十七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七月二十二日，特别军事法庭又将身患重症的武部六藏予以假释。至此，我国关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全部处理完毕。

对于这些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我国政府和人民是有充分理由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给以严厉的惩办的。但是，正如人大常委会决定中所指出的，我国政府和人民“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仍然对他们从宽处理，没有一个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如果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可以考虑减刑以至于提前释放。这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和中国人民“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服人”的传统美德，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之情。

正如周恩来总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中所明确指出的：“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日本现时的处境，尽管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国政府现在仍然主动地按照宽大政策分别处理了经过长期关押和审查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同我们过去对访问中国的日本朋友所表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政府所以作出这些不断的努力，是由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和平共处和友好来往、要求两国早日恢复正常关系的强烈愿望。”

### 深 远 的 影 响

我国政府对在押的日本战犯所采取的宽大为怀的政策和特别军事法庭的公正判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大多数日本战犯在刚被关押的时候，曾经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充满疑虑和恐惧之心。他们一方面想掩藏自己的血手，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幻想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我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原则感召下，他们逐渐觉悟了。最初，战犯们总以为中国人民会像他们过去那样残害关押的俘虏。看到战犯管理所修暖气锅炉房，他们以为是在

盖“杀人房”；修医务所，又以为要拿他们做“细菌战试验材料”。后来，他们终于明白了：事实总和他们预料的相反，开始有了悔恨之心。被首批释放的佐野一，本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在关押中患了直肠癌，病情危急，管理当局把他送到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造肛门，才把他挽救过来。病愈出院之后，他写了一篇手记，供认了自己过去拷打、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且详细描写了中国医生、护士为他治病的经过，表示悔罪。这篇手记当众宣读的时候，听到的战犯都和佐野一本人一道流泪。

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也在战犯中间引起震动。铃木启久在宣判后对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作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极刑。但是，结果，我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而且可以用被关押的时间折抵。这种宽大政策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我认为，这是由中国的真正的和平政策产生出来的。只有和平，人类才能幸福。我过去走过的道路完全是破坏人类幸福的道路，我认为，将来绝对不应该再对世界采取这种方式。”他还表示：“今后我一定要成为保卫和平的一分子，参加到和平阵营，以我的余生进行努力。”每一个被我判刑的战犯，都发表了类似的感想。

被我国政府宽释的战犯，更是感激涕零。其中之一的宫崎敏夫，在发言时泣不成声地说：“我过去在矿山当电工，后来放下锤子，拿起枪杆，参加侵略战争，杀害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中国人民，污辱过像我母亲那样善良的妇女，杀死过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孩。这种罪行是不能饶恕的。但是，中国人民宽赦了我，还教

育我怎样做人。我今后要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回到劳动人民队伍中去，来回答中国人民的恩情。”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在离开我国前夕，曾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中国抗日烈士献花圈致哀。他们集体表示：“我们现在在你们的灵前宣誓：我们决不再走过去的罪恶道路，我们决不容许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要为持久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团结而奋斗。”

经我国政府批准来华探望的日本战犯家属，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了他们探望亲人的机会。战犯上坂胜的长子上坂旭说：“我们这次来除了探望我们的亲人外，我们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来亲自向中国人民谢罪。”他说：“中国政府对战犯一个不杀，也没有一个被判无期徒刑，这实在是太宽大了，我们实在感激中国政府。”

战犯鹤野晋太郎的七十二岁的母亲鹤野好说：“我的儿子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我是知道的，我们实在对不起中国人民。”

武部六藏的妻子武部歌子在来华的轮船上听到她的丈夫被假释的消息，喜出望外地告诉新华社记者：“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原来打算看护他几天后就回去，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能和我的丈夫一起回东京去。”武部六藏身患多种重症，以为没有重归故土的希望。他听到我国政府对他假释的消息，老泪纵横。在我医护人员陪送下，他从沈阳到达天津，在一所医院里同妻子见了面，两人感慨万端，表示一定要努力教育孩子，为日中两国友好、为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做一些工作。

所有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回到日本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中

日友好的使者，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恢复中日邦交积极奔走。当年曾经从事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人，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他们痛恨昔年充当了军国主义的帮凶，决心以有生之年为促进日中友好而献身。曾担任过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的藤田茂，一九五九年和其他正在服刑的日本战犯，被我国政府特赦回国。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成为热心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活动家，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整个后半生中贯彻了他促进中日友好和反对霸权的愿望。

上述情况生动证明我国政府对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极端旷达的胸怀和愿意同他们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同情和赞扬，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的一个动力。

回顾二十五年前，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我们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为中日友好起了铺路架桥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关系有了长足的进展。一九七二年，经过两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中日邦交终于恢复。中日两国之间，结束了战争状态，友好合作关系在更广阔的领域蓬勃发展起来。以后，两国间又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成为东亚的友好邻邦。这些可喜的发展，多么令人欣慰啊！回顾这一过程，我相信，中日两国人民决不会允许侵略战争重演，一定会世代永远友好下去！

（信生 施兵整理）



# 往返于津沪之间的秘密使命

周 仲 英

## 庄严的使命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召开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都受到了批判。接受了血的经验教训，“六大”作出了基本上是正确的结论：中国革命不是正在走向一个高潮，而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处在走向一个新的高潮的前夜。“六大”的基本路线，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正如雪里送炭，急需很快传达下去。党的交通工作，它在全国范围的交通网，正是党在处于地下状态时传达“六大”精神，交流新的革命经验，推动全党工作的血管和神经。

一九二八年秋，我正在中共北平市委军委工作。一天，市委书记赵搏同志（陕北人，与我黄埔同学。后来一起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坐牢。抗日时期，在山东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杀害——活埋。现在山东省赵搏县就是纪念他而命名的。）找我谈话，说：“中央向各省、市抽调做交通工作的人，任务很重要，组织上决定让你去，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当时，我毫无犹豫地表示：坚决服

从组织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赵搏同志还告诉我说：中央对交通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第一，党龄较长；第二，对敌斗争有一定经验；第三，政治坚定，一贯表现好；第四，身体强壮。为什么特别提出一条身体好的要求呢？因为那时的交通工作，常年活动在路途奔波中，陆上水上都要走，风里雨里无阻拦，环境艰苦生活苦，必须有坚强的体力和毅力才能适应。他认为我基本上符合这些要求。我一九二五年入团，二六年转党，当时也算是老党员了；我在黄埔军校时经历了一些对敌斗争，当时又年轻力壮。因此，党组织决定我担负这一工作。

赵搏同志还说：做地下交通是个苦差事。工作要严守党的纪律，行动要受许多限制，生活单调枯燥。还要能做无名英雄，有时牺牲了，党和同志们还不知道呢。而且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可能。要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说：“那有什么！共产党员再苦的工作也要干，而且准备随时牺牲。”

于是，我便到上海找党中央去了。

## 百分之百的准备

我的工作只和中央交通局发生关系，由吴德峰同志直接同我联系。他还介绍阿金、余宜之等同志和我协同工作。

到上海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我的衣、食、住、行问题。力求“社会化”，力求最快地适应那种万花筒般复杂的社会环境，能够在那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大海里自由游泳。从一九二八年底到二九年春，我的大部分时间，可以说都用在这些方面了。

当时的上海人讲究穿戴，有“宁肯回家揭不开锅，也要出门穿

得阔”的说法。我化装的身份是小职员，不能过份阔绰，但也不能太寒酸，那样反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所以我的衣服也算讲究，尽量打扮得和上海人一样，在外表上先把我溶合在上海社会之中。当然，我还准备了一些北京、天津式的衣服和比较粗陋的衣物，适应不同的场合穿用。住的问题是和阿金一起研究解决的。我住在三马路××街一家裁缝铺的小楼上。当时我党很困难，能省一文钱便要省。三马路一带小商贩多，我住在一家二房东的小商店过道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不仅房租低，合乎我身份，主要是周围环境单纯，对我这新到上海的人比较合适。房东是个小商人，爱占小便宜，他知道我是个“小职员”，每月能收我三块银洋的房租，便高高兴兴什么也不多过问了，后来我每次外出“办货”回来，给他儿子买点小礼物，他们对我就更有好感了。吃饭也是个重要问题。我是单身“小职员”，天天要到街上就餐。既要吃得经济，又要保证安全。附近一家河南饭馆，饭菜便宜可口，掌柜的也比较老实，我就在那里吃下去了。不久，我发现顾客中有不少中国巡捕，他们的宿舍就在附近。我有点担心，和他们常碰面没危险吗？当继续观察之后发现，这里反倒比较安全。凡来吃饭的人，包括中国巡捕在内，互相都不多交谈，见面点点头就各走各的了。加之我跟饭馆掌柜已经混熟，他知道我是“北京人，在上海做小买卖的”，对我常做他的顾客，表示十分欢迎。所以，我是可以应付这个场面的。只要行动注意，离巡捕越近，越使他们不怀疑，便越安全。事实上我在这家吃了一年多的饭，除了掌柜的有时同我搭上三言两语外，再没有人来盘问过我。

衣食住行这四件事中，最难解决的要算“行”的问题了。要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必须对上海的社会环境、地理情况、政治

情况摸熟、摸透、摸清楚。不然执行起任务来寸步难行。为了熟悉上海地形，阿金领上我，把四马路、三马路、霞飞路、英租界、闸北、浦东、城南等地都跑了个遍。我把那些大街小巷、里弄胡同的名称、特点、周围环境，如有什么机关、公司、茶馆、饭馆、公园、戏院等，都逐步的记个一清二楚，这对我的工作极关重要。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同志来上海找中央机关。正走间，在一条街上忽然遇上敌人“抄靶子”。两个外国警员带着几个中国巡捕，一声令下，要行人原地不动，等候挨个搜身。这种情况阿金以前没有交代清楚，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身上带有党的文件，如果被敌人搜去就糟了。怎么办？要当机立断。我急忙抬腿进了一家小商店，指这问那的买起东西来。等了一会儿，街上的人行动起来，我便走出商店。坏了，我带的那个同志不见了。我一打听，人们说巡捕从他身上搜出了文件就把他抓走了。糟糕，他身上有文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没几天就传来了那位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这次的不幸事件，使我十分震惊，更激发我的责任感和警觉性，下决心把上海的社会情况摸清楚，力争做到了如指掌。于是，除了四马路、大英大马路这些地方我反复熟悉外，象外滩、黄浦江各码头、中国招商局的船只、外国人的船只……都去细心查看并熟悉他们的情况特点。敌人“抄靶子”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对“可疑对象”搜查特别细致。为了对付敌人这种突然袭击，我对“抄靶子”行动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研究，如：那里最常“抄”，多在什么时候“抄”，“抄”前街上有哪些异常征候，等等。每逢走在街上，特别在执行任务时，远远地就留心观察，一经发现前边有可疑现象，便立即采取措施，曾多次躲避了敌人的搜查。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一转弯，发现前边在“抄

靶子”，我心平气稳，不紧不慢的转身闪进早已熟悉的一个小里弄去。又一次，我走在一条很窄的街上，路上人多，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况。猛抬头，看见前边正在搜身，我留意附近，既没有商店，又没有小里弄。怎么办？既不能犹豫徘徊，也不能拔腿就跑。我定住神四下一瞥，见左边大门外都有避雨的房檐，一直连成一条长廊，长廊下面光线较暗，活动的人又很多，我就转身跨上街沿，夹杂在居民中间，顺着长廊返回刚才走来的方向。

在“行”的方面，担子最重，纪律最严，联系方法最具体。记得我解决了住的问题以后，就开始和吴德峰同志研究行动方法。为了争取工作的绝对安全，对付敌人的鹰犬，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组织上给我规定了一整套具体、严密、灵活、多变的工作方法。每次接受任务或汇报工作的地点、对象、联络记号等，都是一次一规定，一人一改变，比如这次是吴德峰同志到我住处布置任务，下次是我去找阿金接受任务，再一次是余宜之去某地给我交代任务，今天约定在人山人海的“大世界”中碰头，明天又到僻静的小茶馆见面。每次分手时，再约定下次新的联络方法。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赵镛同志说交通工作是个苦差事的意义了。往来津、沪，路上固然苦，但最苦、最难熬的是到上海后的休息时间。因我是伪装的“小职员”，没有公开的职业做掩护，必须天天装着去上班，纪律和敌情也不允许常到和自己有工作关系的同志家里去，更不能访朋问友，寻人聊天，所以，只好整天在街上逛市场，串马路。为了逃避房东夜邀“打麻将”，晚上常要十点以后才回家，我过的是一种身在这个社会之中，又在这个社会之外的生活。开始感到孤独、难熬。但是这种心

情很快就被打破了，逛市场，串马路，看到了十里洋场的黑暗，到处是褴褛的乞丐，挨打受饿的苦力，斗殴的流氓阿飞，卖笑的娼妓，求神拜佛的老人、妇女……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增长了自己的社会见识，加深了对这个吃人社会的认识，使自己感到威力无比的历史潮流，必然涤荡这黑暗腐败的时代。而作为共产党人的自己，正是担负着这样的神圣使命，使我们苦难的同胞解放出来，成为中国自己的主人。这样，就使自己充满了力量，“孤独”之感也就烟消云散了。

### 在艰苦中斗争、学习、斗争……

在中央交通局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就踏上那迎着风险，益加艰苦的交通征途了。

这里，我的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当时中央交通局对我的工作，提出一个明确而富有吸引力的要求：你的工作天天都有可能和敌人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因此，天天都要准备和敌人进行英勇不屈的战斗。但是，你的任务却不要求你和敌人去作正面的搏斗，而是恰恰要求你时刻避免和敌人发生正面冲突。在你的征途上，要千方百计地绕过一切明礁和暗礁，安全到达目的地。你的行动愈是无声息，愈是平安，便是最大的胜利。

这就成为我以后一切行动的指南。

我的主要任务是跑上海到天津这条交通线。去时，把中央的文件、指示带下去；回来，把下面的报告、总结、计划等带上来。此外，我还要带领一些同志到中央或到各地接通党的关系。我要联系的同志有贺昌、阮啸仙、余洪泽、安子文等。我开始工作时，一来“六大”文件十分重要，敌人又正猖狂，加上我缺乏活动经

验，因之，为了保证安全，保守秘密，防止敌人破获，重要的中央文件，都要求我默记背熟，下去用口头传达，或者用化学写印品传递。后来我的经验多了一些，送的书面文件也多了。我只负责把文件送到目的地，而不需要知道它的详细内容，那些化学处理的文件，就更容易做到保密了。每次给我领路的同志，常常是只知道他的姓，有时连姓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去向、详细情形就更不多问了。

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党的文件转送工人同志去进行伪装加工。传送的文件，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印刷品，又有化学写印品，必须给以恰当的“伪装”和维护，才能携带方便，不被别人发现。我们工人同志的革命责任心和高超的技艺，真令人赞叹不已。凡是交给我的伪装品，如不经他们说破，简直看不出一点破绽。有各式装潢的“盒式点心”，有各种美观的“密封罐头”，有捆扎停当的“出门行李”等等。另一类是书籍报刊，如四书五经，剑侠小说、黄色书刊等，它们内里则是用药水书写的中央文件，这些精细的技术加工，每次都给我顺利完成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我去天津是坐轮船走海路。如果坐火车，又快又稳当，但是不行。一是火车票价贵。二是火车上国民党军政人员多，不很安全。坐海轮买通舱票可以比火车省一半钱，通舱里小商贩、穷苦人多，便于掩护身份。

我上船要带三大件行李，网篮、帆布箱、行军床。行军床为睡觉用，帆布箱里装些衣服杂物，供路上使用。我一上船就脱下上海装，换上一般人打扮，到塘沽时又换上天津装束，回上海时再穿上海装。大网篮里则装有被褥、食品、饭盒、暖水瓶、书报、鞋袜等等。这个网篮外人看去不起眼，但是，我每次携带的

文件，大多放在这里面。为了模糊人的注意力，我常把网篮放在明眼处，人们在脚下跨过来踢过去，反而不去留心它有什么“问题”。可是在我来说，一路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它身上了。开始时，把文件放在线装书里，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因为我是小商贩装扮，怎么还看古书？后来，我就把在轮船上买的黄色刊物，用化学方法将文件内容写进去，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从一九二八年冬到一九二九年春，我的情绪一直是高涨的。这期间，我下去时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回来时带回各地贯彻执行“六大”精神的情况和经验。看到各地党的工作很快得到恢复，斗争在向好处发展，党的威信日益提高，我为党的事业取得新的胜利而高兴，也对自己能为党的事业发挥一点作用而自慰。当然，要完成我的交通任务，还要去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

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晕船。我到船上，稍一颠簸就要眩晕呕吐。遇上大风浪，更是呕吐不止。吐的厉害时把肚里食物吐完了，还要把胃液吐出来。有时甚至把胆汁都吐了出来。最后吐得头晕眼黑，抽得满腹疼痛，只好躺在行军床上，连动也不能动。

出一次差等于害一场大病。等上了岸，见了吃的就眼馋肚饥，总得大吃大嚼一顿。这种长期忍饥挨饿、暴食暴饮的生活，终于使我患了严重的胃病。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吃辣椒这类东西，从解放到现在三十多年，从没吃过一根冰棍。

有时吐得支架不住了，就想到：我是个共产党员啊！身负党的重要使命！于是浑身就来劲了，困难也不当一回事了。

我上船后的第二件事，是力争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创造安全的工作条件。

我坐的大都是中国招商局的船或私人的“野鸡船”，有时也



坐日本人的“××丸”。跑过几趟以后，船上的大致情况都知道了，就进一步留心码头上的周围情况。

自一九二九年春，是我工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时我开始大量地携带文件了。其间曾两次遭到敌人的突击检查。面临不断增加的威胁，促使我不断研究提高斗争艺术。有一次，敌人果然盯上我的“点心盒”了，把它打开用手在点心中间摸来摸去，并且掂起衬点心的纸向底下搜寻。当敌人的手指碰到盒底下放有文件的夹层时，我的心紧缩起来，认为这一定是一次有目的的搜查，必须打乱敌人的注意力，我说：“这点心是我送人的，如果弄乱了还怎么送人呢？”他听了说“去你的！”就把已经翻得乱七八糟的“点心盒”扔给了我。敌人走了，我身上冒了一层冷汗，因为其中有中央决议和一些党员干部调动名单，如被敌人查获，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又一次，敌人拿起我的“罐头”看来看去，摇了又摇，最后竟然把它打开来，用小勺在里边翻捞。我虽然知道罐头里的“机密”是十分不易被发现的，但是仍然提心吊胆。直到敌人把罐头扔下走去，我才放心坐下来。经过这两次危险的遭遇，我一方面感谢工人同志的伪装技术，一方面也产生了如何和敌人更有效地进行斗争的要求。因为经验多了，胆子也大了，办法也就有了。有一次，我又带上“点心盒”上了船，就索性把它打开放在身旁，弄成好象吃剩的样子，敌人过来反倒看都不看了。有一次，带上了“沙丁鱼罐头”，干脆把它打开，随时吃一点，就很顺利逃过了敌人的注意。有时，我把印有文件的一卷广告随便捆住，扔在网篮里，或者把包着文件的油纸揉得破破烂烂，公开放在网篮上，也都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

虽然如此，我仍感到需要寻找更多、更安全的办法来进行掩

护。因此，遇到船未开前或海上风平船稳时（后来我对海船也适应了），就在船上走动走动，和一些可以交谈的人打打招呼，了解些情况。不久，我便和一个老茶房认识了。很顺利地让我住进了水手房。原来，住水手房只拿半价的船票钱，实际是水手的“外快”，住在这里，没有人查票，又少花钱，又安全。我还特意多给他一块多钱。他很满意地说：“以后有事你就来吧。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从此，我一上船就住在他的房间里。当然我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了进去。这样，不仅我生活方便，更重要的是我所携带的文件的安全有了比较好的保障。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春，由于充分利用了这种社会关系，顺利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

从一九三〇年起，我的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一切都向进一步发展。这时，我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也增长了斗争经验。我深深懂得，在白色恐怖下，一百次行动，应当争取一百次安全。但是，一百次行动，也有一百次危险等待着你。一旦出了问题，个人牺牲固然不幸，但那仅仅是丢掉了一个人的生命，更严重的是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在每次行动中，时时刻刻，都处在兢兢业业、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随时都在创造条件，利用条件，以便绕过一切明礁和暗礁，达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在水手房里住得久了，常感我的行李放满地下，行动不便，也很显眼，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一天，我到甲板上游逛，发现通舱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大堆行李，一直也没有人去检查。我回来问老茶房，他说，那是上海一些旅馆派到船上来接客人的伙计们看管的行李。一听这话，我心里高兴起来，如果我的行李也交给他们经管，不是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吗？我又想起一件事：一

次，一个学生从天津去上海，船上这帮伙计向他拉生意，请他到上海住他们的旅馆，只要给他行李上挂个牌子，不用他操心，到上海指定旅馆对号取行李就行了。周围人见他行李多，也劝他接受伙计们的安排，到上海码头时好办事。那个学生执意不肯，把伙计们惹火了。船到上海人们纷纷下船，那个学生的行李不好办了，搬上这件搁下那件。正在作难时，来了一伙人说：“来吧！弟兄们帮你个忙。”七手八脚地把行李都搬走了。那个学生跟着上了码头，行李全都不见了，气得他哭鼻子抹眼泪。所以我知道这帮人在码头上有势力，不好惹，搞不好会找麻烦的。我有时也坐“野鸡船”。这种船到上海不靠岸，停在黄浦江上。便有许多小船划来接客人上岸，他们熟悉地形，可以安全送客人上岸。但是，坐这种船也常生意外，小船上来一大群挤来挤去，有时客人把行李刚放上去，一转身小船不见了，弄得没坐上船反丢了行李。而我的“行李”是绝对不能丢失的。所以，我进一步想，这帮伙计虽然难缠，但都是跑江湖的。搞好了还是可以利用的。于是我便去拜访他们。伙计们围着行李东倒西歪一大片，有人聊天，有人抽大烟。我过去打了招呼，和他们闲扯起来。原来他们大多是武汉人，我们认了乡亲，谈得更热乎了。一个老乡让我抽大烟，我说：“来，我请客！茶房，拿一份来！”应声便有人送过一酒盅的烟膏子来。我付了钱，向大伙说：“请大家来尝尝！”于是，不一会儿我们便混熟了。他们说：“有事说话，大伙都帮忙的。”我说：“那就请各位多关照，到上海要到你们旅馆打扰了。”他们满口欢迎。马上给我一个牌号，叫我到上海持牌去找旅馆。我说：“我那边还有几件行李。”他们说：“好办，搬过来就是了。”说着就有几个人帮我把行李全搬到这边，放在他们的

行李堆上，并且也给挂上了牌子，又把对号牌子交给我，叫我到指定旅馆去对号取行李。这样的事牢靠不牢靠？我事先向茶房打听过，茶房说没有问题，他们没有这个信用就甭想吃这碗饭了。所以，我心中有了数。到上海时，我留心他们果然把我的行李都运到那个旅馆去了。自此，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我的行李可以避免特警人员的搜查，此外，我回到上海，先在他们旅馆住下，办完了接头任务，再回裁缝铺去，也是掩护行动的好办法。

在船上，回到上海，所遇到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我感到在天津的住处还不够理想。我在船上打听到一个情况，大部分中小客商，都到四面钟一带的胜利、恒大等小客栈投住。那里中下层人多，流动性也大，比较容易进行掩护。不用说，房钱也便宜。于是，我决心去那里扎下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小客栈服务人员穷苦人多，也好接近。不久，我就结识了好几家客栈的老茶房或跑腿的伙计。我常给他们些小费，他们一见我来就热情接待，处处帮忙。在活动当中我充分利用了这些社会条件，给工作提供很多方便。有时上午在这家客栈接头，晚上则到另一家客栈去住。其间，茶房们便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助手。在天津和上海都有过这种情况，有时我发现后边跟上“尾巴”了，便先走进一家旅馆，把文件存放好后，再出来走进另一家旅馆。直到把“尾巴”甩掉后，再回去取出文件。“狡兔三窟”这句成语，在对付凶恶敌人的跟踪时，它是很有些道理的。

在天津码头上，行动还有困难，上下船时行李必须我自己经管，时常要过搜查盘问这一关。一次，我坐人力车到码头上，看见一个乘客与人力车夫吵嘴，说要的钱多了，不肯给。一个工人到

一个衣着古怪的人面前说：“小山东，看那人多蛮横？”那个叫小山东的人过去对乘客说：“在这个地面，你想干什么？”乘客见势不妙，连忙给车夫加了钱。我想这个小山东一定是个地头蛇，跟他拉拉关系可能有用处。我走过去热情地叫了声：“小山东！”他看了看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山东？”我说：“咳，谁不知道鼎鼎有名的小山东！”他高兴地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给人当伙计，出来跑跑腿。”我见他没事，就说，“走，咱们初次相见，吃点东西去。”我领他进一家小酒铺，要了点酒菜吃了。从此，我们成了熟人。我一到这个码头，就由他来照顾我。有一次他说：“张先生，你从上海给我捎条毛毯来，二十来块钱的就行。钱由你先垫上。”我知道他想敲竹杠，但为了以后好办事，也只好答应了。回来时，我给他买了一条三十来元的。他眉飞色舞地说：“好、好，现在我手头不便，过几天还你钱。”我说：“算了，穷哥儿们，多了没有，这点小意思我还出得起，送给你了。”从此，他对我更加帮忙。只要我来到码头，他就指使他的弟兄们给我搬运行李。我从上海来，他们把行李搬上码头；我从天津走，他们把行李搬上轮船。我也常多给他们点小费，所以他们上上下下都愿意来为我办事，使我免去许多麻烦和危险。有一次，我带两个同志去上海。为了保密，我们之间不能多交谈。我把他们安置在通舱里，叫他们看好行李不要动，我便走开了。不一会儿，他俩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不好了，箱子丢了。”我说：“怎么丢的？”他们说：“我俩上岸转了转，回来就不见了。”我说“箱里有什么东西？”他们说：“有党的文件。”这可糟了。我责备他们不该离开行李，他俩哑口无言，急得直冒汗。这时，我想起小山东来，就上岸找到了他。我说，

“咱们相处够朋友了吧？”他说：“当然是朋友啰！”我说：“既然如此，我有两个朋友，刚才在船上把箱子丢了。请你帮忙给找一下。”他毫不推辞，问明箱子的样子和丢失的地方就走了。不一刻，他领着三个人，把那个箱子拿回来了。那两位同志打开看了，所有东西原封未动。我们向小山东一再致谢。他说：“以后出门再不能大意了，这次是碰上我这几个兄弟了……”我说：“好了，这几位都辛苦了。这里有六块钱，小意思，每人两块拿去喝口酒。”大家便高兴地分了手。

最后一次由上海到天津正要上岸时，又遇到突然检查，检查得很仔细，这次带的文件是为准备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材料，改组河北省委的意见，十分机密，放在点心盒内。我想这次恐难过关，就迟迟上岸，准备把文件抽出夹在内裤裆里。忽然我看见码头上正有经常接我的码头工人，我一招手，他们几个人立即上船来一人拿一件，我居然空手上岸，乘人力车而去。

回忆那二年中，我先后带领过近五十个同志安全到达中央或河北省委，这种社会关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 新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〇年冬，组织上认为我在这条交通线上跑的久了，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便决定调我到北方局（天津）去工作。当时正是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错误的统治，我是作为河北省委改组顺直省委的中央代表团先遣人员到天津的。正值省委交通科长安子文同志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便接替了交通科的工作。

当时，虽然李立三同志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但党内“左”倾思想还浓厚存在。我一着手工作，就碰上河北省委面临立三错误

所造成的紊乱局面。

当时每天从陕西、山西、内蒙、东北以及河北省内各地来找省委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带着各自的问题，希望省委给以答复和解决。有的要弄清楚中央出了立三错误是怎么回事？有的问下边党内出现分歧和派别怎么办？有的是正常的接头，来汇报和请示工作；有的则带着悲观失望情绪前来诉苦；还有的是因受了批评来找省委发牢骚的……而省委本身正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呢？省委书记贺昌同志刚调走，新的领导班子还未配齐。同时还遇到两股势力的严重挑战。一是身在中央的“取消派”罗章龙一伙派人来天津和张慕陶、曹策、张小海等联合起来，成立了所谓反立三路线“紧急会议筹备处”，制造舆论，积极活动，与省委争夺当时北方党的领导权；二是以韩麟符为首纠集了一些叛徒、投机分子，打着第三国际的旗号，进行着半公开的政治撞骗活动。这两股势力都在起着分裂党组织、分裂革命队伍的罪恶作用。在国民党方面，东北军的万福麟作了天津警备司令，张学铭作了天津市公安局长，力争加强天津“治安”。南京国民党方面也派来大批特务政工人员，主要目标是对付共产党。同时各个租界的洋人也和国民党合作，在租界里抓起共产党来。总而言之，当时确有一种黑云压城、暴风雨将临的样子。

我的工作任务，正要求在这各种矛盾的集中点上去进行活动。

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与中央及北方各省来的同志接头，管理和传送文件，在河北省内除和天津市委的张友清同志接头外，还要和北平、保定、唐山、石家庄等地来的同志接头，为此，我必须天天频繁地往来于各个接头地点之间。这样，就容易暴露自己，常常为甩掉尾巴大费周折。

此外，省委还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到张慕陶、韩麟符各派内部和各地来访的同志中间，去进行思想争取工作。要了解他们的动向和要求，去传达宣传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主张，解释立三错误的性质，阐明党的工作的光明前途。从而教育和鼓励愿意革命的同志奋勇前进，说服和争取受蒙蔽因而动摇徘徊的同志站到党的方面来，揭露和孤立少数企图分裂党或投靠敌人的阴谋叛变分子。这样，我又必须常常出入在张慕陶、韩麟符两派队伍中间。事实上，韩、张之流，当时都已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了，因此，和他们来往，更容易暴露我的身份。

在一九三一年春季那三个月内，我在英、法、日租界之内，在平安、惠中、交通各大旅社之间，还有许多小客栈、联络点中穿梭来往，经常发现身后钉上了“尾巴”，为了甩掉这些尾巴，常常要连续转移好几个旅馆，有时要坐人力车绕道几个租界区和华人区，直到身后彻底干净了，才能到我要去的目的地。

一次，我走到劝业场附近，发现身后又跟上“尾巴”了。我转了几个弯，仍是甩不掉。心里倒有些紧张了。我加快几步走进劝业场大楼里，看见前边有一个墙角，便把身子闪过去。这时忽然有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只听一声：“跟我走！”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是谁，他又说：“快跟我来！”我仍在迟疑地看他，他说：

“你不认识我了？在轮船上……”啊，我看出来了，是那个没买船票挨了打的青年。他说“你别管了，快跟上我走！”不由我犹豫，他拉我走上二楼，进了一家茶馆，刚坐下，他向外看了看，马上拉起我又从侧面一个小门出去。我们上了三楼，走进一家饭馆，稍一停留，他又说：“也不能在这里坐，他们还会找来的。走！”他又带我从一个后门出去，又回到二楼上，闪进一家小茶馆。他



跟茶房咕哝了几句，对我说：“你在这里喝茶吧，这地方不要紧的，我回去看看就回来。”看见他十分老练，满有信心的样子，我感到不少宽慰，就安心地吃起茶来。回想着那一段往事：

一九三〇年，有一次，我坐船从天津回上海，见几个船员在毒打一个青年，说他没有买票。我见那青年被打得狼狈不堪，就上前劝解说：“我来讲个情吧，请不要打他了。”“念他是个小孩子，可怜可怜他吧。”查票员说：“可怜他，洋人查住我们吃不消。”我说：“朋友们看个面子，我拿出五块钱，请给他补个票吧。”查票员嫌钱少，周围人齐说：“行了，行了。这位先生肯出五块钱，就给他补个票吧。”我和大家又劝说了一阵，才算给那青年补了张票。到上海下船时，那青年问我的姓名，来上海干什么？我含糊地说，来上海有点事，办完了就到南京去……

真的，就是那个青年。他走回来了，高兴地说：“不要紧了，他们在那边找了一遍，找不见你，就都走了。”我正要感谢他的话，他抢着说：“咱们是朋友了。我们对你们也是同情的。我干这种营生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这一带是我的地盘，有事情找这个茶馆的老板，叫他找我就行。”这一次，他并不问我的姓名和住址，一直把我送出劝业场，又走了一段路，看看没有危险了，才向我热情地握手告别。看来，这个青年，实际是个讲点江湖义气的流氓无产者。

这时，省委对我的工作作了研究，认为我暴露比较严重，不宜继续留在天津，决定调我到东北去工作。去之前先躲起来休息几天。

二月间，由徐兰芝（当时的省委书记，后来叛变了）以及陈原道、阮啸仙、刘亚雄等同志组成了顺直省委的新领导班子。一

天，陈原道同志找我去说，最近中央有信，对我们工作有新的指示。你到法租界的“垦业公司”去取那封信。这个“垦业公司”是贺昌同志办起来的。设在法国桥那边的一座大楼里。那里挂着“渤海”等许多家公司的牌子，外边都知道那是一些商业经营部门。我们的“垦业公司”夹在他们中间，在二楼上有一套房间，陈设着柜子、办公桌、沙发、茶几等等，很象一个做大买卖的派头。过去一直是党的安全接头点。贺昌同志走后，这个地方只有陈原道、安子文同志和我知道。当时安子文同志外出了，陈原道同志忙得很，所以不得不叫我去一趟，临走时，陈原道同志又说：“第二件事，你去找一下李有才。”他写了一个小纸条给我。上边是：“李有才同志：好久不见了，有什么意见不要着急，希约个时间，我们当面谈谈。中央代表团陈原道。”

李有才是前顺直省委的秘书长。因为对批判立三错误有些看法和意见，所以，原道同志要约他谈谈。我把小纸条折成一个小纸卷，塞进我钱包的一处夹缝里，便向法租界走去。

我顺利地走进“垦业公司”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旁刚拿起一张报纸，便从外边闯进两个穿黑大褂的人。他们对我说：

“喂，房东请你去一趟。”我说：“我不是这里的人。”我看见来者不善，情况不妙，便作好思想准备。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周斌。”“干什么来了？”“找朋友找事干。”

“朋友叫什么名字？”“刘龙林。”“他到哪里去了？”“上街买东西去了。”“到什么地方？”“不知道。”“那你跟我们走一趟。”“我不认识你们呀！”我想和他们多磨一会，找机会把我钱包摸出来丢进一个角落里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我去摸口袋，马上掏出手枪说：“不许动！”一个敌人上来搜我身上，摸

摸并没有武器，才放下心说：“走吧，跟我们到法国工部局去！”

他们二人押着我下了楼，到大街上便从左右两边把我夹起来。那时路灯已经亮了，有几次走到灯光黑处，我总想乘机把钱包掏出来扔掉，他们大概查觉我的动作了，说“不许动”，并且把我夹的更紧了。一次，我看见一个厕所，便说，“我要去解个溲。”他们严厉地说：“不行！”

他们把我押进捕房，不由分说把我浑身衣服都脱光，仔细地搜查起来。看见他们在口袋里、衣缝间揣摸搜寻的样子，我想，要么是我太暴露了，早就引起敌人的注意，要么就是出了叛徒，已经出卖了党的机密。

他们在衣服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来，便拿起钱包仔细地搜寻，最后终于从那处夹缝里抠出陈原道同志写的那个小纸条来。

他们对我进行了一阵毒打，审问不出任何名堂来。从此，结束了我的地下交通生活，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狱中斗争，接受新的严峻考验。

(卢 焰 整理)

# 轉戰清河与水邊

帅  
荣

一九四二年，敌酋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动五万余日寇主力对我冀中六、七、八、九分区进行的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大体是一九四一年对我十分区的大规模扫荡的翻版。当时，我们十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正活动在潞龙河两岸地区。照军区的指示，我们机关及主力，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挺进到九、十分区交界的白洋淀一带。在白洋淀分区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由司令员周彪同志主持，我为副主任，委员还有参谋长刘秉彦、政治部主任方国南、副参谋长崔文炳、二十九团团团长黎光、政委蒋崇景等人。在会上同志们分析了当时形势，研究了军区的指示和我们的任务，一致决定，我们十分区部队的任务是：一面相机打击分散猖狂活动之敌，一面准备主力脱离白洋淀，进一步向外线转移。根据这个决定，分区参谋长刘秉彦同志，当即率分区机关及二十九团各一部，向白洋淀以东地区挺进，六月二十四日周彪同志、刘秉彦同志率分区直属机关

一部及两个战斗连队，进驻任邱县边家铺(六、七十户)，二十九团一部进驻候疙疸等村庄。当时占据鄆州、文安等处之敌，立即出动向我进攻。当我发现鄆州出动之敌兵力薄弱时，周彪司令员、参谋长刘秉彦同志下决心：令我主力二十九团坚决顶住松下旅团约两个大队的进攻，并阻止敌人向边家堡增援。令边家堡我两个战斗连队坚守边家堡村，并相机歼灭鄆州出动之敌。鄆州出动之敌是一个“剔抉队”，全部日军八十余人，由中队长伊豆文雄率领，

中午进至边家堡村西，发现我军后，当即展开，全中队的指挥官迅速集中察看地形，向我发起冲锋。为了歼灭这股敌人，我们迅速抓住有利时机，对敌发起反冲锋。首先集中了六挺机枪及其它连续火器，对敌正在集结看地形的指挥官们突然开火，并压制其火力及战斗群，我警卫连同时迅速出击，从敌人右翼以集群手榴弹予敌以重大杀伤，接着即与敌展开肉搏战。在我突然打击下，敌人措手不及，中队长伊豆文雄头部负伤被我俘虏，其他指挥官及士兵大部伤亡，除半个班乘黄昏逃窜外，日军这个“剔抉队”悉数被我歼灭。

这次歼灭战，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给我军民以很大鼓舞，群众从几十里路外纷纷用大车小车，拉着白面猪肉，赶来慰劳部队。边家堡战斗，我军虽然给予“扫荡”大清河南岸之敌一部分歼灭性的打击，但从整个形势来看，我军仍处在被动地位。日寇“扫荡”我六、七、八、九分区的主力仍没有撤退迹象，而且用尽阴谋手段，企图继续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我各分区反扫荡部队一个多月以来对敌英勇作战，双方都有大的伤亡。在我中心地区日、伪、汉奸实行“杀、抢、烧”三光政策，逐村建立碉堡，修筑公路网，挖掘封锁沟，妄图摧毁我抗日政权，建立伪保甲制度。这时在冀中广大平原上我军主力兵团暂时不易活动，而目前大清河南岸日寇主力在边家堡战斗受挫后正伺机对我军报复，根据当前情况及军区指示，军政委员会研究认为，我们与敌人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当前应千方百计保存有生力量，使日寇的阴谋不能得逞。于是决定：

分区机关、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周彪、刘秉彦同志率领精干部队及机关人员相机深入大清河北，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

的方针，依靠地方政府及广大群众，坚持恢复与开辟十分区；另一路由我和副参谋长崔文炳、政治部主任方国南率领警卫连、教导队、司、政、供、卫机关及主力二十九团（只有精干的五个连）突过平汉铁路进入山区根据地整训，“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总结经验，加强学习，打回大清河北”。增强部队战斗力，以便胜利度过相持阶段，迎接对日反攻的曙光。

根据军政委员会这一正确决定，我们分区一路一千余人的机关及部队，接受了向外线转移进入山区整训的任务。但是在敌人重兵大“扫荡”环境下，应该选择怎样的外转路线？怎样摆脱当前大“扫荡”之敌，又怎样穿越大片的敌占区？怎样越过敌重兵封锁的平汉铁路，使机关部队安然进入山区根据地呢？这也是一场十分艰难和激烈的斗争。

### （一）横 渡

我们选择向路西转移的路线，是从日军第十五混成旅团与一一〇师团结合部插过去。现在对转移过程中沿途及其附近的日军番号已记不清楚。先从平汉路边缘说起吧。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保定、高碑店是日军屯兵要地；保定东北方向的徐水、定兴、北河店、固城车站都有日军严密守卫、来往巡逻，沿途路口筑有大小碉堡；新城、雄县、位于大树刘庄（我准备出发地）以南的高阳、任邱县，也都驻有日军。当时白洋淀以南是敌人重点“清剿”区之一；白洋淀以北、大清河北地区敌早已碉堡林立；只有白洋淀是水网地带，群众条件甚好，可作为我主力外转隐蔽集结的基地。但当时白洋淀周围也都是敌人据点，白沟河、鄆州、青塔、端村、老河头、安新、王家寨、郭里口、赵北口都驻有敌人，前

进路上的容城驻有日军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其他是伪军为主。知道的伪军有：雄县地区的张来子；白沟河—新城—高碑店地区的铁杆汉奸王凤岗；铁路以西易县、涞水地区的陈老耗子残部和叛徒孟克城汉奸部队等。总合起来，在我选择外转路线及其两侧的日伪军约有数千人之众。我们部队要进入山区，必须突破这些敌人的重重封锁包围，行程一百五十六华里，还要穿过密如蛛网的敌占据点、公路；涉过府河、大清河、拒马河、易水河等四条河流，而首先必须渡过白洋淀五十华里水面，突破敌人封锁的水路——津保主航道，还要越过平汉铁路和突破敌人封锁我路西山区三四条大的封锁沟。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召开了科以上干部会和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进行了反复的动员，分析了我们的困难，研究了战胜困难的办法，同时也认真分析了当时对我军的有利条件。同志们认为，敌人的作战行动很不容易统一起来，特别是伪军各霸一方，行动更难统一；在伪军中有我们一部分工作（如张来子）；我军外转的出发地区——白洋淀群众基础很好，淀里遍地芦苇和大小港叉又是我天然屏障；在白洋淀天津至保定的主航道上，敌人小的船只一般可以通航，但水面上有很多水草、菱角、鸡头米之类阻挡螺旋桨转动，敌汽艇航行困难；转移路线沿途的绝大多数村庄，我抗日政府的政令都还可以行得通等。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同志们群情激奋，充满信心。当时，我们提出的总的政治口号是：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有我无敌。……完成主力外转进山整训这一任务，必须坚决消灭沿途敢于拦阻之敌。

会议之后，我们即抓紧进行准备工作。出发前，我司令部侦察科、政治部锄奸科、敌工科，各自按照自己的工作系统，在我部

队前进路线上作了侦察和布置，九分区和九地委积极协助掌握敌情、准备船只；部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我们这支一千余人的部队，分为两个梯队，分乘一百多只中小渔船，从白洋淀南岸的大树刘庄、西大坞、七间房出发，二十九团五个连由团长黎光、政委蒋崇景率领为第一梯队，司、政、供、卫机关及警卫连（连长魏宝堂）、教导队（队长张廉卿、政委刁振林）四百左右人，由我直接率领为第二梯队，并肩前进。

六月某日夜晚，在我们横渡白洋淀时，满天星斗，微风拂面。当我船队通过郭里口据点西北淀时，敌岗楼上的灯火看得清清楚楚，虽有芦苇遮掩，但距敌不过千米，完全在机、步枪有效射程之内，我全体指战员手中紧握武器，准备随时应战；为了减小摇船的响声，水手们将带着的菜油，轻轻地洒在“棹合页”上，使船棹活动时没有声响，当船队经过岗楼附近水域时，船工们又用携带的大木锨，轻拨水面，驶船前进。这时在王家寨据点内的我敌工人员，已与我内线关系姚××取得联系，掌握伪军是夜“不发一枪、不下岗楼”。活动在郭里口据点内的我秘密游击小组，这时也分三处在村中放哨，监视敌人，如果敌人下岗楼时，则鸣枪报警，把敌人引向另一方向，掩护我西北面船队顺利通过。是夜，敌毫无动静，约在夜间十二点钟左右，一个由数十只船组成的满载我机关、部队人员的船队，乘着微风，船头轻轻地拍打着水浪，静静地通过了敌人把守的津、保主航道，登上了向平汉铁路以西我山区根据地进军的白洋淀北岸李郎村。

为了保障我军行动的突然性，在我横渡白洋淀之前，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李庚申同志，带领侦察人员潜入白洋淀北岸之大、小王村一带，侦察敌情和前进的路线，进行佯动，一忽儿问保定、



高阳、徐水敌情，一忽儿又问附近据点兵力多少？枪支弹药、工事情况如何？有意放风，迷惑敌人。加上边家堡歼灭战的威力，敌人闹不清我们十分区部队要干什么？远处的敌人还没有预料到，附近据点的敌人只愿加修工事，白天也不敢出来，夜间更是胆战心惊，严防我军对他们进行袭击。为了配合我军的行动，我安新县锄奸团熊管、刘成、徐果等同志，抓紧时机在城内及时、果断地锄掉了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打掉了安新敌人的一个有力耳目；我们还有熟悉白洋淀及淀北地区情况的雁翎队（安新县三区小队）和容城县大队，积极配合行动和担任响导。出发前，白洋淀及附近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子弟兵更是全力支援，关心备至，在一日之间给我部队送来了各式各样的干粮：有高粱、棒子面加麸子面饼子，有锅爆鱼，还有咸菜、葱花儿、鸡头米、菱角和盐，有的饽饽里头还裹着煮熟了的鸡蛋……也有煮熟了的包谷……。在那艰苦的年月，乡亲们自己吃着“地梨”、“苦菜”、“榆叶”，有的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把仅有的一点东西拿出来送给了自己的子弟兵。有的还送了鞋，有新的、有半新的、有打了补丁洗得干干净净的。有的在鞋底钉上钉子、打上掌，真是对子弟兵关心得无微不至！分区机关的驻地大树刘庄是个英雄的村庄，村长王道新和全村群众一致约定：在抗日战争中，大树刘庄的男人不当汉奸，女人不嫁伪军，并且说到做到。我们房东刘大妈发现我们要出发，依依不舍的问：“准备干粮，你们要走哇？……”我们只得回答“大妈！打起仗来吃，要跑路！”群众心里明白，但对我部队的行动守口如瓶。白天我部队休息，准备行动，群众却有组织地自动做着三件事：一、悄悄地到门口、村口放哨；二、派小船出去“打渔”，了解淀中敌情；三、妇女们

到鄆州、青塔等敌据点去“赶集”，以“卖鱼”“卖苇”为名侦察敌情。为了保守行动的秘密，白天船只一律荫蔽在白洋淀的沟沟汊汊里边，船工们个个争先恐后，以能运子弟兵为光荣，船仓里掏净了积水，铺上了仓底板，篙棹齐备，还带上鱼叉、鱼网、鸭枪等既能捕鱼打雁，又能自卫和掩护自己的武器和工具。还准备了能够救生的葫芦、苇捆子等紧急救生工具。是夜七时，一声令下，刹时间船靠码头，英雄的人民“水手”，热情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登上送行的船只！白洋淀人民群众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不当汉奸，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教育和鼓励着我们人民子弟兵，人民群众把子弟兵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把部队生命和自己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真正是同生死共患难，鱼水相依，鱼水情深！

## （二）西 进

我们这支一千余人的队伍，横渡白洋淀在北岸登陆后，因封锁消息，敌人未曾发觉，我二梯队只休息了一天。二十九团绕容城北，我二梯队绕容城南，星夜向六、七十里外的平汉铁路挺进。为争取时间，决定急行军，为了行动的隐蔽、秘密、迅速，尽量绕村而过，许多干部、战士的脚都被庄稼茬子扎出了血。穿过几十里宽的大洼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找不到一滴水，指战员们的嗓子眼渴得“冒了烟”。我警卫连的战士们时刻不忘保卫机关的光荣任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又自动的把一部分灌满清水的水壶，送给了机关同志饮用，干部接过水壶，见战士们渴得直喘气，舍不得喝，将水壶又递给身边的战士喝，战士见干部让给自己喝，自己也不肯喝，又奉还给干部，干部见此情景，

只抿了一口，润润喉咙，也不肯多喝，一壶清水传遍长长的行军行列，滋润着每一个同志的心，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之情实在感人肺腑。为了贯彻军政委员会“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的决心，病号和确实走不动的女同志，只得随走随“坚壁”，托给地方政府代为掩护。我和作战科长孟平走在尖兵排的后面，以便及时应付瞬息变化的各种情况，部队刚刚绕过杨村敌据点，越过拒马河，进到东韩村，天色已拂晓。这儿离铁路还有二十多里路，前面高碑店是敌屯兵大据点，保定距此也只有四十公里，这两面敌人都有铁甲列车，前有铁路封锁线，后有杨村敌据点和狼沟大洼，天色已亮，怎么办？司令部一面布置警戒，并立即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此时此刻，部队已经很疲劳，为了不惊扰老乡，不担任警戒的部队已成行地躺在街上呼呼地睡着了。干部会上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同志们，咱们蹲下来了！蹲下来是准备挨打呀？还是准备打人呀？”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回答说：“当然是准备打敌人！”准备打人，我们二梯队人手倒不少，但武器不多，子弹也很有限。一个警卫连不过百余人，教导队是个武装的战斗队，二百人左右，武器有：日本三八式，多数是老套筒，七九式、汉阳造……，好在我们还有几挺机枪和一挺重机枪，有不少手榴弹可以给敌人作“干粮”。但我们的机关人员多数是徒手。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向部队进行了紧急动员，说明：日军扫荡我中心区的主力，当前仍未转到外线来，附近据点的鬼子都有守备任务，机动兵力不可能太多；周围的伪军王凤岗、刘化南、赵玉昆等汉奸武装，它们是占地为王，勾心斗角，保存实力，怕伤亡；而我们是在党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经过残酷斗争和频繁战斗锻炼的一支人民子弟兵，特别是在平原进行村落防御

战斗，我们也是有经验的；现在我们依托村庄，坚守防御，杀伤敌人，争取时间，夜晚突围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在韩村三面开阔地，一面背水，对我防守有利。我们当前的口号是“蹲着不走，准备打人，打而不散！……不然一个个叫人把羊牵走了，还有什么干头啦？！”大家听了，不约而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同志们动员起来了，老乡们也弄清我们是八路军，陆续打开了院门，很快主动协助部队构筑防御工事。有的把大车拉出来横着堵在街口上，有的把树枝锯下来压在大车上，有的搬土坯交错着垒上半人多高的两堵墙等等，想一切办法使敌人进不来。紧接着又动员各家协助部队掏墙连院，打通部队在村落战斗中的运动通道。部队的同志，抓紧时间，构筑简易战壕，选择和构筑了机枪阵地，在村内制高点的高房上构筑了掩体。警卫连副指导员，带着机枪射手，到村西南角的堤坡上，嘱咐射手说：如果南边敌人来了，必然顺着堤坡抢占对面的坟地，到时候，不靠近，不理他，靠近就向死里打……”。在村西面，另几名机枪手很快筑好了掩体，由于乡亲们的帮助，一条由交通沟连结的单人掩体工事，迅速出现在村落前沿，这时，我指挥员又和战士们一起目测距离，制定射击计划，每个人要做好在敌距我一五〇米、一〇〇米、五〇—三〇米的不同距离时，使用手中武器歼灭敌人的具体措施。

当我们正在构筑工事时，高碑店、定兴、徐水、容城、白沟河等据点的敌人，先后出动向我包围。开始我们动员群众向外疏散，当发现敌汽车已进至杨村时，我们就动员群众在村里隐蔽。上午十点钟战斗打响，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战法，一开始就吃了大亏。战斗开始时，敌人只是向我进行炮击，连续向我村庄和阵地

打了足有七、八百发炮弹，一直打到十二点钟，我们未动声色。这时也许敌人认为我军被炸死、炸伤得差不多了，首先从村东北角的杨树林窜上来几十个敌人，在它通过开阔地时，我们一枪未发，敌人愈加胆大了。待敌进到距我百米以内和几十米时，我机枪、步枪突然开火，一阵猛打，这股敌人只跑回去了两三个，其余都撂倒在我阵地前沿。紧接着敌人对我又开始了连续的炮轰，我们坚强的战士，沉着应战，坚守阵地的坚守阵地，隐蔽待机的抓紧战斗准备，在余暇之际，有的同志还在下棋，看小说，说说笑笑。群众见我们这样沉着，虽有个别受伤者，也不再惊慌，说时我卫生人员又及时为群众包扎了伤口，开展了宣传工作。敌人打炮之后，以为这回把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村西南方向的敌人，果然顺着堤坡畏畏缩缩的爬了上来，并抢占了距我二百米的一块坟地，但我们的机枪射手心中有数，不惊动它，只等敌人探头探脑又在抢占距我百米以内的一片坟地而似到未到时，我们的机关枪、步枪和手榴弹突然一齐开火，上来的这股日本鬼子约二十余名当场毙命，其余狼狈跑了回去。这时，我在西面从望远镜里看到一个拿战刀的鬼子，当即命令部队“集中火力，把那个拿战刀的傢伙打死！”我的话音刚落，敌小队长四脚朝天，一命呜呼。小队长一死，这股敌人暂时龟缩了。隔了一个时间，村西南面河对岸之敌又上来一股，它们让一些群众和孩子们走在最前面，边走边扬起了很多沙土，原来几次杀伤敌人之后，敌人又施展阴谋，抓来了老人和孩子，逼着走在前面，扬起沙土，企图混淆目标，遮蔽视线，掩护他们前进。当敌人进到距我阵地很近的一条河边时，又逼着群众过河，这时被抓的群众和孩子们拼命跑过了河，快接近我们时都跑散了，这时敌人只好畏畏缩缩地淌河，我机枪射

手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敌猛烈开火，淌河的敌人被我打死十来个，其余的再也不敢过河。打得最激烈的还是村东大庙附近，敌人企图抢占大庙这个制高点，如果大庙被敌占领，我韩村街内都要落在敌人火力控制之下，因此我对这个要点加强火力，加强指挥，加强兵力。这里指战员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提出“与大庙共存亡”“一定不让敌人占领！”我坚守大庙的部队选择了几名特等射手，以冷枪打击、杀伤、消灭露头之敌，只要敌人在庙旁一探头，“拍”！一声枪响，准叫它有死不能活。打到最激烈时，我与敌只有一墙之隔，敌人手榴弹投过来，我们战士就迅速拣起来马上投过去，用敌人的手榴弹来还击敌人。最终，敌人丢下不少尸体，被我击退，我部队牢牢地守住了大庙这个制高点，敌人的企图完全落空。战斗至下午五点钟，我军只伤亡十来个人。为了不暴露目标，群众想出很巧妙的办法，为我部队做饭，乡亲们想办法把烟筒堵死，把炕洞与炕洞相互打通，逼着做饭的烟火在炕洞里串来串去，就这样为我们做好了烙饼、高粱饽饽、面条儿和绿豆汤。在战斗中，群众看到我们有的战士衣服破得实在不能穿，就拿出新衣裳来，有的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一定要战士穿上，战士们一一婉言谢绝。群众说：“无你也无我”，一定要穿上。战场上到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同生死，共战斗的英勇悲壮的动人场面。战斗打到天黑，敌人只是干打炮，再也不敢冲上来了。这时，我与副参谋长崔文炳、政治部主任方国南、作战科长孟平开会商量，大家说：当面的敌人被我重创已不敢进攻，我们老蹲在这儿也不是办法，争取时间，赶快突围。走！怎么走法呢？当面的敌人虽然不敢进攻，但打了一天，敌人已经越聚越多了，四面八方的敌人，甚至连保定、高碑店以

北的敌人也都赶来增援了。怎么办？我们已接近敌人重兵封锁的铁路线，天快拂晓，部队应向何处去？我们还是一个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向西北突围，冲过铁路去！决心下后，我和孟平同志就侦察周围的地形和敌情，发现村南小高地及河堤后面的敌人，仍然埋伏在那里未动，不断的打冷枪冷炮，企图拖住我们，等待援兵对我们围歼；村东北角的敌人仍龟缩在柏树林中，在村北面有一条大干沟，深约十余米，沟坡沟顶都长满了酸枣树、野芦苇，沟底隐约可见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路，沟顶部的两边，在相隔二三十米处都设有敌人的哨兵。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当即用电台通知二十九团向西北方向突围过路西去，同时命令分区机关和掩护部队的人员，把一切走动起来有响声的东西，都要绑扎好，突围时不准有一点响声。战士们把手榴弹和刺刀这两个走起来常“打架”的东西，分绑在自己身体的左右两边，鞋子也绑扎的结结实实，跳跳蹦蹦，演习妥当。为了防止意外情况，还规定了在突围中万一失散时到铁路以西集合的地点。午夜后，我们这支五百人的队伍在街中心鸦雀无声集合起来，由本村响导魏××带路开始突围，为了迷惑敌人，先向堤南面不断打枪，打手榴弹造成敌人错觉，主力却从村西北方向静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顺着预先看好的那条一里多长的大荒沟底的小路，从敌人沟顶哨兵的鼻子底下摸了出来，直插北河店以南的铁路线。快到铁路线时天已拂晓了。是过路还是不过路？部队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又打了一天仗，行军速度慢了下来，但我们还是边走边对同志们说：向前！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咬咬牙过难关！冲过铁路封锁线！指战员们迅速解下裹腿，准备越过铁路旁边的大封锁沟。就在这时，预先派出的侦察员发现铁路两侧两个村庄间大封锁沟上却

留有一条大车道，而盘据在这两个村庄的敌人都已经出动去合围韩村了。天亮了，敌人万万也没有料到我们敢从此过铁路线。而这条意外发现的大车路，却正是我们一条十分有利的通道。为了争取时间，迅速通过铁路，我们一遍又一遍动员大家坚决过到路西去！过到路西再休息！大家一定要跟上！就这样我们这支满面泥沙，又黑又瘦，衣衫褴褛而又步履艰难的部队，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党员、全体干部的率领下，怀着高度的阶级与民族觉悟，团结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迅速、沉着地跨过了号称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封锁线。过路后同志们心情振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泥人一般，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但大家心里也都十分明白：当面的敌情仍很严重！转移到山区根据地的任务仍不轻松！艰巨的战斗任务，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完成。

### （三）再 战

越过平汉铁路后，部队进到易水河边的大牛村，东方已经出了太阳。副参谋长已命令部队休息准备做饭，管理人员在号房子，没有担任警戒任务的战士们，抓紧时间已躺在地上享受着机会难得的睡眠。我和警卫员小郑按照传统在察看情况和地形，发现大牛村这个村庄大而散乱，不易防守。而临近的小牛村，居民房屋比较集中，村庄周围还有土围墙，便于防守。我当即与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作战科长商量改变决心：无论如何，不论多么疲劳，部队也要立即转移，迅速进驻小牛村，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当部队刚刚进入小牛村时，我在村西南街口派出的警戒，已与姚村、大王店出击之敌发生战斗。我机关、部队当即全体动员，迅速在小牛村构筑简易防御工事，堵塞街口、掏枪眼、打通



院落通路等，做坚守村落的各项准备。于此同时，战斗部队业已展开，我命令副参谋长崔文炳、作战科长孟平分南北两面掌握部队，坚决固守村落，大量杀伤敌人。

合围小牛村之敌，日伪军约千人以上，分三路向我进攻。一路从平汉铁路定兴、北河店、徐水等地尾追我军之敌，由小牛村东面和北面向我进攻；二路从易县出动之敌，在小牛村之西北方向展开向我进攻；第三路由姚村、大王店出动的日本黑须大佐所属部队及数百伪军，占领了小牛村西面和南面的松林及小高地向我展开进攻。从平汉铁路方向尾追我军之敌还配有装甲车，在我阵地前沿机动作战，对进攻之敌实施火力支援。战斗中，我们对部队就地反复地进行动员，我指着距小牛村只有三四十里路的西山对同志们说：西面眼望的山区就是我们转移的目的地，它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所在地，同志们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二十九团就在易水河北岸的金台陈村钳制着敌人，配合我们战斗。大家明白这是进入山区决定性的一仗，一致表示“坚守阵地，不许敌人侵占”“大量杀伤敌人，准备夜间行动”。

上午十点钟，北面之敌在装甲车火力支援下，多次向我冲锋均未能突破阵地。南面进攻之敌，向我发起三次冲锋，也被我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短促火力所击退。这时，北面日军约两个小队，又通过开阔地向我阵地冲来，二百米，我们不打，一百米，我们还无动静，敌人即壮着胆子直扑我村落前沿阵地。就在这样近的距离，我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突然开火，打得日本鬼子在我阵地前沿滚的滚，爬的爬，这两个小队的鬼子多数当场毙命，只有几个逃回（战后敌用两辆汽车将尸体缠白綾子搞走）。从此北面的敌人再也不敢上来，敌人丢在我阵地前沿的

机枪，被敌重机枪火力控制，我一直也未能抢回。这时，一直守护和指挥我重机枪的作战科孙参谋不幸胸部负伤。战斗至下午三点左右，突然天空刮起黄风。风越刮越大，直刮得昏昏暗暗，视野模糊。外围增援之敌又陆续赶到，重重包围了小牛村，企图把我们这支部队消灭在易水河边。在激烈的战斗中，小牛村的青壮年挺身助战，有的帮助战士送吃的，有的帮助重机枪灌水，有的护理伤员等，真是同仇敌忾，军民命运相连。

我们这支部队从白洋淀出发，已经是四天三夜在连续行军作战，干粮早已吃光，进入沙壤地带后，气候又特别干燥，虽不能说弹尽粮绝吧，但所剩子弹已是很少很少的了，我们一面动员部队节约弹药，一面由机关人员在机动的步枪子弹中，挑拣出一些较好的供机枪使用。为了坚守阵地，我们指挥机关，一面在战场上巡视，同时又下了三道命令：第一，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要站在最艰险的地方亲自指挥，司、政、供、卫机关干部，凡体力强的都分到战斗部队去，加强第一线并鼓励士气；第二，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坚决守住阵地，把敌人打回去；第三，要求全体指战员、机关人员，关键时刻和敌人决一死战，无武器的，每人手中要找一件武器，准备必要时进行自卫、肉搏。

黄昏以前，风势稍微减弱下来，但敌人却发了疯。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在调整火力和兵力部署，随即集中火力向我西南街口工事猛烈轰击，我西南街口工事一堵墙被打塌，坚守阵地的我一个班战士大部伤亡。这时刻集结在西南街口对面松树林的数百敌人，却向我发起了集团冲锋。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小队日军，由一个日军小队长率领，“呀呀”怪叫着直扑我西南街口。这个日军

小队长头戴钢盔，手舞指挥刀，鬼子兵有的脱个光膀、有的身穿小褂，头戴钢盔。眼见得这一小队日军已占领了我西南街口约十米宽的阵地。在这关键时刻，我两位头部负伤的战士却仍挺立在街口，依托两侧围墙坚守阵地，沉着杀敌，对冲上来的敌人回敬手榴弹，站在最前沿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战士是个墩墩实实的好汉，虽然头部负伤，绑着绷带，仍然左手持枪，右手将手榴弹一个一个地投掷在敌群中爆炸。我第二道围墙的机枪射手机警地正以火力杀伤敌人，但仍旧阻止不住敌人的冲击，敌后续部队继续向西南街口冲来。此刻我机关人员正烧毁文件，司、政、供、卫机关科长、干事、勤务员、炊事员、宣传员、卫生员、男女老少同志每人手中拿起了一件武器，有的拿起菜刀，有的拿起铡刀，有的拿起片镬，有的拿起铁铤，有的拿着股叉，有的拿着镰刀，各占有利地形，准备一旦敌人进村后进行肉搏。与此同时，我担任预备队的警卫连一个排，由孟平同志带领迅速向突破我前沿之敌进行了反击。我们这个警卫连的指战员，在紧急情况下，掩护分区机关，冲锋陷阵，总是人人奋勇当先。在该排领受预备队的任务后，他们就深知这个任务的份量，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上好了刺刀，揭开了手榴弹盖。一声“反击”令下，该排立即跑步出击，迅速展开了两个班为第一梯队，一个班为第二梯队，在我二线两挺机枪侧射火力支援下，乘敌立足未稳，一阵手榴弹把冲上来的敌人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晕头转向。我坚守在最前沿围墙口的那名战士，看准了冲到面前的那个日军小队长，只一枚手榴弹就将他炸翻在地，结束了他的狗命。击毙了日军最前沿的指挥官后，敌队形顿时混乱，我突击队和原来防守西南街口的部队一起，对敌展开了肉搏战，片刻间将占领我西南街口前沿阵地的这

一小队日军全部歼灭，恢复了失去的这十几米宽阵地。敌人的后续部队见此情景，掉头鼠窜。我机枪、步枪随即实施火力追击，敌人丢下大批死尸，狼狈后退。战斗沉寂了下来，在敌人稍加整顿后，再次向我发动冲锋，企图抢回日军小队长及其它遗弃的尸体，但除继续增加其伤亡外，毫无所得。我军一直坚守在西南街口两侧头部负伤的那两名战士，一面包扎伤口，一面笑着对我们说。“没关系，敌人来了叫它丢下，回不去。放心好了！”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者！

敌人最猛烈的一次进攻被打退了。但看看我们战士的脸上却全是汗水加上泥沙，两颊已垠起一条条小梗儿，眼眉毛都是泥糊的一般，身上、背上层层汗水积成盐霜湿透衣衫，轻伤的战士们继续坚守在阵地上，严阵以待……。我们战胜了人敌，坚守住了阵地。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时我人民战士战斗胜利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天黑以后，黄风又刮得厉害起来，我对孟平说：

“孟平同志，机会来了！”掌灯时分，经再次侦察，我前沿阵地当面之敌确已收缩，我们掩埋好牺牲同志的遗体，首先派一个班向东南佯动突围成功（这个班除一人外，在路西全部胜利归队）。我们二梯队这四百余人乘着敌人正在喘息，冒着大风，利用夜幕，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在南北两路敌人结合部的一片开阔沙滩地上，冲出了千余敌人的包围圈。突围时，部队沉着肃静，重伤的同志，动员群众用担架抬上，沿着易水河南岸的滩沙，向西急进。

#### （四）进 山

小牛村战斗突围后，部队又越过了两道大封锁沟，在穿越罗村以南的最后一道封锁沟时，又遭易县之敌伏击。由于我军沉着

果敢，未受任何损失，安全地进入南北虹口—野沃—独乐—太行山区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二十九团也完整无损安抵山区，胜利地完成了主力外转，保存有生力量和在山进行休整的光荣任务。

三十几年过去了。为后人幸福生活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烈士已长眠地下，我们这一支一千余人的革命火种，在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在白洋淀及沿途父老兄妹护送下，在军区首长及一分区战友亲切关怀下，一路上克服了种种困难，消灭了拦阻之敌，终于胜利的保存下来了。

参加那次突围战斗的我十分区机关、部队的四百余位同志，除了去延安学习的同志外，经过整训大部在一九四三年后又经易水返回大清河北，与二百万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继续战斗，参加了恢复和开辟平、津、保三角地区的工作，一直到日本投降。这些革命火种，在解放战争中，又参加了歼灭十分区土顽王凤岗两个旅的战役和清风店战役、解放平津等战役，立下战功。凡幸存到今天的都是奋战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了。

(周克整理)

# 新世纪剧社

傅 铎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蒋介石国民党驻守在华北的八十万军队，像决堤洪水一泻千里狼狈南逃了。日寇叫嚷着“三个月灭亡全中国”，沿着平汉路、津浦路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华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人人胸膛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在这国家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奉命从陕西出发，东渡黄河，星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给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就在这抗日烽火开始燃烧之际，新世纪剧社在冀中蠡县城内应运而生了。

## （一）

新世纪剧社是随着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在敌后诞生的文艺团体之一。在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影下，冀中（今河北省中部）各县纷纷成立了“抗战救国动员会”。蠡县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方，早我们党的地下组织，所以蠡县的救亡运动开展得既快又好。有共产党员打先锋、做骨干，首先把当时失学的学生、教员召唤起来。面对日寇的侵略，真是一呼百应，人人义愤填膺，有压抑不住的抗日怒火，愿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生存而战斗。

于是组织了“蠡县抗日救国动员会”，下边分设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并联合组成了若干宣传小组，像一股洪流分别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每到一村召集村民开会、演讲，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支援抗日战争。但是这种口头宣传，毕竟是单调的，你在台上大声疾呼，喊哑嗓子，下边群众还是为数不多，而且是你来我往，经常走动。因此，总不免有号召力不强，收效不大的情况存在。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确实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当务之急。一个宣传小组提供了先进经验。他们让一位女同志唱了一个歌子，歌名叫《在松花江上》，颇受群众欢迎。象“吸铁石”一样吸来了不少听众，台下鸦雀无声，洗耳静听，而且听完之后还恋恋不舍，不愿离去。一位老大娘一边听着歌，一边流着泪，走上来拉着那位唱歌的小女同志说：“闺女，再唱个（松花江）吧，着实好听。一个歌子唱了几遍听不厌，听不倦。”从此，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家议论纷纷，如果能成立个剧团有多好，锣鼓一敲，又演、又唱，红火热闹，群众准欢迎，准能召来人山人海。为了加强宣传效果，说干就干。于是，就由县教育界的老前辈，在全县知识分子中享有威望的刘通庸同志挑头，负责筹建剧社。我在蠡县高小读书时是刘通庸同志的学生。在学校每次开同乐晚会时，我都参加演出，又装男又装女，又演又唱，是个文艺的爱好者，号称“活宝”。失学以后，又在保定一个教会办的剧社学演过一年多的文明新戏，所以也被邀参加了剧社的筹备工作。那时我既失学又失业，在家务农，是村“抗战救国动员会”的负责人，听说要成立剧社，我是十分拥护，如鱼得水欢欣之极。蠡县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听说成立剧社都很热心，积极为剧社推荐人才。很

快挑选了一批吹、拉、弹、唱的活跃分子。自然在组建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旧社会那种戏子、王八、吹鼓手的封建传统观念起了一定的梗阻作用，被推荐出来的演员大多是学生、教员，那时算是有知识的体面的人物，有的嘴里不说，心里总是有个不大不小的疙瘩，认为到剧社去演戏不大光彩，不够体面，舆论也不好听。当然在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这个大前提下，生命可抛，热血可洒，还有什么光彩不光彩、体面不体面可谈呢。男同志们思想容易打通，困难的是女同志。尽管她们个人可以完全服从抗日工作的需要，家里的老人、兄长思想不通就是一个难关。因为剧社就在家门口上活动，亲戚朋友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台下不见台上见，当个“戏子”还是“坤角”，好像矮人一头。段森同志刚十三岁，很有表演才能，聪明伶俐，很愿参加剧社，她的哥哥听说妹妹参加了剧社，转弯抹角的找理由，拉段森同志回家，说什么年纪小离不开家，还得上学等等。他把段森同志拉回家，段森同志又偷偷出来，又拉回家，她又偷偷出来，最后终于短期离开了剧社。还有楚萱同志的母亲，坚决反对女儿到剧社来演戏，说天老爷来也不许参加，总是强调念了半辈子书，念来念去当个“戏子”没有出息。把楚萱同志关在家里，用绳子绑上，坐了“禁闭”。经过了不少人以“车轮战术”来劝说，做了不少工作，讲了不少抗战大道理，最后总算是勉勉强强打通思想。

经过了一段筹备工作，人员算是凑齐了，总共有二十一、二人，还算精干。推举出张春霖当社长，下设总务部、剧务部，刘纪同志负责总务部工作。因为我演过戏，多少有点实践经验，矮子里边拔将军，所以让我负责剧务部的工作。刘通庸同志虽不算剧社成员，但他实际是剧社的“后台老板”，剧社有什么困难，



都是他跑前跑后。剧社组建起来了，剧社成员王偕同志把他家的一处房子腾出来做宿舍、办公、排演场地。其他的一切演出器材还八字没有一撇呢，按刘通庸同志的说法“骑着马找马吧”。由于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宣传工作的急需，剧社要马上成立起来，快快排戏，快快演出，快快和群众见面。

刘通庸同志费尽心机给剧社起了一个名字——“新世纪剧社”。顾名思义，就是创造新的世纪，迎接新的世纪，这个名字得到大家的称赞。

三八年二月，一块写着“蠡县新世纪剧社”蓝底白字的醒目大牌子，挂在县城西小街王偕同志的大门口，从此新世纪剧社正式诞生了。

## (二)

剧社成立的那天，刘通庸、张春霖、刘纪同志，清早就赶来剧社驻地，等着欢迎大家。为同志们整理床铺，扫院子，扫屋子，抬桌子，搬凳子，忙了个不亦乐乎。早饭后，剧社的同志们扛着行李，带着自己的胡琴、弦子、大鼓、笛子、口琴等乐器从四面八方陆续来集合。人人喜笑颜开，都是年轻人，都是活跃分子，不少人是老同学，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又走到一起来了。一见面说说笑笑，蹦蹦跳跳，好不热闹，霎时间一个沉静冷清的小院里一片生机，春意盎然，满院沸腾起来了。一个新单位，一批新成员，面临着新的战斗任务，呈现着新的气象，犹如迎来了新的世纪。

很快就着手排戏了。剧本有的是领导找来，也有自己编写的，还没有导演，怎么办呢？只有自力更生，没有“砾砂”，“红

土”也就是好的了。我和郭克同志演过戏，就分担了导演工作。说实话我们都不懂导演专业，真有点打着鸭子上架。过了几天，齐祖耀同志来了，他演过戏，比我和郭克高明，也参加了导演工作。虽然我们都缺乏艺术实践经验，好在我们都有一股子抗战救亡的热情，都有一股子敢说敢做、不怕丑、不怕羞的创业精神，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们。齐不齐一把泥，丑不丑一合手，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我们导演、演员合作得很好，排演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整个剧社连男带女只有二十一、二人，同时排几个戏，一个人扮演几个角色，扮了男的扮女的，扮了老头扮青年，扮了鬼子扮汉奸，真是放下“流星”耍“大刀”，没有喘息的机会。工作越紧张、越忙乱，同志们心情越愉快、越舒服。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看着门口挂着亮晶晶的“蠡县新世纪剧社”牌子，听着院子里的鼓声，吹、拉、弹、唱声，都抱以热情赞许的目光，喜盼自己的剧社早日演出抗战新戏。

经过一段排演实践，同志们都很用功，排练严肃认真，特别是演员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充满着爱憎分明的感情，所以进步很快，尤其是齐祖耀同志扮演的老头，张震同志扮演的日本鬼子，郭克同志扮演的老婆，王偌同志扮演的青年，李彩云同志扮演的小孩，都各有特色。女同志刚来剧社，过去没有登过舞台，总是有点抹不开面子，愿意扮演姑娘、学生，不愿扮演媳妇。所以只好由沈雁同志男扮女装演少妇。这样，沈雁同志就成了剧社挂头牌的“大青衣”了。

正当我们日以继夜突击排演当中，在前方的八路军英勇将士流血奋战，赤臂杀敌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缴获日军的枪枝、战刀、钢盔、皮鞋、黄呢大衣等等战利品，送给我们做演出的用品。

这对我们排演工作又是一个战鼓催征、快马加鞭的极大动力，激励着我们快排、快演、快上前线慰问前方将士。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我们排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自取》、《小英雄》、《王百计》、《察东之夜》、《胜利归来》、《拒毒》、《母老虎》、《新花子拾金》、《游击队》等十多个剧目。

节目排出来了，准备先在县里举行首场演出，请群众鉴定，“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然而它又象一个刚刚满月的幼儿，就要出来见世面了，我们的心情既高兴又紧张。

### （三）

我们带着喜悦心情，积极准备首次演出工作，全体动员起来，挨家挨户借服装，借道具，借汽灯，还把演员自己的床单、毯子，凡是演出需要的东西都收集出来，我们没有多少资金，不敢花钱，一切自力更生，化妆用品小县城买不到也借不到。只好找代用品了。没有油彩就用墨，用锅糜子灰；没有胭脂、口红，就用农村过年贴对联用的梅红纸沾上吐液往脸上擦，经过试验，效果满好，克服了种种困难，一切就绪，只待演出了。

新世纪剧社要演出抗战戏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人奔走相告，都像盼过年、过节日一样盼着演出日期。演出的场地在蠡县城内城隍庙对面的大戏楼上。“七·七”事变前，这里逢年过节经常演出大戏，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丝弦、昆曲、老调、拉拉调。演话剧还是开天劈地第一回。因此人们都有好奇心理。抗战新戏怎么演、怎么唱，只听说过，没有见过，都想看个稀罕，开开眼界。演出的那天傍晚，天刚擦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奔向了大戏楼。戏楼前熙熙攘攘挤满了热情的观众，围着戏楼摆着一

圈小商小贩，和往常唱大戏一样的热闹，一样的气派。

古老的大戏楼装饰一新。前脸挂着一块紫红色新大幕，上边写着“蠡县新世纪剧社”几个白色大字，这块大幕是剧社唯一的最贵重的家产了。戏楼周围贴满了抗战标语，画着很多抗战漫画，醒目耀眼，招引着一群一群的人围观、议论。都说这和唱大戏派头就是不一样。

天渐渐的黑下来，演出就要开始了。报幕员梁文周同志（他是个大学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台前向观众行礼、报告节目。首场演出的节目，我们选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自取》、《胜利归来》。

首场演出收到了异乎寻常的效果，震动了全城。有的说比大戏好，看得清、听得懂，和真事一样，有的说看了戏大快人心，热血沸腾。第二天清早，我们的“后台老板”刘通庸同志就跑到剧社驻地向我们祝贺，他高兴得闭不拢嘴，乐得两只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线，连走路也像喝醉了酒，轻飘起来了，进门就赞不绝口地说：演得好，第一炮打响了，全城开花，童叟称赞。

首场演出收到如此好的效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的剧目并不都是名著佳作，我们的演员是刚出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没有高超的表演艺术，我们的灯光、布景非常简陋，更不会引人入胜。那末是什么使观众如此热血沸腾呢？事实使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倾诉了群众苦难，揭露了日寇罪行，回答了人民要求，代表了人民愿望，指出了奋斗目标，人民从戏中看到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兽行，恨上心头，血涌心头，火烧心头，大大激发了抗日热情，明白了抗战是生路，妥协是死路。我们演出鼓舞了人民，振奋了人民，同时教育

了我们，提高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了舞台是战场，懂得文艺的战斗作用，由此更加热爱我们的工作，更加热爱我们的事业。

首场演出的反映，像雷鸣闪电一样，从城里传到了乡村，传到了部队，我们顺应广大群众的要求，立即着手准备深入农村、深入部队，送戏上门，巡回演出的工作。

#### (四)

正当风和日暖、百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像战士开赴前线一样，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以激动的心情，战斗的姿态，昂扬的步伐整装出发了。我们没有什么笨重的演出器材，行动方便，自己携带着必要的服装、道具、乐器，以及书写标语的颜料筒子，二十个人，一队文艺轻骑兵，转战在蠡县各个区、镇及大的村庄。各个村镇，听说新世纪剧社要去演出的消息之后，搭戏台、接亲戚、碾米磨面筹办吃的，一片节日气氛。每去一地，我们还没有走近村庄，远远的村头上一群群、一队队男女群众自动的站在高坡、路边上，以兴奋热情的神色在翘首待望，欢迎我们。我们每到一村，在村头把队整好，领队的吹着哨子，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高唱着抗日歌曲前进。听：“我有敌人凶似狼，强占我地方，抢掠屠杀后，又烧毁我村庄……”，“起来吧同胞们！起来和日本鬼子拚，他杀死我们的父母，他强占我们的土地，只有战，只有拚才能死里逃生……”，“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别看我们人数不多，但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唱起歌来威武雄壮。抗日歌声村街荡漾，抗日怒火烧满胸膛。抗日人民磨

拳擦掌，抗日气焰高达万丈。

当时，冀中内地的县城，尚未失守。冀中人民没有遭到日寇的洗劫。冀中大平原物产丰富，正处在“黄金时代”，号称八路军的“衣粮库”，中国的“乌克兰”。我们所到之地，都受到村民的热情接待。农村比城市看戏的机会更少，所以我们每场演出更加受到村民的欢迎。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时候，当戏中卖艺的小姑娘唱完《在松花江上》歌子之后，老艺人向观众要钱。这本来是戏中戏的情节，可台下观众信以为真，纷纷往台上扔钱。有一次一个东北人竟向台上扔了一个银元。多时每场扔上铜板达九百多枚，这些钱是无法退回观众了，就补充了我们的演出开支。在演出话剧《活路》时，当剧情发展到日本鬼子骑在剧中主人公老头身上，寻欢做乐当做牛马污辱开心，老头的儿子、女儿奋起反击，痛打鬼子时，台下观众群情激奋，拣起砖头、瓦块投向鬼子，造成了台上台下一齐痛打的场面。一次闭幕之后，扮演日本鬼子的张震同志抱着脑袋跑回后台，喊着：“哎哟！把脑袋打了一个包。”别看打了一个包，他非常得意高兴，证明他演得成功，在演出话剧《张家店》时，剧情发展到日本鬼子兽情大发，要奸污一个少妇，扮演少妇的演员沈雁同志拿起菜刀要砍鬼子，菜刀刚刚举起，观众在台下齐声呐喊助威：“杀！杀！”当菜刀放在鬼子的脖颈上，下边观众又是一阵喊叫：“使劲！使劲！”接是着一片掌声，一阵喊叫，沈雁同志一看效果如此强烈。本来排演时就是砍一刀，可是现在台下观众鼓掌称快，为什么不顺从民意，来个大快人心呢！于是沈雁同志就当场加戏了，砍了一刀又一刀，砍了又锯，锯了又砍，台下的掌声不断，连声喝彩，台上台下浑然一体，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鬼子的威风。

每个戏的演出，都在不同的角度上使观众受到了不同的教育。《活路》和《自取》的演出，批判了当时在一部分人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的念头。如《活路》剧本中写了一个老头，他的论调是：“六十年一个花甲，在劫的难逃，谁来了给谁纳粮。谁得了天下，谁布告安民，谁也不能不要老百姓。”这种甘当顺民的思想，当时在一部分老年人身上有代表性。结果日本鬼子打来了。面对现实，打消了他的幻想，他才恍然大悟，懂得了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只有抗日才是活路。《活路》教育了剧中人，加深了演员的民族感情，也教育了观众。另外在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为了掩盖他们那种恐日病的实质，在群众中散布了许多亡国论调，为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做了义务宣传。说什么：“日本人的武器好比长梭标，中国人的武器好比剃头刀”，现在连英、美都不敢和日本交战，我们是小菜一碟。”这也在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悲观失望情绪。结果《游击队》、《胜利归来》两个戏的演出，批驳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不少群众看完戏之后，找我们谈心，倾吐肺腑之言。他们说：去年“七·七”事变，国民党夹着尾巴跑了，县长带着太太，脚板上抹油溜了。剩下老百姓手无寸铁，甘等着伸长脖子挨杀了，谁还想到能有今天，你们演的戏，给咱老百姓擦亮了眼睛，长了志气，明白了道理。咱们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联合起来还打不败一个小小的日本……。有的村里为了表彰我们的演出，给我们赠了“唤醒民众”、“抗日先锋”的锦旗，夸耀我们都是“有志之士”。一位过去教过书的穷秀才，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这些人，将来可以上‘纲鉴’，成为历史人物”。群众的表扬，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群众越欢迎，我们就越愿演出，经常是戏演完了，群众围着舞台不走，

不散，要求加演节目。特别是在我的本村里演出时，所有的戏都演完了，所有的歌子都唱完了，还没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亲们在台下呼唤着我的名字，叫嚷不休，“再演一个吧，翻翻箱底吧，倒糞也可以（倒糞是指“反场”的意思）。”群众要求文艺生活，但更主要的是戏中反映的内容为群众伸张了正气，他们一扫往日郁闷心情，换来了喜悦的笑颜。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已到盛夏季节，我们的巡回演出一直在紧张进行着，足迹不仅遍及了全蠡县，而且接受了各地邀请，跨越了县境，到安国县、望都县、博野县为改编河北民军做过慰问演出。到高阳县为部队祝捷做过劳军演出。到清苑县清凉城一带为收编“联庄会”（地主武装）进行过宣传演出。在不断的演出中，加强了舞台艺术实践，锻炼了演员，提高了演出质量。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感到需要增加新的剧目。六月下旬，我们第一次巡回演出暂告一段落，返回县城休整，排演新剧目，迎接新的演出任务。

## （五）

我们这些从城关和四乡集拢来的同志，时间一久，作风上、团结上慢慢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六月底，梁斌同志从外地回来，县委派他到新世纪剧社担任社长，原来的社长张春霖同志调抗战学院学习，梁斌同志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又是戏剧专科学校毕业，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到剧社之后，抓了思想工作建设，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了作风。在艺术工作方面，上表演课、化妆课、“戏剧概论”课，还写了《爸爸做错了》、《血洒芦沟桥》两个剧本，并亲自导演。在“七·七”抗战一周年全县纪念



大会上演出了。这两个戏的演出，不论在表演上、化妆上、舞台美术上都有新的跃进，对剧社每个同志都有新的收益。排演时，不论是对“台词”、走“地位”都更加紧密的为剧本的主题思想服务，演出时也去掉了不必要的“噱头”，新世纪剧社的同志们在业务水平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八月份，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为加强群众文艺活动，决定成立剧社。有人极力推荐把蠡县新世纪剧社调归冀中抗联会领导，并派冀中抗战学社社长路一同志来蠡县商谈。蠡县县委从抗战全局出发，慷慨支援。于是这个蠡县人民养育起来的、在蠡县土生土长的新世纪剧社，于一九三八年深秋告别了蠡县的乡亲父老，奉调冀中，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十多年过去了，蠡县人民，凡是经历过那个不寻常的年代，看过新世纪剧社演出的，至今仍留下亲切的记忆。因为新世纪剧社的活动和蠡县人民有着患难与共、血乳交融的关系。实践证明，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创作的题材可以多种多样，艺术质量可能有高有低，但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发挥社会教育作用这个光荣传统，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和发扬光大的。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北京

# 湘西岁月

何 宣 太

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在贵州与四川边界的一个小山庄——南腰界，中国工农红军六军团与二军团召开了一个庆祝胜利会师大会。

贺龙同志向我们二、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我们欢迎六军团同志，你们辛苦的到家了，按理你们应该好好的休息，可是我们的根据地还在脚板上，每天脚后跟还要抹油，在这里与敌人是你追我赶。你们来了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我们要打出去，打到大地去，我们不能让敌人困死在这穷山恶水的山区。敌人要来我们就要狠狠的揍他，我们共产党、我们工农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我们打到那里就会得到那里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有信心打出去！同志们！你们说有没有决心呀！大家立刻响亮的回答说：“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那时我在红六军团保卫局当政治侦察员。

没有休息几天，我们即在贺老总指挥下打秀山、占酉阳，前锋北指。当时敌人惊恐万状，以为我们要北过长江，到川北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即迅速调兵北去，设防线堵长江。但我军在酉阳集结两天后，贺老总看清了敌人的去向，立即挥戈东进，翻过

几座大山，进入湘西，打开了永顺县城。

二、六军团会合后，我们保卫局是二、六军团保卫工作的总机关。我们政治侦察员常常是随前卫部队、侦察部队进到城镇，占领县衙门、保安机关，搜集敌人材料，逮捕恶霸，处理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这次我随前卫部队，进占永顺县城后，在县衙门搜到一份敌人的：《匪情通报》，通报上说，赤匪北上企图偷过长江窜川北与另一股匪军会合，应力求于长江南岸“围剿”歼灭。敌情和贺老总分析得一点不差。我把材料交给局长吴德峰同志。他看后笑着说，敌人总是受我们的指挥呵！

### 首战打击陈渠珍

湘西的土军阀陈渠珍、朱疤子、罗校芝，杂七杂八约有十余团兵力，霸占着花垣、保靖、源陵、永顺、大庸、龙山和桑植等七、八个县。我军一进永顺城，这些军阀即联合向我扑来，敌人虽是乌合之众，但有亡命徒的流氓特性。打还是不打？部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考虑部队的困难：指战员长期转战的疲劳，病伤腿痛的多，几乎是弹尽粮缺的物质条件，担心顶不住来势汹汹的敌人；另一种想法是：如果避敌奔走，部队会越拖越垮，不能让乌合之众的土匪军阀来追垮我们，相信红军是英雄好汉，相信有人民群众拥护，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的。二、六军团军事委员会最后决定要狠狠地打。战术是：撤出永顺城、诱敌尾追、待到有利的地势，伏击敌人，六军团打正面，二军团打迂迴，有机则乘胜追击。明确战术之后，我们二、六军团即主动撤出永顺县城城区。敌人果然听从我们的安排，随即就来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进入永顺城，误认我军是畏惧逃窜。我军一直撤到龙家寨。这是一

个小而平坦的坝子，狭长而不宽，两旁起伏的山林，便于我军隐蔽，我军即利用这个地势，张开口袋。不学无术的陈渠珍令他的部队大摇大摆地追来，第三天下午快天黑时，敌人进到我伏击线内，我们正面的红六军团几个师一齐开火。经过一小时左右的对抗激战，红二军团左侧一出击，敌人即溃退南逃，我追击部队立即轻装迂迴跟踪追击。经一天一夜，一直追打王村河边，敌人在沿途被我打死、打伤、俘虏和跑散的不计其数。从此这个老奸巨滑的陈渠珍，就龟缩在他的老巢——沅陵、花垣、保靖等地。我军战后在王村稍停两天，即回师收复永顺，进大庸。贺总指挥洞察湘西地区敌人空虚，果断地派部分兵力，去占领桑植、龙山以及来凤等大片地区。他亲自率师于大庸川东的溪口东渡，打开慈利、桃源等县，把企图阻我于常德—桃源之间的李觉、王东源、彭位仁等敌部队，一一击溃。从俘虏的口供得知：这些老交手的湖南军阀部队，一听说我们是红六军团十七师等部队，就吓得胆战心惊，相继溃退。我军一直追打到常德城边。从此我军在永顺、大庸、慈利、桃源、龙山、桑植等县的大块地区，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湘西地区，北连湖北，西靠四川、贵州，实是湘鄂川黔四省边界之地。这里的地势，大多数是崇山峻岭，聚居着汉、苗等多种民族，没有象样的工业生产，民用一切日用品的制作，或食用糖油等物，全是靠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交通运输没有公路，没有机动车辆；虽有些河流，也没有广泛的疏通利用，一些小船运，亦是多为地、富、强豪、官吏、私商谋取暴利服务。劳动人民的耕作，全靠肩挑手提，个别地方还处于人拉犁、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加上惯匪四起，社会经济真是民穷枯竭，民不聊

生。当奴隶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对地、富、强豪真是恨之入骨，他们看到红军打败了陈渠珍匪帮，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分物给他们，非常高兴，不少人自动帮红军带路、抬担架、挑文件箱子，还有的站在红军经过的路旁，给红军战士送饭送水，许多人要求当红军。我们二、六军团的部队，由于有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在数量上很快恢复了原来编制的状况，在群众积极踊跃参军的情况下，人员和装备都增强了。

人民要革命的强烈愿望，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广大人民自发自愿要求的形势下，各级苏维埃政府于当年十一月先后成立，湘鄂川黔边区宣告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和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我们保卫局亦就成了省肃反委员会），设在永顺县属塔卧镇。并从部队中抽调很多干部、战士，到各县镇、各农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当前革命政策，宣布土豪劣绅的罪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发地主恶霸的房屋、衣物、粮食、浮财。贫苦人民得到了利益，不但从心眼里认识了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求解放的，而且在行动上更加亲近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因此我们在短期内就把这块地区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 **保卫政权平匪惠**

革命斗争运动是逐渐向前发展的，运动深入一步，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就进一步的尖锐化。广大的人民要打倒土豪劣绅，要分田分地分地主恶霸的房屋财粮，一切反革命就更要千方百计地拼死抵抗。湘西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象全国其它地方的反革命一样，无一不盼望蒋介石回来所谓“国军回防”，他们有的伪装革命，和我们搞合法斗争；有的利用装神弄鬼、喝鸡血吹牛角

的封建反动组织——红枪会搞破坏；有的联络惯匪、拉武装、进岩洞、立寨子，同人民坚决对抗。当时陈渠珍也派来奸细收买被我们击溃的散兵游勇，由个别捣乱发展到小股的反革命活动。

这几部分反革命势力，在蒋介石部署重兵向我苏区进攻的前夕，互相串通，互相勾结，由分散到集股，盘踞在苏区内地的山林岩洞，以洋枪、鸟铳、土炮、刀棍为武器，昼伏夜出，捕捉和杀害我地方干部，威吓群众，以致不少贫下中农害怕变天，使一些边界的苏维埃政府流于形式，有些地方的土改是明分暗不分。这帮匪徒为配合蒋介石重兵进攻，还在根据地内搞武装暴乱。我有一次率部分留守人员由大庸出发，沿澧水北进，归回主力建制，在路上就遭到过一次袭击，当时山坡上，又是洋枪响，又是土炮声，还有牛角呜呜叫，夹杂着大声疾呼的“杀呀”！“活捉呀”！的恐吓声，要是没有见过场面的，真会吓得不知所措，幸而我身边有保卫队两个班，战士中老的多，有胆量，我就凭借这两个班的战斗力，与敌人边打边退，终于安全回到主力的住地。

针对苏区内地主恶霸的反抗活动，方面军、贺总指挥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的办法，把“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用在保卫湘西地区苏维埃根据地上来，乘蒋介石重兵进攻尚未到来之前，分兵肃清根据地的散匪。当时把二、六军团的主要兵力，集结整训备战，同时又分出几个团的兵力，化整为零，散布于大庸、永顺县镇以及匪患活动猖狂地区，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县成立红色独立团，区成立红色游击队，乡成立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还有一些市镇，组建红色基干武装自卫小队……等。军民配合清剿匪患，收缴散匪的枪枝武器。红军下去以后，首先是开展宣传教育，争取受欺骗、受蒙蔽的人参加革命，

这工作收效很大，大量瓦解了地富强豪的武装，孤立了极反动的少数，接着对坚决反抗的恶霸、固守山岩石洞的匪部，则以我军部队为主，地方县、区属武装部队配合，同心协力给以打击。我们六军团派出的部队，是四十九团和五十三团，四十九团在永顺县属的洗车河，五十三团在大庸县以东的山区，都是枪对枪，炮对炮地打山岩、破石洞。

湘西地区的山岩石洞是地质变化自然形成的，有的是多口洞，有的是深达几十米的单口洞，有的洞底还有流动的地下水。历年来地主恶霸利用这些山洞，储备粮食、肉类、干菜，我们打开一个洞、往往是几百成千挑地往外挑运。由于多口洞，敌人多是把好打的洞口堵塞伪装起来，而在上不着山顶，下不着地沟的悬岩洞口筑工事，所以这些洞也很不好打。要从地沟去进攻，它居高临下，火力压着你抬不起头；要从山顶往下放吊索，又不容易接近它的洞口，加上这些敌人，多半是一些十恶不赦的恶霸和杀人不眨眼的惯匪，十分顽固，因此打这种洞非常费时费力。当时我在五十三团地区，亲自看到打岩洞的实战。为坚决清除内患，五十三团的同志，采用了多种攻击手段，对多口岩洞，他们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挖掘不设防的伪装口，从洞后打进去。对单口深达几十米的岩洞，一般的是在甲山腹用火力对乙山腹洞口进行封锁，掩护我攻击部队架云梯爬进洞口，摧毁它的防守战壕。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强政治攻势，招安散居洞外与洞内有亲属关系的匪徒，进行政治谈判，迫使洞内敌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

经过军民共同作战，不久，永顺、大庸地区的散匪岩洞，绝大部分都打下来了。少数岩洞，虽没有直接打下，但敌人也不敢

继续坚持于洞内，钻空子偷偷摸摸地溜跑了。红二军团分管的平匪任务，也是战果赫赫，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实现了贺老总关于先安内，保护人民把身翻，分兵肃清散匪患的战略决策。

### 伏击战斗击毙谢彬

正当我们肃清匪患告一段落，乘胜进行深入土改运动时，由于江西的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蒋介石惟恐我军在南方立脚，便很快调集他的嫡系，并湘、鄂、川三省军阀部队十余个师，从东、北、西分三路向我进攻，东路是湘军的王东原、彭位仁、李觉、陶广等师，北路是鄂军张振汉部等师，西路是川军谢彬等师，夹带蒋的嫡系薛岳、李抱冰等师，集结于我边区周围。我根据地南面的陈渠珍匪徒也乘机秘密派遣内奸混入我区内地进行破坏活动。为对付即将到来的蒋军进攻，我前方部队和后方机关都迅速的作了准备，除留下少数部队，警卫省级机关，保卫地方干部作发动群众工作外，二、六军团全部开始奔驰于湘鄂川黔根据地广大地区，对付进攻的敌人。贺老总及军委会领导同志运筹帷幄，决心置东、北两路敌人于不顾，单打西路谢彬这个师（下属三个旅）。

一九三五年二、三月份，我们二、六军团，在查明西路敌人向我前进的方向之后，即出兵迎敌。走到板栗园地方时，正遇上这股敌人——谢彬部队。说也碰巧，敌人向我前进走的是山下的大道，我们向敌人前进的路线，走的是山上的小道，我前卫团发现敌人，而敌人没有发现我军。当时我前卫四十九团采取了居高临下，中间突破的战术，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正打中敌人的师部及其直属部队，一下子切断了敌人前后联络，使敌人失去指挥，走在前面的敌人跑不出去，走在后面的敌人，丢盔弃甲，遗尸遍



野。这一仗从上午八点多打到下午三点。实际上后两小时，完全是用于搜寻零散躲藏之敌。我们保卫局参加了打扫战场，我率保卫队随侦察科同志一起，到处搜索残敌，只见三个、五个敌人脑袋钻到树底下或草堆里，而身子脚腿却露在外面，一声喊，他们就乖乖地举手交枪，有的跪下磕头求饶，真是好笑呢。

这一仗将敌师歼灭过半，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无线电通讯工具，并将师长谢彬击毙于战场。战斗结束后，对于敌下层军官给予教育后，都发放了路费，进行了遣送处理。战斗的胜利，不但鼓舞了我军指战员打败敌人进攻的勇气，而且使东、北两路向我进攻的湘军和鄂军，不敢冒然蠢动，稳定了我根据地的形势。

### **我军围龙山 湘军进攻招头寨**

龙山位于我湘鄂川黔边区的西北边缘，是通往鄂西南的交通要道，做好这个地区的工作，不但在经济上对我有利，而且对湖北省的来凤、咸丰、宣恩等几个县的工作开展也有重要影响。我军军委会特意选择这里作为一个工作重点，当然敌人也深知龙山是必争的军事重地。

一九三五年的四、五月间，我军从大庸、永顺之间，向龙山地区开进。这时正值日长夜短、天气炎热的初夏，在南方来说，也是进入青黄不接、粮食困难之季，我军很不容易买到粮食。我们保卫局虽有三个管伙食的同志，然而在当时情况下，有多少人采购粮食，也常常劳尽心血。当时行军命令上，常常写着“明天吃一顿带两餐，队伍开龙山”这样的话。我们的李司务长和秦上士，一位是江西兴国县人，一位是江西莲花县人，他俩在这次北

进的路途上，为采购粮食、解决吃饭问题，真是费尽心机，磨得鞋穿脚破。他们走的路不是行军命令上指定的路线，而是沿着路线的两旁，爬山越岭。到了宿营地，他们不是象其他同志那样，弄水洗洗脚，而是去群众家做宣传说好话，为买粮食、蔬菜而奔波。行军命令上的那两句话，后来在部队中流传很久，每逢碰到粮食困难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明天吃一顿带两餐，队伍开龙山”，一直到长征结束才没有说这个话啦！

龙山处于海拔一、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没有大块水稻产粮的坝子，多是起伏不平种玉米的山岗，全军只好就地取粮，除了向劳动人民家购买未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子外，主要是向地、富、豪绅要粮。后来还从敌人飞机运送粮食、弹药给守敌的投掷点，取得了敌人送来的一些粮食。

我军围困龙山县，震动了湘鄂川，大长了我军的威风。敌人为了援救龙山，耍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把戏，在我边区南面，以湘军王东原、李觉、彭位仁等师向我招头寨地区发动进攻，我当地的人民武装一面设法迟缓敌人前进的速度，一面用鸡毛信火急转报我军。我们部队闻讯后，而由北向南，驰援招头寨。当时打先锋的是红六军团十七师，这个师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曾在湘赣边区九路冲歼灭敌人陈光中的战斗中，缴获了三节式水机关枪几十挺，因而师团单位都有装备七至九挺重机枪的连队，火力配备强，战斗作风好，师长吴正卿同志是一位屡建战功的优秀指挥员。在部队回招头寨的路上，全军不顾沿途少水缺粮、天气炎热和远道奔驰的疲劳，在相距招头寨三、四十里的路上，即由急走变小跑，由小跑变快跑，上下指挥员一律不骑马，同战士一样，一口气跑到招头寨。适时正好碰上敌人下山要进街的紧要时

刻，我四十九团前卫营一阵火力把敌人前锋打得龟缩于山顶不敢蠢动。不久我后续部队陆续赶到，发起反击，在几个制高点上，我军一个一个进行反复冲杀。在敌我争夺制高点时，我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同志身负枪伤。

王震政委出身于萍乡煤矿矿工，他到红六军团工作后，领导有方，作战指挥果断，人们常亲热地称呼他“王胡子”。他身负枪伤的消息传来，指战员似都感到难过，决心为他报仇。我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从湘鄂赣边区到湘赣边区时，每人身上都备有马刀一把，这时他们都抽刀上马准备上阵砍敌。在发起总攻击后，十七师、十八师两个兄弟部队，分别向敌人顽抗的制高点冲锋，把敌人打的遗尸遍地，我军随即乘胜追击，一直把敌人赶出苏区边缘。

战后，我军撤离招头寨，贺老总说：让敌人在边界的高山上，对着我红区望洋兴叹吧！可笑的何键搞这个把戏（指“围魏救赵”），你等着瞧，看我给你来一个“围城打援”的好戏吧！

### **围城打援**

#### **忠堡生擒张振汉**

由于我们在龙山地区工作的开辟，敌人占据的龙山城实际成了一个孤立之岛，外面援军进不来，城内敌人想要外逃不出去。我军也只是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对之打打停停。我军回师招头寨战斗后，便统由贺总指挥率领北开，远出湖北的咸丰、宣恩地区。

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湖北军阀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仗着他率领的部队都配有自动火器，师部的特务卫队还配有花

机关枪、二十响的快慢机和大炮等武器的优势，大摇大摆的由恩施、宣恩地区向我开来。

敌我两军在咸丰、宣恩之间的忠堡相遇。这里是一个峡长的小坝子，南边地势高，北边地势低，我军从南往北看，一目了然。我军总指挥部、贺老总他们就在这个高地的松树林里指挥。

我军的部署是：二军团打正面，六军团打迂迴。贺老总掌握以多胜少的用兵原则，命令投入战斗的兵力，是四师、六师、十六师、十七师。这场战斗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意外的遭遇；在我军来说，是经过侦察获得可靠情报后有准备的进攻。战斗当天上午八点多钟打响，敌人炮兵便盲目向我发射，不久我迂迴部队从侧翼直插敌人纵深。经过一阵激战，敌人的炮兵跑了，一部分后卫的敌军也跑了。十二点多钟，我投入战斗的四个师，完全转入分割包围之敌。打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突然发现被包围的敌人中有一个卫士部队，经查明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在其中。贺总指挥听到这个情况报告后，立即在电话上指示“一定要把张振汉活捉下来”，同时考虑敌人会派部队远道快速增援，即命令我军总预备队一部分出动到宣恩公路，准备阻击。这时被围困死守的敌人，有些抵抗并不坚决，打一阵后退一阵，有些则借故不动，等着举手交枪，有些故意跑散，躲到我方的隐蔽地来。敌人援兵在快天黑的六、七点钟时，被我阻击部队红十八师反复击退。直到八、九点钟，我把张振汉生擒活捉，才结束了战斗。来援敌人害怕我军连续作战，即于当天晚上，沿公路北逃，龟缩于施南地区。敌人的飞机第二天也不来了。我军就在忠堡地区，清理俘虏，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资助遣送，第三天在祝捷大会上，摆出缴获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战利品一大片。我们保卫局的侦察员也

缴得了一支二十响的快慢机，当时是多么的振奋人心啊！

贺老总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战斗的伟大胜利，是大家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换来的，光荣归于大家，归于流血牺牲的同志，归于人民对我军的援助，我们不但歼灭了敌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还生擒活捉了敌人的头子。最后他用风趣的话说：蒋介石给我们送来一个活宝贝，蒋介石是个输送总队长，我们要准备下一次接受他输送更多的礼物！要抓紧准备打更大的仗啊！

### 三天三夜阻击战

忠堡战斗之后，蒋介石更把我们看成是它在南方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立即消灭我军。这不出贺老总晓谕全军要准备打大仗的预料。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敌人在大庸、慈利、桃源三角地区，云集蒋军嫡系和湘军几万兵力，向我推进。我军于忠堡回师整训尚未结束，即开赴迎敌，选择了不利于敌的地形——后坪为战场。

后坪在澧水之西，紧靠河边。澧水在这里虽是流速不急，但是河床深，河面宽。敌军迷信它武器精良，弹药供应充足，空中有飞机侦察、轰炸等等优于我军的条件，对背水之战毫无估计，他们急于找到我军决战，恨不得一口吃掉我军。

本来在头一天下午，敌我两军打响后，我军准备第二天凌晨三时占领澧水西面制高点，但是敌人于当晚运兵过河，第二天凌晨三时以前，先于我军占领了这一高地，致使我受领任务去占领这一高地的红十八师五十三团，被敌人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压

得抬不起头来。幸亏我红六师十六团赶到，侧击敌人，分散敌人火力，这个团才免遭重大损失，并转到有利地形，加入了整个攻防部署的行列。

敌我两军亮开阵地，打攻防冲杀的会战，在湘鄂川黔根据地上还是第一次。第二天整整一天，从凌晨打到黄昏，上午主要是敌攻我防，敌人仗着飞机轰炸扫射的威力，不断向我攻来，我则利用重叠山岭，采取“后退为了一跃”的战术，在有利地形上杀伤敌人，疲劳敌人，打击敌人的锐气。下午转为我攻敌防，在越打面积越宽的战场上，我军采用正面阻击、侧面迂回的战术，使敌顾前顾不了后，不得不陆续后退。打到黄昏，敌人退到凌晨占领的阵地，看来是固守待援，准备明日再战。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正面被我阻击两天的敌军，是蒋嫡系薛岳、李抱冰，湘军的李觉、彭位仁、陶广等部队，既有战斗力，又有多次与我军交战的经验。西南面，地头蛇陈渠珍部亦在蠢动，特别是北面鄂军，进我桑植县，直线南下，有增援后坪战场侧击我军之势。而我根据地的版图，这时候只是由后坪到塔卧（我湘鄂川黔边区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龙家寨，桑植县境等几十公里的乡村。考虑我军两天阻击、战斗减员的局面，军委会和贺老总决定，仗不能在后坪战场上继续打下去。

第三天，战场上，敌我双方时打时停，到天黑时，我军撤出战斗，有目的地向桑植地区转移，准备以运动战手段，打击北面进来的鄂军，争取转变恶劣的军事局面。

当夜，我军在能见度四、五米的夜光下，照指定的路线转移，当部队到龙家寨地区时，天空已近黎明，稍作休息后，乘敌机尚未发现我军行进目标的机会，兼程急进，到达桑植县附近，查明

敌情后，即准备打敌军五十八师。

五十八师从湖北方向而来，下属三个旅，配有大炮，进占我桑植县城后，急于赶赴后坪侧击我军，参加会战。他们在南进的路上，分驻于陈家坨（敌人一个旅）、桃子溪（敌人的师部等）两地。陈家坨、桃子溪两地约有步行一天的路程。我军在到达桑植附近的第二天，乘敌无备，突然攻击位于陈家坨的那个旅，从上午七点多钟打响，到下午三点来钟就结束了战斗，干脆利落的打了一个漂亮仗。此役俘获人枪很多，并将其旅长击毙于战地。我们查明在桃子溪还有敌师师部等部队，就又发扬了连续作战的精神，迅速开进，不到黄昏，到达目的地，立即发起攻击。本来我们还不知敌人有大炮，可敌人的大炮自动“报名”，盲目向我方发射炮弹。贺老总指挥听到炮声响，即传令说：张振汉的大炮没有送到我们手上，这次一定要把大炮缴下来。并且又风趣的说：还要把敌人的炮手顺便请来呀！这时候天空漆黑，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主攻部队的突击队和迂迴部队，不顾困难，并利用有利于我隐蔽接敌的条件，把敌人打死的打死，活捉的活捉，两门山炮缴下来了。这个五十八师，除逃跑走散外，全部被我吃掉了。

贺老总在祝捷大会上说：后坪的几万敌人，还在继续打算把我们撵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哩！我们是不能答应的。不过现在暂时让给它，我们同它换一换防，让敌人去塔卧、龙家寨住几天吧！我们拉着它们送来的大炮到外面去见见世面，看看有电灯电话、高楼大厦、洋灰马路的大城市去，你们大家说好不好啊！话音刚落，全场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息。

## 再 东 进

陈家坨、桃子溪连战皆捷后，贺老总考虑到，如果继续在我根据地内与敌纠缠，会给苏区人民带来繁重的负担，使翻身的人们遭受战争的破坏。如果这个仗不在根据地内打；不怕敌人暂时占领我根据地的所有城镇，只要我军东进，纵横于洞庭湖西岸的几个大城市，可解决我军兵源、军用物资的需用；可达到解脱我苏区内地兵荒马乱的浩劫；可收复我苏区内失去的城镇。这个考虑，军事委员会讨论同意，于是果断地率师东进，一个夜晚全军进到江垭河边，涉水东渡，第二天即分兵横扫石门、新安、合口、皂市、大堰垱、王家厂等县镇大块地区的敌人，接着不费吹灰之力，进澧州。占津市，直捣敌人的后方。

津市、澧州位于洞庭之西，水陆交通四达，商业兴旺。这些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行各业的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等，在我军第一次东进常德时，亲眼看到过红军的行动，接受过我们的影响，他们对红军的进占，不但不害怕，反而挂红旗、放鞭炮，表示欢迎。一个晚上，各行各业的门市上，均飘扬着大小不一的红旗，街上人来人往，商会代表登门慰问。由于郊区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进城看热闹，市面比以前更加活跃繁荣。

为开辟工作，各机关分驻郊区一些村镇，我们六军团保卫局驻在大堰垱。这个镇子不小，商店、作坊、小摊、加工厂和早出晚归的肩挑贩，应有尽有。当地人民对红军非常亲热，见面说话带笑。我们打土豪的实际表现，更深得人民的信任，因而这个地区的扩大红军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单我们保卫局一个单位，就扩大了新战士一百多人。当时财务军需部门，在澧州、津市两市内，



采购了许多布匹及军用物资，集中了不少机器和工人赶制军衣和军用物品，这一切完全实现了贺老总把战争引到白区去，东进到洞庭湖边的大城市，可解决部队兵源、军用物资需用的预言。

红军这一手，搞得敌人手忙脚乱，蒋介石、何键在南京和长沙暴跳如雷又束手无策，而“进剿”部队内有家属住在津市、澧州的蒋军军官，他们更是六神无主，急盼退出苏区，回到洞庭湖边看看他们家属的安宁。由此，我们在前方，看到根据地的敌情快报说，今天××镇的敌人退到××县，明天××县的敌人已集中到什么地方。大家都在心眼里佩服贺老实用兵如神的好计策。

当敌人回到津市、澧州地区时，我军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扩大红军，筹款，购制部队装备等工作，都已基本就绪，不慌不忙的徐徐回撤。在沿途作宣传工作的同时，又积极做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保卫局回撤途中，住在官地坪半个月，我曾带着工作组三个同志，到距离官地坪十五里路的大沟村落，扩大了红军新战士三百多名。敌人眼看着我们一步一步的有秩序地撤走，只能慢慢腾腾地在后面尾随，形如礼貌式的“护送”。我军终于胜利回到苏区根据地——桑植县马河口地区。

# 马家坪歼敌记

马 兆 祥

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我西北苏区发动了疯狂的第二次“围剿”。我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立即发布了反“围剿”动员令。经过近四个月的奋战，陕北红军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于五月十二日在安定县马家坪村，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一个加强辐重营和一个运输队。这一胜利的取得，是我党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体现，它对于彻底粉碎敌人“围剿”，发展西北革命形势，扩大我陕北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严 阵 以 待

五月初夏，敌人发动的疯狂“围剿”攻势已成为强弩之末，我们反击的时刻到了。五月七日，我陕北红军主力，在秀延县（包括米脂、绥德、延川、清涧等县各一部）吴家寨子首战消灭了敌人一个营。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以来，我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当时，我是陕北苏区秀延县少共县委的负责人，正在九区（包括杨家园子、马家坪、折家坪等数十个村子）协助区委进行

护红、支前工作。正当群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儿童团、赤卫队的哨站送来这样一个消息：大约有一营敌人，一色七九快枪，还装备有几十挺轻、重机枪，押运了大批军用物资，由延安方向开来；进驻清涧后，准备向西驰援驻守瓦窑堡的敌高桂滋部李少棠团。

区委书记陈克功同志接到报告后，马上召集区长赵开有、游击九支队队长阎应娃、政委杨凤岐和我，共同研究对策。

从清涧县到瓦窑堡，是一条沿秀延河（即清涧河）九十华里长的东西向大川道，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横贯陕北的重要通道。当时，安定县大部已被我解放，唯安定城和瓦窑堡尚在敌人手中，这条路便是两处守敌从东面获得给养的唯一通道。然而，即使这样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小股敌人也不敢轻易使用；半年多来只有一次，敌一个旅仗着人多枪多匆匆走过一趟。

这次，敌人从东向西开去，必然要从这里通过。可我们的主力刚打了一场硬仗，亟待休整，一时难以迅速赶来阻击敌人。

九区的大部分村镇就在秀延河两岸，我们手里只有一支七、八十人、三十几条快枪的游击九支队！

怎样才能有效地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粉碎敌人驰援瓦窑堡守敌的计划呢？

我们详细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虽然装备精良，却有两个不利条件：一是不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地物，二是有较多的骡马辎重拖累；只要我全民动员，扬我之长，至少达到第一战斗意图是有把握的。经过研究，我们组织了临时指挥所：由九支队负责人阎应娃、杨凤岐负责游击队和赤卫队的联防，沿路猛烈袭扰敌人，相机截取敌运输队的骡驮；区长赵开有和我，分别负责贫农团、妇联

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挖沟断路，坚壁清野，布疑阵，助军威，一当战斗打响之后，还要做好支前工作；区委陈书记则负责掌握全局，协调各方面行动。

会上，陈书记最后加重语气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根据战斗进展情况随机应变：敌人若是边打边走，一路不停，我们就跟在它屁股后头打，尽快把它挤走，使九区少受损失，并争取搞一部分物资装备；敌人若张惶失措，止步不前，我们就力争困住它，等我主力部队来——”说到这里，他把握成拳头的右手猛然向下砸去！

会议刚一结束，我们立即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

临时指挥所的决定很快贯彻下去了。

“哼！敌人真敢从咱这圪塔走，咱就打它狗儿的！打！打！打！”整个九区的男女老幼很快都行动起来了：娃娃们机警地守卫着各个山岔口，婆姨们拆下红被面赶制红旗，贫农团挖沟断路，赤卫队磨刀霍霍。看到这一切，我止不住想：“多么了不起的人民力量啊。白匪军，你们来试试吧！”

### 狭路相逢

三天以后，即五月十日清晨六点，敌人出动了。

五百多敌兵，二百多骡马，扬起很高的尘土。当这条灰色的毒虫刚一钻出清涧县西城门，立刻就被我监视哨发现了！随即，沿途各哨站上的消息树倒了，红旗飘舞，钟声震荡，一场消灭白匪，保卫家乡的战斗开始了。

路，被挖断了；杀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土炮，一直打到敌人跟前；周围，却看不到一个人影。装备精良的敌人被这一场突袭

打得胆颤心惊。

敌人再往前走，只见山上出现了无数迎风招展的红旗和游击队、赤卫队员的身影。闪亮的梭标、大刀，射出凛凛的寒光。杀声，更急、更紧了，土炮的轰鸣声，更密、更近了。行进中的敌人犹如惊弓之鸟，顾不得脚下的乱石和横沟，互相碰撞、跌跤、漫骂，乱成了一锅粥。

初夏的太阳已经升到头顶，队形散乱的敌人已经走出四十多里。

“到时候了！”九支队长阎应娃狠狠地勾动了板机。

“砰！砰！砰！”九支队的三十几条快枪一齐发射，扯断了敌人早已绷得紧紧的神经。刹那间，大道两旁的山岭出现了无数手持梭标、大刀、土炮、棍棒甚至石块的群众，“杀呀！”“打呀！”

“别让一个敌人跑掉呀”的喊声如夏夜的沉雷，回响在秀延河的上空。

敌人顿时大乱。人，成了无头苍蝇；马，惊得四处乱窜，驮着轿窝子的高头大马陷在烂泥坑里拼命挣扎，把里面的一个官太太也甩了出来；只见她披头散发，滚了一身烂泥，爬起来啥也不顾地跟着白匪军跑进了后面的马家坪村。

马家坪是秀延河北岸一个有四十几户人家的村庄，它分别距瓦窑堡、清涧城四十里和五十里，是两处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

“好地方！老阎，快把你们的人统统调过来，就在这里包围敌人：注意，三面包围，网开一面。”陈书记指着大道上两骑向东疾驰的敌兵说。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与马家坪隔河相望的史家沟，严密观察敌人的动向。下午一时许，六名敌兵牵了两骡一马到河边饮水。九

支队阎应娃队长立即率队顺山沟迂迴到河边。这时，只见河对岸的敌人把缰绳接得长长的，让牲口到河边喝水，人却躲在山岩后面。“胆小鬼！”阎队长低低地骂了一句。“砰砰！”“轰轰！”快枪和土炮同时打响了。“别让敌人跑掉啊！”埋伏在庄稼地里的几百名赤卫队员同时呐喊起来。敌人象受惊的兔子一样逃回村里，河边浅滩上留下了几匹奄奄待毙的骡马。

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准备突围。他们刚把驮子抬上马背，还没来得及整队，就被冰雹般的土炮打了回去。

陈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马，敌人被我们吓破了胆，给咱一顿土炮打麻了脚爪，可又舍不得扔下辎重物资，这些要财不要命的家伙！”他指着正在马家坪里构筑工事的敌人说，“看样子，他们要固守待援。你现在立刻动身，去办两件事：第一，到附近村里动员婆姨们多造些土炸药，把咱们的土炮喂饱，顺便再弄点儿吃的；第二，到十区（在九区东边）再调些人，连夜赶到！”

我应声要走，刚一转身忽又想起一件事，忙转回来问：“老陈，给咱主力送信儿了没有？”陈书记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敌人刚进村就送去了。还插了鸡毛，一共——”他伸出三根指头。

### 万众一心

下午四点多钟，我来到距马家坪二里多路的湫峪沟。

湫峪沟的妇联主任赵大姐是个精干人儿。她领我走进一个院子，只见十来个老汉和婆姨正在赶制炸药。“凑成一担我们就送去一担，保准误不了事！”出村时，她对我这样说。

来到王家岸堤刚说明来意，贫农团长杨培雄的广播筒子就沿街响了起来：“各家注意啦！赶快攒粮食，明天早起送马家坪喽！”

张铁沟一位姓雷的老汉，一下子就扛来一口袋白面：“这是我给人家抹房，挖窑攒下的。给咱游击队吃吧！”

过了界石铺是东区的马家砭。一进村乡干部杨老三就迎上来大声说：

“小马，你怎么才来！晌午咱见骑马跑回去俩白匪兵，就知道敌人给咱围住了。这不，我们人都集合起来啦！”

“你们什么时候能走？天亮前可要赶到！”

“没问题。要不是想多带些干粮、炸药，咱们早就出发啦。”

“可要快。能不能围住敌人可看你们了！”

“嗨，咱算啥。”老杨眨巴着眼睛笑道，“已经给别的县送信去了。敌人呐，他逃不脱啦！”

## 天罗地网

五月十一日，东方刚一放亮，我就起身往马家坪赶。沿途只见村村寨寨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兴奋地打着招呼：“喂，二哥，马家坪去呀？”“你没见，我们一村儿都来啦！”“唉，你们一家怎么往回去？”“刚守了一黑夜，到后边歇去呀！”“这一黑夜狗儿的老实不？”“老实？！光知道糟害村里的婆姨、老汉！”“好狗儿的，等着瞧吧！”

回到史家沟，天光已经大亮。找到陈书记，我急忙把完成任务的情况汇报了一遍。“别说了，小马。你看，不光炸药、干粮都送到了，一夜光景，咱赤卫队、游击队就增加了一倍，现在

有六、七千人啦！”接着，陈书记简要的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昨天夜里，我们派乡干部、马家坪的马老三进村侦察，跟被敌人关押起来的群众取得了联系，掌握了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分布情况。外围，已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在马家坪村外，任务是袭扰敌人，闹得他们不得安宁；第二道在距此五里左右的阎家坪一线，这一线集中了大批青壮年，任务是防止敌人突围，并支援第一道防线；第三道防线的的作用，则只是负责前线弹药、粮食的供给，并在敌人突围时截获其溃散兵丁。在瓦窑堡和清涧城方面，虽各出动一营敌军，准备接应在马家坪被围之敌，但他们不摸底细，又遭到我各区游击支队和义勇军的阻击，更不敢冒进，此刻正处于犹疑观望之中。陈书记兴奋的说：“我已派人向刘总指挥（即刘志丹同志）报告了这些情况。只要主力部队一动手，我们就能吃掉这股敌人！”

困兽犹斗。马家坪的敌人不甘复灭的下场，于当天下午派重兵护送一个排，突破了我第一道防线。

“敌二十余人，两骑马突破了我第一道防线”的消息立即传开了，赤卫队长马老二果断地在第二道防线（阎家坪和丹头村之间）作好了歼敌准备。

下午二时许，敌人出现了。只见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急匆匆地迎面而来。

“冲呀！”马老二一声令下，数百名手持梭标、大刀赤卫队员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赤手空拳的群众也高举棍棒，抓起石块冲了过去！

早已吓破了胆的敌军顿时乱了阵角，有的就地卧倒，有的四散奔逃，还有的索性把枪一扔跪地求饶：“红军老爷饶命！”转眼



间，一个排的敌人全部瓦解。赤卫队员们捡起一杆杆锃亮瓦亮的七九快枪，兴奋地欢呼、跳跃起来。

这时，区委陈书记也赶到了，他立即命令带上几杆缴获的快枪，同马老二等人一齐跨上敌人的战马，寻找我红军主力去了。

### 瓮中之鳖

当晚，区委陈书记等人在魏家岔、路家寺一带找到了我红军主力。

陈书记兴奋地高喊：“刘总指挥，我给你送枪来了！”

“哦——敌人要跑么？”刘志丹同志紧接着问。

“他出来了一个排，被我们搞掉了，还得了二十几条好枪！”

“老陈，你们来的正好，”志丹同志说，“我和晋年（红一团长贺晋年）、岱峰（红三团长吴岱峰）正在研究你们马家坪的情况。你们快详细说说。”

听了陈书记和马老二的汇报，贺、吴两位团长高兴极了。

“敌人已经丧魂落魄。”贺、吴两人说：“咱俩是本地人，地形地物很熟，群众条件又好。怎么样？打吧！”

“部队怎么布署？”志丹同志问。

“吴家寨子由岱峰主攻。”贺团长提议，“这次请他们和二团打援，我们一团和义勇军消灭马家坪的敌人。”

刘志丹同志沉思片刻后，果断地说：“马上召开军事会议！”

军事会议从十二日拂晓一直开到上午十点。志丹同志随即命令部队造饭，饭后出发。

“饭就甭做了吧，老刘，”陈书记和几个县、区、乡的干部

一齐说，“沿途群众早就作好了饭等着咱队伍呐！”

“好，好！那就照你们说的办吧！”志丹同志握住大家的手，连声说道。

很快，部队分三路出发了：一路由吴岱峰率三团向东打援，一路由二团向西打援，刘志丹、贺晋年率一团和义勇军从北直扑马家坪。

从路家寺到马家坪，在沿途五十余里山路的两侧，我苏区群众箪食壶浆迎送红军，“消灭白匪！保卫家乡！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吃吧，孩子。吃饱了打白匪有劲！”老婆婆们端着一碗碗白面饺子送到战士面前。

“红军哥哥，带上，边走边吃，可别让敌人逃了呀！”半桩子娃娃把白面馍塞进战士手里。

大路边，群众唱起了陕北民歌：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

战士们激动地向乡亲们频频招手：

“放心吧，大娘！我们决不当孬种！”

“放心吧，小兄弟！我们保证不叫一个敌人逃掉！”

下午三时，各路部队都赶到指定位置。

此时，我各县游击队、赤卫队也奉命到达。马家坪周围已聚齐一万多军民群众。

刘志丹同志站在山顶，仔细观察村中的情况，问：“敌情有什么变化？”

“狗儿的现在连吃水都不敢到河边去抬了。”一名赤卫队员回答。

“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鹰家圪塔。”

“村前那块开阔地呢？”

“兔坪湾。”

“好——！”志丹同志斩钉截铁地说，“那咱就给他来个鹰抓兔子，彻底消灭敌人！”

枪声响了。

我英勇的红军和万多名赤卫队员、义勇军，象暴发的山洪，顺着山势奔腾而下。

被围困在马家坪村里的敌人，在这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面前，犹如瓮中之鳖。直到这时，他们才开始明白：无论多么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再也挽救不了他们彻底复灭的下场。

\* \* \*

人民战争，威力无穷。

马家坪一战，敌一个加强辎重营，除了被围当天有两个通讯兵骑马逃回清涧城外，营长佐向恒（高桂滋的大舅子）以下二十余人在战斗中因顽抗被我击毙，其余四百多人全部被我俘获；而我军仅牺牲一人，挂花三人。战斗结束后，我军缴获敌步枪四百多支，轻、重机枪二十余挺，以及二百多骡驮医药、子弹等物资。

经此一战，安定守敌因缺乏给养，以致不战自退。我军不仅得到进一步装备，而且士气更加高涨，随后在绥德张家圪塔又歼敌两连，并接连攻克了延长、靖边……。到七月为止，我相继攻

占和收复了延川、保安、安塞等六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从此，我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联成了一片，所辖地域扩展到北迄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人民游击战争发展到三十余县。

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与我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

（赵晓阳 整理）

# 陶铸同志率领我们抓匪首

朱林尧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广西小董、贵台、大寺、大塘一带执行剿匪任务。当时我任一三四师四〇一团政治委员。这年七月，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来到我们团指导工作。陶铸同志来到部队后，不但和我们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而且还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作战。

深秋，我们的指挥所设在大寺圩。一天下午三点多钟，陶铸同志正在和我们团的领导干部一起总结前段剿匪的经验教训。这时，驻地附近的一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土匪纵队司令黄理雄带着两个匪徒窜到大寺圩附近果稔村的一个姘头家里。

黄理雄是当地的土匪头子。他横行乡里，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既怕他，又恨他。骂他是白蚁钻心的料——坏透了。这个家伙很狡猾。他的队伍虽然被我们打散了，但他却在几次围剿中漏网了。大家听到这个家伙就在附近的消息，个个磨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把他抓来处决。陶铸同志的心情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他听到老乡的报告后，右手往大腿上一拍，霍地站起来，胸有成竹地说：“好啊，这家伙休想再溜了。”说完，他就领着大家研究捉拿黄理雄的行动方案。

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献计献策。心急的同志说：“赶十五不如赶初一，干脆马上行动，抓住黄理雄再吃晚饭。”陶铸同志摇摇头，说：“我们白天行动目标大，急不得，等天黑后再动手也不晚。”有的同志担心黄理雄不在这个村子里过夜，主张设法通过老乡在当地找个有钱的人去和黄理雄赌搏，以便拖住他。陶铸同志了解到这个有钱的人平时很少参加赌搏，认为这样做会打草惊蛇，引起黄理雄的怀疑。因此不同意这样做。黄理雄会不会在村子里过夜呢？对这个问题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关系到能否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关系到能否抓住黄理雄的关键一着。讨论到这里，大家都在深思，有的埋头抽烟，有的搔首抓腮……。

陶铸同志冷静、沉着。我坐在他的身旁，只见他边思索，边喃喃自语：“不会走的，不会走的。”接着，他就向大家说了自己的看法：黄理雄窜到他的姘头家里，无非是搞乌七八糟的事情。他进村的时间是下午，又带着两名匪徒，实际上这是为他作保镖的，看来是想混一夜再走。再说，黄理雄的家并不在这个村子里，这就有可能使他思想麻痹，认为我们不会发现他在这里。大家觉得这样分析合符情理，都用赞许的目光投向陶铸同志。陶铸同志看到大家同意他的看法，又询问了驻地与果稔村的距离，然后果断地说：“现在按兵不动，凌晨一时派一个加强排出发，四时左右赶到目的地形成包围圈，天亮时动手擒敌。这次是瓮中捉鳖，十拿九稳。”

“去一个加强排够不够？是不是派一个连去？”我怀着忧虑的心情向陶铸同志请示。

陶铸同志回答：“够了，人少了容易吃亏，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一个加强排正合适。”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二连一排。

晚饭后，我跟随陶铸同志来到了二连。他向执行任务的干部战士作了简短的动员，提出了要求。他说：“黄理雄这个土匪头子，罪恶多端，老百姓吃尽了他的苦头。我们抓住了这个家伙，就是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在夜间奔袭中，大家要遵守纪律，保持肃静，不带容易发出响声的东西，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要掉队……”最后，他带命令的口气说：“现在的任务是睡觉，不到时间不准起来，养精蓄锐嘛！”

陶铸同志从二连回到指挥所后，叫警卫员找一双草鞋给他，说是要跟着一排一起徒步行动。陶铸同志到我们团以后，已经参加过两次袭击土匪的夜间行动。警卫员把这件事告诉我以后，我急得不得了，心里想，这回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去了，便去劝阻说：“陶主任，夜间路不好走，头两次夜袭你都参加了，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警卫员也在一旁帮腔：“首长，你老是到第一线去，我的任务就难完成了。”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劝说，陶铸同志还是坚持要去。后来，我作了让步，打算为他准备一匹骡子。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三伏天穿皮袄，不是时候。”我无可奈何，只好叫警卫员从我的箱子里拿出一双备用的布草鞋。陶铸同志接过草鞋一看是新的，眉头一皱，说：“新草鞋会打脚，使不得，找一双旧草鞋就行了。”为了让首长早一点休息。我脱下自己的草鞋给陶铸同志。可是，陶铸同志的脚比我的脚小，试穿时那双草鞋显然大了些。我说：“另找一双合适的来。”他摆了摆手，笑嘻嘻地说：“不必了，事在人为，把草鞋带绑紧些不就小了么。”陶铸同志看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让我 and 警卫员去休息。

我们休息了。陶铸同志并没有休息，在灯下看看写写。陶铸同志来到我们团以后，白天深入群众，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我

们看到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写字很吃力，就弄来一盏汽灯。陶铸同志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就用废纸把灯围起来，再在纸上凿一个不大的洞。他就靠洞口透出来的光亮进行工作。今晚，他和往常一样，又在灯下忙碌着，有时还走到床前看望我们。我和警卫员虽然躺在床上，其实谁也没睡着，眼睁睁地等待着出发时刻的到来。我们俩看到陶铸同志来了，不约而同地闭上眼睛，警卫员还假装地打起了呼噜。

凌晨一点钟，加强排起床集合了。陶铸同志在队列前再三勉励大家：“抓住匪首立大功！”他还挨个检查了同志们的行装，看到大家确实没有携带容易发出音响的东西，才放心地挥手让向导领着队伍出发。那几天一直下着毛毛雨，这天晚上雨比往日小了些，但还没有停。我们抬头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星星，眼前一片漆黑。陶铸同志身披雨衣，手拄木棍，和大家一起摸黑前进。我们走的是山路，曲折坎坷。大家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前进，不少同志还摔了跤。可是，陶铸同志步履稳健，没有摔过一跤，这是由于他久经锻炼的缘故吧。每逢过独木桥，他还站在桥头，把嘴巴凑到同志们的耳旁，小声地说：“前面危险，注意安全。”一直等队伍过完了，他才最后一个过桥。从驻地到目的地有二十来里路，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走完了这段路程，按时到达了这个村子的东南面。

向导是当地人。他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村子的情况。这个村子有二十来户人家，几十个单家独户的房子几乎连成一片，座落在村子东南面小山包的脚下。村子里一条通路从一排房子前面穿过，两头分别向村东北、西南以外延伸。村西北是一片开阔地。根据地形，我们决定：二班、机炮班隐蔽在东南的山坡上，负责控制



西南、东北一带，陶铸同志和我的指挥位置也定在这里；一班隐蔽在东北面，到拂晓时，除留几个人留在原处控制西翼外，其余的人员进村搜捕土匪；三班隐蔽在村子的西南角，配合二班、机炮班和一班封锁东南、西北角，防止敌人逃跑。

布置停当以后，各班便分头行动。这时大约四点半钟，天还不亮。我们静悄悄地蹲在山坡上，迎接即将来临的曙光。桂南的深秋夜晚，冷风阵阵，不时使人打颤。这时虽然离天亮只有个把钟头，可是我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慢。

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可是还不见一班有什么动静。陶铸同志心里很焦急，站起来拔腿就往一班方向奔去。我和警卫员同时上去把他拉回来。我说：“首长，如果你到前面去，我们也要跟着你一起去，那么，这里就……”。正当我要往下说“没有人指挥”这句话时，只见正前方一个房子里亮了灯，瞬时“砰！砰”两枪。从响声中可以听出，这是快慢机发出来的，不是一班同志打枪。我听到枪声，心里不禁一怔：“好险呀！”陶铸同志听到枪声，心里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急了。他说：“黄理雄果然还在村子里，命令各班机枪开火，虚张声势，封锁村口和开阔地。”我立即把陶铸同志的命令传下去。不一会，各班的机枪就“哒哒哒”地叫开了。

“报告！”一班的一个战士来到我们跟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刚才的情况。

原来，一班的几个同志按照向导的指点摸到黄理雄姘头的屋里，既不见土匪，也不见那个姘头，只有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刚把灯点亮，就从附近的一个简易炮楼里打来了两枪。

于是，我们立即命令三班派人包围、搜索那个炮楼。大约过

了十分钟，三班的同志说，炮楼里面也没有人。

一班、三班正在继续搜索。

天慢慢亮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土匪藏在哪里。这几个家伙到哪里去了呢？我心里很纳闷：莫非这回黄理雄又是荷叶包鳝鱼——溜了？陶铸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情，不慌不忙地对我说：

“别急，那些家伙肯定离开炮楼藏到别的地方去了。找群众问一问。”一班、三班的同志遵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炮楼附近找来了十多个老百姓一一询问：“你们看见土匪了吗？”由于他们害怕土匪报复，前面几个人显得十分恐惧，说声“没有看见”之后，就转回家去了。战士们没有灰心，一边宣传党的政策和不剿完土匪决不收兵的决心，一边继续询问。当询问到最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时，他的嗓门特别高，嘴里说“没有看见！”右手却指向旁边不远的一座破房子，接着他的食指又朝天上指了指。战士们会意了，马上冲到这座房子的门口。战士们正要喊话，土匪就用快慢枪、左轮朝门外射击。战士们用卡宾枪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只听楼上“喔”的一声惨叫，顷刻火力就比原来减弱了。屋里屋外对待了一阵之后，陶铸同志告诉大家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如果他们仍然负隅顽抗，就坚决消灭他们。

把守门口的战士们停止了射击，开始喊话：

“缴枪不杀！”

“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蒋介石逃到台湾去了，不要为他卖命了！”

“携枪投降，既往不咎，从宽处理！”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喊声不断，枪声不停。又过了一些时间，只听楼上一个人沮

丧地说：“糟糕，没有子弹了。”“他妈的！”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这人骂完后又打了两枪，再也听不到枪声了。战士们估计到土匪没有子弹了，几个人蜂涌般地冲上楼去，擒住了两个人。另一个人倒在血泊之中，已被击毙了。被活捉的两个人中，一个大高个，这就是土匪纵队司令黄理雄，被我们打伤了右手。他的一支快慢机、左轮都没有子弹了；另一名是中等个，但他还有子弹，只是不愿为他的主子卖命罢了。

天亮了，战斗也结束了。这次围剿，活擒土匪两名，击毙土匪一名，缴获快慢机一支，左轮三支，还有好几发左轮子弹，我无一伤亡。

战士们押着两名土匪兴高采烈地来到我们面前。陶铸同志向大家：“是谁抓到的？”一班、三班的同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二班、机炮班的同志们留在山头上没有出击，觉得受了委屈似的。陶铸同志看到他们的情绪，又补充说：“活捉土匪纵队司令，大家都出了力，回去给你们排记集体功！”这才使二班、机炮班的同志们露出了笑容。他还嘱咐连队干部回去后，让战士们好好休息，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抓住黄理雄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拍手叫好，纷纷出来围观。我们的队伍离开村子很远了，后面还尾随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说来也很奇怪，夜里还细雨绵绵，早上却雨停云散，从东方喷射出暖融融的阳光，好象老天爷也在为凯旋而归的战士们助兴。陶铸同志虽然一夜没有合眼，但毫无倦意，脚步轻盈，精神抖擞地领着我们沿晚上走过的小路班师回营。

（曹仁松 整理）

# 獄中生活

李沐英

(全国政协委员)

被 捕

一九三一年初春的一天上午。严冬还未过尽，天灰茫茫的，冷冽的寒风扑打着脸，透过薄薄的棉袍，浑身凉嗖嗖的。我不顾上海滩头的寒冷，匆匆向赤色总工会的交通机关奔去。

那是公共租界一条偏僻的道路一所普通民房的亭子间，我是第三次去了。当时，我在全国赤色总工会做保管兼统计工作，到那里去取党的刊物《红旗》报，从报上搜集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整理成资料，再送给工会领导同志。

按照前两次的经验，我走入机关的后门，抬头一望，窗户上一支鸡毛帚子静静地立着，这是平安的标记。我轻轻地将厨房的门一推，门是虚掩着的，与前两次不一样。“难道发生了意外？”我跨曙一下，探身进去，里面静悄悄的。我慑手慑脚地走上楼，亭子间的门开着一道缝，主人——钱仲康同志不见了，屋里有些凌乱。看来已经被人搜查过。我心头猛地一惊：“坏了！”几乎同时，楼下发出些微微的响动。我定定神，回身镇静地往前楼走去，一边盘算着：这里已经出了事，要从原路跑掉是不可能的了，装作找人或许能闯出这一关。我从口袋里掏出写着所要材料的纸条和我的房门钥匙，想趁机掩藏起来。可是，我感到好象有人在

监视，不敢冒险，只得捏在手里。

我大方地走进前楼，突然，两个人迎面挡住，一回头，后面也走出两个人来，我被包围了。四个便衣，一个个歪戴帽子，横眉怒眼。其中一个说：“哼？我知道你是来找谁的。”不由分说。就把我带回亭子间。“抄！”一声喊叫，两个便衣朝我身上抄起来。我想，他们知道我来干什么的，但不一定掌握我的情况，便装作若无其事，双手虚握，伸开两臂。他们摸摸我的衣服，掏掏我的口袋，没抄出什么，就审问我：

“你叫什么？”

“我叫吴如。”吴如是我曾经用过的化名，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知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来找个朋友。”

“从哪儿来的？”

“从湖南来的。”

“哪一天坐什么车到的？”

“昨天，坐……次车到的。”我随便说了个车次。

他发现车次根本不对，就骂我：“胡说！”动手打了我两记耳光。接着又问：

“昨天晚上住在哪里？”

“朋友家里。”

“在什么路？”

“胶洲路×××号。”

“走！”

又是一声喊叫。两个便衣把我押下楼，推出后门，朝他们

停车的地方走去。幸运的是，这些家伙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手。我趁走路的时候，把钥匙悄悄装进口袋，又假装抚摸被打的脸，顺手把小纸条塞进嘴里，嚼碎，就着唾沫咽下了肚，把这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毁掉了。顿时，我心情轻松了许多。他们把我拥上汽车，直向胶洲路驶去。

一九三〇年秋，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还不到半年，因为工作关系和组织纪律的约束，平时很少上街，对上海的马路并不熟悉。因为有个湖南同学叫李隐，住在胶洲路，我到她那里去过，对胶洲路有些印象，所以临时说了个“胶洲路×××号”。我故意把门牌号码说得大些，避免误入别的人家，连累了别人。我准备找机会和李隐通消息后，她肯承认我这个客人，再说出她的真实门牌号码。

汽车载着我左弯右拐，跑了好大一会，来到胶洲路。他们问：“你朋友家在哪里？”我信口回答：“在前面。”再走一段，我又说在前面。如此重复几次，车已开出胶洲路好远，到了郊区。两个家伙光火了，手一挥又打了我两记耳光。命令司机往回开。回头找了一遍，仍未找着，原来这条街上根本没有我说的那个门牌号码。这样一折腾，耗费了一两个小时。两个便衣气极了，又狠狠地打我，把我的脸打得火辣辣的，还恨恨地骂我是个“该杀的共产党”，斥骂之声不绝。一路上，我琢磨着机会逃跑，可是这两个家伙一左一右，盯得很紧，不容我脱身。下午，我被他们吆喝着送进了租界的巡捕房。

## 拘 留

进巡捕房，我被关进了一个铁笼子里。这个铁笼子有单人床

大小，可容五六个人，一人多高。笼子里有一个女的，身上发出熏人的臭气。她是一个拐带犯，审讯时口里被灌了大粪，所以发臭。当时，我顾不得这些，站在铁笼子里观察动静。

这是一间大房子，空荡荡的，铁笼子占据房间的一头。房中一个“U”形状的柜台，里边有一些人在办公，他们对我的进来仿佛并不在意，大概关进个把人，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不算一回事了。

一会儿，又送进来一个男的。他是陈为人同志，我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入党时认识的，这时在总工会工作。又见到了他，不好打招呼，我胆子却壮了许多。

没过多久，那些如狼似虎的巡捕，打开铁笼，把我们叫出来，押解到了提篮桥监牢。

这所监牢在英租界，有几层楼高。一个女看守把我带到西牢最底层的一间牢房。里面有两排炕，上面铺着破蓆子，翻开蓆子的一角，只见臭虫爬爬挤挤的，叫人浑身发麻。炕上躺着、坐着十几个女的，她们看见我这个年轻女学生打扮的人，都闪现出惊异的目光。有几个把我打量一番以后，关心地问我是干什么的，吃什么官司。我说：“冤枉啊！”她们知道叫“冤枉”的都是共产党、政治犯，便用同情、敬佩的口吻说着：“又是冤枉的。”她们有的和我说道道，有的自言自语，有的一声不响。从说话中了解到，她们是些盗窃犯和拐带犯。当晚，我茶饭不思，也无心闲聊，挤在她们中间，盖上棉袍，拳着腿，躺下了。

逮捕、坐牢、拷打、杀头，在我面对殷红的党旗，举起拳头，向党宣誓的时候，就作了思想准备。但是真正尝到监狱的滋味，这还是头一次。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心头无法平静，久

久不能入睡。一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回旋着：交通机关是怎样被敌人破坏的？钱仲康同志怎样了？我不回去，引起房东的怀疑，向敌特机关去报案，怎么办？怎样使党组织知道我被捕，及时将我保管的几个大箱子文件、材料取走？我左思右想，暗自盘算，想好了三条：

第一，想法与外面取得联系，把我的情况通知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或通过老同学李隐转告在中央机关保管文件的赵世兰大姐，同时把我的房门钥匙送出去；

第二，想法找人营救。我妹妹李静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介绍她入学的是我哥哥的同学，曾在日本留学，可通过李静找他帮忙；

第三，要外面的同志、亲友送点吃的和衣被来。

不知什么时候朦朦胧胧地睡了一会，就到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女犯一个个把盛尿的小铁罐送出去，一会儿，女看守又把这些小罐装着饭从铁门下推进来。这顿早饭是发了霉的米煮黄菜叶子，闻着那股气味就叫人恶心。女难友们都劝我吃一点，说：“阿姐呀，你要吃一点。你刚来，还要住下去，不吃一点是吃不消的。”没办法，我只得闭着眼睛勉强吃下一些。

上午传讯，看守把我带到大厅里，站在一个约两尺来高的木台子上，前面一排坐着三、四个人。我面对他们，昂首挺胸，等候审讯。坐在中间的那人发问：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我照编好的那一套回答。他们再问，我照这个口径又说了一遍。问了一会，就把我送回了牢房。同屋的人告诉我，这叫“过堂”，还不是正式的审讯。



## 审 讯

被捕的第二天，提篮桥监牢又把政治犯引渡到中国地界南市的公安局。我被叫出来，推上一辆卡车。刚坐下，“咔嚓”、“咔嚓”两声，我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分别与左右两边人的手铐在一起，谁也挣不脱。我左右看看，一排八人，第一个是交通机关的钱仲康同志，第二个是“缎子袍”张某，我是第七，最后一个是陈为人同志，就我一个女的。看这阵势，我猜想大概都是去交通机关时被捕的。后来，已先在狱中的周砥同志证实了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原来，总工会印刷机关有个叫黄文华（又名黄大霖）的人，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因为犯了错误，受到党纪处分，对党心怀不满。印刷机关因故停止印刷，组织上叫他把印刷机送往交通机关，在这中间他叛变了，钱仲康同志第一个被捕。敌人采取惯用的“捉老鼠”手法，布置便衣在交通机关附近，等候我们的人去，去一个捉一个，一共捉了八个。我们这一排就是按被抓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这次被他出卖的共有十几位同志，其中包括在总工会印刷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章夷白同志、还有傅子美同志（后病死在狱中），以及李××同志（我记不清名字了，建国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总工会的秘书长谭寿林也是他出卖的。

到了市公安局，坐进候审室。敌人第一个把钱仲康同志解开手铐带去审讯，一会儿听见里面一声声惨叫，撕人心肺，敌人对他下毒手了。钱仲康同志出来时，摇摇晃晃，上衣敞露着，胸部被打得一片血红。他抬头挺胸，用坚毅的目光朝我们扫射一眼。那神情、目光告诉我们，他经受住了考验。这位店员出身、个子

不高忠实厚道的三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在我心中顿时显得十分高大雄伟，我不由得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更鼓起了我与敌人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接着，敌人带走了第二个——姓张的，我们叫他“缎子袍”。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深。一九三〇年秋天，我接到组织上要我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通知，告别了培育我两年多的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赵世兰、周纫兰两位姐妹一起，转道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三天后，一个身穿缎子袍的男人，长高个子，自称姓张，来到旅馆和我们接头，带走了我们的履历，以后党组织就分配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觉得他油腔滑调，不象一个老实人，就叫他“缎子袍”。

这个“缎子袍”进去后，里面悄无声息。没多久，他浑身发抖着出来了，没有走过我们面前，被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我想，这是一个不妙的信号。

正当沉思的时候，两个豺狼走到我面前，一声嚎叫，打开了我的手铐。为什么第三个就审讯我呢？我稍思索，作出判断：一定是敌人认为我是女的，软弱，要从我身上突破。“休想！要当共产党员就不是软骨头！”我鼓励自己。我知道，背后战友们的双双目光一定在注视着我。我从容地整整衣服、理理头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去。我要用我的行动，让党放心！让战友们放心！

走进审讯室，有三个家伙坐在桌子后面，一个个板起面孔。面色铁青，下面站着三五个打手，袒胸露臂、虎视眈眈，旁边摆着几件吃人的刑具。我顾不得细看，用厌恶的目光斜视着他们。一个家伙高声发问，我仍按前次编好的话说了一遍。这个家伙突然假装慈悲、细声细气地说：

“你一个女人，年纪轻轻的，有的是好日子过，干嘛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处？共产党就会欺骗你们这些青年，叫你们为他卖命。你还年轻有为嘛，难道不想想自己的前途？”

这是敌人惯用的花招。我想，他一会来硬的，一会来软的，目的是要我动摇或者暴露，我决不能上他的当。对他这套娇揉造作不予理睬，在心里说：“我的前途就是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这些法西斯的命！”

敌人见我不吭气，又冒叫一声：“别执迷不悟了，你的情况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共产党妇委的。”

这个蠢猪一句话倒露了马脚，我从来没有在妇委工作过，他们根本没有掌握我的情况。我心里有了底，更理直气壮了，便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不认识哪个妇委，我就是学生，来上海考学校的。你们干么欺负老百姓，乱抓人，赶快把我放出去！”

敌人见我态度强硬，恼羞成怒，猛击桌子，一声大吼“用刑！”下面几个打手饿狼般地扑上来，扭着我的胳膊，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弄到旁边的凳子上坐着，背紧靠着墙，将我的腿平放在前面的长凳上，再用带子捆紧我的大腿，用根大棒塞在我的小腿底下，然后在棒子下面垫砖。这叫“老虎凳”。我使劲挣扎，大喊大叫。他们一边垫，一边骂：“你这该杀的，招不招？”我咬紧牙关，忍受着痛楚。据说，男同志顶多垫七块砖就挺不住了。我被垫到第五块砖后，腿痛的揪心，浑身汗水淋淋，两耳嗡嗡作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苏醒过来时，两个彪形大汉正拖着我在院子里溜达。我双腿

麻木，失去知觉，动弹不了，他们就连拉带拽，不住地踢我的脚跟，嘴里喃喃地骂着：“你他妈不走，想变成瘫子怎的？”溜了几圈，我又被送进了公安局看守所的牢房。

## 接 头

进了牢房，看见周砥同志。她是我在莫斯科时的同学，因为她爱人柳溥庆同志还在莫斯科，两人通信，被国民党发现，所以抓进了监牢。

这牢房铺着一排炕，关着二三十人。靠窗户这头，是牢头占头，她一人占据两三个人的地方。这牢头是个盗窃犯，是看守指定帮他监管犯人的。她比看守更坏，成天监视犯人们的举动，有点什么动静，就向看守报告。还要犯人服侍她，稍不如意，动辄打人骂人。她可算是国民党的奴才的奴才，大家都恨死了她。

炕的里头是一个尿桶，发出一股强烈的腥臭。一排住着二三十人，已经够挤的了，有人叫牢头让点地方给我，她不仅不让，还凶神恶煞，动手打人。周砥和另外两位姐妹就扶我过去，挤出一条缝，让我勉强把身子嵌进去。

两位姐妹见周砥认识我，就和我亲近，悄悄地攀谈起来。原来，她们是何叔衡同志的女儿（何实嗣、石础两位同志），当时在党的印刷厂工作。她们知道了我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便问起她爸爸的情况。我告诉她们，何老身体很好，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我常常见到何老。陆陆续续地把何老的一些情况告诉她们。周砥和实嗣、石础见我受刑很重，对我十分关心，帮我打饭，照顾我起居，拿钱给我买药，买食品。大约一星期后，实嗣、石础被释放出狱了，她们临走时把身边仅有的十几

块钱留给了我。

周砥同志因怀了孕，自己受尽牢狱生活的折磨，健康状况不好，但仍然细心照顾我。她与外面有联系，是她告诉了我叛徒黄文华向敌人告密，使交通机关受到破坏的情况。不久，她爱人柳溥庆的弟弟花钱买通了公安局的人，她被释放出狱了，我把钥匙交给她带了出去。

我与周砥、实嗣、石础同志在狱中相处时间不长，但我们同患难、共呼吸，情同姊妹、情胜姊妹。是她们的细心照顾，我的腿伤才很快好起来。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我心中蕴藏几十年，给我以慰藉和力量。

我的情况，除了周砥同志汇报给党组织以外，我还写信给李隐，托她转告赵世兰同志。以后，赵世兰同志和李隐同学都来看望我，给我带来了穿的、盖的东西。

赵大姐告诉我，我房间里的箱子被红头阿三（即印度警察，当时都用红布缠头）抄走了，文件、材料也落到他们手里。

党组织接到我送出的钥匙，曾几次派钱瑛、赵世兰等同志到我房间去取东西。但是，房东是个横蛮的女人，她坚决不让开门，态度还很凶。后来，赵大姐她们想法设计，找几位工人同志装扮成青红帮模样，闯进房东家，假说我是他的姘头，严厉地对她说：“人住在你这里，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快把人和东西交出来，不然砸了你的屋。”房东这才服软，一面赔情，一面说：

“东西被红头阿三拿走了。”原来，她早已向租界上报案，似乎租界上没有将我保管的东西移交给国民党，所以我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 悼 念

我的腿伤好了以后，用实嗣、石础留给我的钱，请看守去买油条之类的食品，分一些给她和牢头吃。也分给难友吃。一回如此，二回如此，看守和牢头便对我客气起来，让我出牢房去打水、拖地。水池在男监旁边，我便借机与男同志们接头。

在男监，我见到了陈为人同志和谭寿林同志。谭寿林同志一露面，使我大吃一惊：“他为什么也被捕了？”但来不及细问，只小声说：“我能带材料出去，你们快写。”

下次打水，几个小纸团从男监丢出来，我迅速拾起。回监后，偷偷打开，上面写的是谭寿林等新被捕的同志在狱中的化名和口供的简况。当晚夜深人静，同室的人都睡熟了，我趴在被子里，就着屋中吊灯的暗淡灯光，把纸团上的话誊写在皮纸上，撕开棉袍的一角，将它藏在棉絮中间。这种皮纸是我白天问其他难友要来的，纸很薄，拉力强，径揉皱，柔软，又不发出响声，夹在棉絮里敌人是难以发现的。

可惜，这个材料还未送出去，仅过几天，谭寿林同志就被解往南京，不久，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枪杀了。

谭寿林同志是赤色总工会的秘书长，我出狱之后，听他的爱人钱瑛同志说，当叛徒黄文华告密，总工会许多同志受到威胁时，党组织通知谭寿林同志离开上海去苏区。强烈的革命责任心驱使他继续处理一些未了的事，当天未走成，晚上就被捕了。（以后听章夷白同志说：谭寿林同志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捕的。先关在英租界四马路老闸捕房。四月二十七日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审讯时受了“老虎凳”重刑。五月中解往南京伪

宪兵司令部。)

## 工 作

在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我又被解往国民党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地址在当时的龙华飞机场附近。这里是国民党关押、枪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重犯的地方。我们一起从提篮桥监狱到公安局的八人，除“缎子袍”张某以外，又都一起进了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看守所是平房，中间是个长方形空院，女监两间，坐北朝南。敌人对女“犯人”看管比男“犯人”较松，房门在白天经常开着，可以自由出入，对面是男监三个弄，一弄面对空院、水池，女监的房门和男监一弄的窗户相对，我们站在炕上可以做手势和男“犯人”打招呼，三弄窗户面对晒衣场，也可以通消息；二弄夹在一、三弄之间，他的消息要靠一、三弄的同志转递，水池的左边有个特别监，是专关国民党的大小官员的。每弄就是一排，十个间房，每间房关八个人。

过几天传讯，我仍按着以前编好的那套口供说了一遍。敌人还问我妇委的情况，说明敌人还是没有掌握我的真实身份。敌人没捞到新的材料，仍送我回监，从此再未审问、用刑了。

在看守所遇到在莫斯科时的两个同学，一是陈秀英，在莫斯科叫曹孝芹，一是王兰英（即王民先）。陈秀英同志写条子告诉我，看守所里有党支部，她是女监的支部书记，组织上了解我被捕后的表现，把我编入了支部。

编入支部后，我发现王兰英几次在陈秀英同志还在早睡的时候，到晒衣场去和三弄的濮德治打招呼。濮德治在莫斯科时是托派

嫌疑分子，他们间的来往背着陈秀英同志，值得注意。我告诉了陈秀英，她观察了几天，觉得不对，和男监的同志联系，借形势恶化为由，宣布狱中组织停止活动，各人自觉地工作，实际上是用掉王和璞。不过以后也没发现他们二人有叛变行为。

我进伪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在总工会秘书处搞整理档案和文印工作的章夷白（慕勇）同志也被捕入狱。他黄埔军校毕业，高高个子，长得整齐，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北伐战争中，他作战英勇，两腿中弹，弹片留在腿里，成了二等残废，膝关节不能打弯，只能直着走路，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跛脚”。同他一起被捕入狱的，还有周绍文（肖伯唐）和爱人周小毛（李亦嘉）、罗重民（谢宣渠）、余××等同志。他们都是被叛徒黄文华出卖的。加上我们八人，成为当时总工会的一个大案子。

不久以后，陈秀英同志出狱，支部改组，女监支部由我负责。男监和我取得联系的，一弄是章夷白同志，三弄是张明同志。当时不知道男监支部由哪些同志负责，出狱以后才知道改组前的支书是焦光华同志，改组后的支书是罗重民（谢宣渠）同志，他也是留学莫斯科的学生。王明翰、张明、洪海帆（洪沛然，现在纺织部）等任支委。王明翰是刘晓同志的化名，张明是陈为人同志的化名。

我担任女监支书以后，仍照以前的办法，掏钱请客，给看守、警卫们以吃的，还帮他们织毛衣。同他们搞熟了，他们对我的监视也就松下来。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多多跑动，去水池打水，到晒衣场晒衣服，趁机与男同志联系。男监扔出的纸团，我拾回来，待夜深人静，躲在被子里誊写在皮纸上，夹在棉袍中，待机送出去。



后来根据同志们介绍的经验，我请看守买来柠檬，挤出水，用来写字，当时不见，干后用火一烤就显出字来。我还装肚子痛，要喝粥，请看守买来大米和蜡烛，用搪瓷缸熬成米汤写字，过后用碘酒一刷，字也显现出来。我用柠檬水和米汤写的材料，形同白纸，拿它包东西送出去，敌人一直没有发现。

送出去的材料，都是狱中同志的姓名、口供，有哪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等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就写了二十多位同志的情况，另一次写了八九个同志的情况。外面与我联系的是互济会的赵世兰同志。互济会得到这些情况后，利用被捕者的社会关系，协助救济和营救。我知道的如陈为人、陈琼瑛、张越霞等同志，就是我们在狱中提供情况后被营救出去的。

除了传递情报、沟通消息以外，狱中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关心同志、团结犯人，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坚定大家的对敌斗争精神。

当新犯人进来时，我们主动关心她，倒水给她喝，让好的地方给她睡，分东西给她吃，告诉她如何对付敌人的审讯，警惕敌人的欺骗阴谋，坚定她的意志，不要动摇。

陈琼瑛同志进监时，抱着一个小孩，缺奶，我们就凑钱买奶糕，使小孩正常成长。有的男同志因缺乏营养，脸肿腿肿，我们女监的同志就买些豆子，在蜡烛上煮熟，送给他们吃。

看守叫盗窃犯轮流洗被子，有的盗窃犯见到好棉絮就换走。我们发现后，叫周小毛同志也参加洗，维护了难友们的利益。

我们还给犯人念报，讲时事。过“五一”节和其他有意义的节日，我们看守所的同志们发起演话剧，念台词，讲故事，宣传进步思想，鼓舞大家团结战斗。

## 遇 险

在监牢里进行组织活动，既困难又担风险。警卫、看守成天监视，犯人成分又很复杂，稍一不慎就会被发现，因此既要有胆量，敢作敢为，又要谨慎机智，随机应变。

当我还没有用柠檬水和米汤写字的时候，有一次，有个犯人讨看守的好，向她告密说：“阿吴的棉袍里藏有东西。”看守向我走来搜查，我的心蹦蹦地跳。但我立即意识到，此刻我的一举一动，关系整个看守所里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危，我很快镇定下来。我坦然大方地将棉袍递过去，微笑着说：“请你搜！”看守将棉袍上下摸了一遍，因为皮纸柔软不出声响，她没有发现，我却不免出了一身冷汗。从此，我工作做得更细密，那个犯人遭到大家的痛恨，看守也不信任她，她在犯人中孤立了。

还有一次，黄昏时候，我刚接过章夷白同志递出的材料，正坐在炕上悄悄地打开看时，突然叫喊起“抄号子”，几个看守跑来查监。我急中生智，顺手抄起一个小本子，站在被子上，一伸手把材料压在高高的窗台上面，看守站在地上是看不见的。我紧盯着进了屋的看守，他们一一地翻我们的被子、蓆子，搜大家的口袋，没搜着什么出去了。等关门上锁后，我去取时，小本子在，纸片却不翼而飞了。事关狱里组织的安全和十几个同志的生命，我急的满头大汗，当即宣布：“我丢了一张写了字的纸，谁拿了！快拿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一个姓张的女孩承认她见我放了东西，取下看了，又放回窗台上。我们估计可能是被风刮出窗外边了。

院子里乱纸飞舞，但又不能出去找，商量后我和同志们就绑

了一些谎话，说这个过生日，那个有什么事值得纪念，一次又一次请看守去买面端进来吃。开一次门，我就趁机跑出去抓上一把破纸进来，但都落了空。夜间，警卫来回巡逻我怕他们捡着，就整夜不睡，站在门口，和他们聊天，时时盯住那些纸片。

天亮后，我看见一张随风飘舞的纸上有颜色，盯住不放，好不容易盼到放风，门一开，赶紧跑去捡起来。真是马克思在天有灵，它正是我望眼欲穿的“救命符”。女看守发现我捡到东西，起了疑心，正要盘问，旁边一位叫阿张的女同志随机应变地说：

“阿吴，那是我掉的钞票。”我随声附和：“是的。”两旁的人嚷嚷说：“请客，请客。”我也嚷着：“不请客不还。”众人听着阿张连声答应“请客，请客”一哄而散，看守以为真是如此，也就没有再过来。真是天佑人助，逢凶化吉，一场灾难平安地渡过了。

一次，赵世兰大姐送些陈皮梅进来，有几个拿去了陈皮梅，里面包着情报。看守见了伸手来抓，我急忙捂着盒子，说：“别忙，我分给你们吃。”我凭着经验，挑选一些真有陈皮梅的给她们，躲过了敌人的眼睛。

在监牢不到一年，天天受着死亡的威胁，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危险的一段时间，但也是我情绪最高、斗志最旺、阶级友爱最深、最令人难忘的一个阶段。我曾经请同志们带进一个刮胡须的刀片，藏在鞋底里，准备必要时使用，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好，女牢里没有一个同志叛变，敌人始终不清楚我的真正身分，最后安全地出了狱。

## 考 验

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区搞革命，每时每刻都是生与死的严峻

考验。在考验面前，无数共产党员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甚至献出生命，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也有一些败类，一遇危难，就浑身瘫软，跪地求饶，出卖组织，危害同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叛徒。

在敌人的酷刑下，监狱里，这种对比十分鲜明、强烈，连敌人营垒里一些警卫、看守也能分清好坏，敬佩那些英雄，嘲笑那些软骨头。

我被解到龙华看守所之前不久，党的优秀儿女何孟雄、胡也频、李求实、林育南、恽玉堂等同志就在这里慷慨就义，英勇牺牲。他们的英雄行为，警卫、看守都为之悄悄传颂。

何孟雄同志是被叛徒出卖被捕的，入狱后，敌人对他残酷拷打，百般折磨，但他英勇顽强，始终不屈。一次，敌人在审讯时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何孟雄同志义正词严地驳斥：“我们党内有缺点、有错误，经过斗争可以克服，你们抓住这一点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党不象你们的国民党，你们是反人民的。我们的党光明正大，越斗越坚强，你们的党才是这一派那一派，互相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你们不要希图共产党有缺点就会失败，那是幻想！‘刮民党’才会被历史所淘汰！”

临刑前，何孟雄等同志从容不迫地将自己的东西分给难友，然后拖着沉重的镣铐，相互扶携着，鼓励着，一路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地仆倒在血泊中，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何孟雄同志被捕的同时，他的爱人也带着两个小孩入了狱。每天早晨，大孩子都要跑到三弄男监的窗户下面叫：“爸爸、爸爸！”和他爸爸说几句话，何孟雄牺牲的那天清晨，孩子依旧到

窗下呼喊“爸爸”，连叫几声都无人答应，便哭着回来告诉了妈妈。孩子嚎啕痛哭声震四方，看到这悲惨的情景听到那撕人心肺的呼声，无人不落泪，整个牢房充满着悲哀。同志们静默无语对烈士们致以无限悼念。

看守所的看守还告诉我们，被枪杀的人里面，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女英雄。人长得美丽又聪明，行刑之前看守长点到她的名字时，还不住地摇头，表示不忍。及至行刑，一个士兵不忍将她打死，有意射偏，她肩部负伤后，叫了一声，踉跄着又呼口号，被另一刽子手补了一枪，将她击倒在地。看守说着，直为她惋惜，她那里懂得共产党人为真理献身，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呢！

与何孟雄等同志相对照的，是可耻的叛徒向忠发和罗绮园。

向忠发是湖北省一个摇划子的。由于唯成份论的思想，向忠发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他掌大权后，很快腐化，利用公款，喝酒、打牌、嫖女人，影响很坏。

任弼时同志离沪赴苏区后，恩来同志派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琼瑛同志住进向忠发家，进行帮助。陈琼瑛同志及时将向的腐化情况报告党组织，党组织便决定派向忠发赴苏区。时间在一九三一年端午节之后。向忠发接到通知，当天不走，却到静安寺路的旅馆与他的姘头杨秀珍过夜。次日晨，他离开旅馆去叫汽车，由于叛徒告密，就被捕了。

审讯时，还没施刑，向忠发就把大褂一脱说：“我自己来讲。”这个狗才就全部招供，诬蔑我们的党，出卖了中央机关和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的地址，并且带着敌特到处抓人。他们到恩来同志住处，扑了空，只见到了一个老婆婆，赶到秋白同志住处，秋白不在；赶到中央看文件的地点，抓走了张纪恩、张越

霞同志。赶到静安旅馆，向忠发使劲喊叫：“要抓矮的，不要抓高的，矮的最坏。”原来，杨秀珍长的高，陈琼瑛同志个子矮些。敌人可不管，将两人一起抓走了。

敌人在刚捕获向忠发的时候，即打电报向南京蒋介石报功，当时蒋介石已去庐山，南京又把电报转去庐山，正在这时，向忠发在受审中投敌报密，敌人又打电报到南京告诉蒋介石，在这封电报还未从南京转去庐山时，蒋介石已从庐山回电，命令敌人“立即枪决”。所以，第二天就将向忠发枪毙了。枪毙时，这个叛徒死死跪在敌人脚下求饶，但也没有挽救了他那条狗命。

陈琼瑛、张纪恩、张越霞等同志入狱后，都表现十分机智勇敢。陈琼瑛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孩远志入狱，装作家庭妇女，审讯时她把小孩拧哭，样子很悲惨。一个湖南籍法官见她是同乡，还同情地给她五元钱，让她买东西给孩子吃。她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

陈琼瑛同志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同志们对她印象都很好，因为她长的矮小，都亲切地叫她“小麻雀”。被捕时，她做杨秀珍的工作，叫杨不要乱供，只讲与向忠发的关系。杨秀珍在审讯中果然只说是向忠发的“姘头”，其余一概“不知道”。在狱中我们又尽量团结杨秀珍，她说：“看守维护看守，犯人维护犯人。向忠发下跪，我才不下跪呢！”尽管在狱中她与警卫、看守眉来眼去，调情骂俏，但从不做损害我们同志的事。对比之下，向忠发连这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的品质都不如！

再一个叛徒是罗绮园。罗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与他一起工作的有个女同志，叫阿张。罗看中她活泼，漂亮，还会唱京剧，企图占为己有，便将她丈夫调往苏区。不料，她丈夫在行进途

中被捕叛变，带人把罗绮园和阿张都抓走了。罗被捕后立即叛变，但不久仍被敌人枪毙了。

监狱也是战场。在这里，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趴下了，真正的革命者坚强地挺立起来。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近一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的思想、品质、性格、方法、能力等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更懂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与敌人进行更有效的斗争。

## 出 狱

我在公安局看守所期间，赵世兰同志把我的情况传给了我二哥李际间。他那时已从日本留学回国，他拿出一百块银元交给党领导的互济会，托人买通公安局的头子，答应放我。但是互济会的同志找了一个铺户做保，但因缺少经验，对公安局对保的人，没有塞钱。当赵世兰大姐和铺户代表来监保释时，公安局对保人多方刁难，借口我的案情重、保太小（指铺户的财产和社会地位不足以担保我这个重犯），不能释放。结果保释未成，白花了一百块银元。

转到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以后，二哥李际间又找彭一湖先生帮助营救。彭一湖写信给陈铭枢，陈铭枢打电报给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头子戴戡。一次，不知什么缘故，戴戡跑到监牢里来视察，问“有姓吴的没有？”我回答说“我是”。他把我叫出去，问有没有人向我敲竹杆要钱。当时在场的监狱长、看守所长、看守和警卫，一个个吓得脸色如土，面面相觑。我想反正白花钱的事已经过去，说了也不能出狱，反而会带来麻烦，就顺水推舟，回答说：“在我这里没有！”解了那些人的围，也赢得了警卫、看

守们的好感，为在牢里做工作创造了一些方便。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一声炮响，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上海市军民奋起抵抗，全国人民纷纷响应，掀起了抗日高潮，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欺侮的斗争精神。由于党组织和亲友的努力营救，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市人民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我获得自由，走出看守所，重见天日，投入更为艰苦卓绝，更为波澜壮阔的反蒋抗日革命斗争中去！

（一九八〇年四月）



# 回忆旅法华人大会

沈 沛 霖

(浙江省政协委员)

一九二三年在巴黎召开的华人大会，是由旅法共产党支部及共青团支部负责发动的。

一九二二年，北洋政府向法国借了很多金法郎，以为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的资本，双方签订了辱国条约。它激起了旅法广大群众的愤怒。是年春，广大华工、勤工俭学生，聚集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前面举行示威要求取消卖国条约，并要求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篆出面答复。陈篆拒绝答复，双方对持多时，陈篆竟勾结法国警察武装镇压，驱逐群众。群众虽一时被镇压下去了，但反对北洋政府的情绪逐渐高涨。不久，北洋政府以成立中法大学为名，骗使一部分勤工俭学生到里昂（Lyon）中法大学，不久，借故把其中一百零三名革命同学遣送回国，其中有陈毅、李立三等同志。

在群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旅法党、团组织，顺应形势的要求，发动旅法华人大会。一九二三年春，大会在一个戏院（已停止营业）里举行，到会群众（包括华工、勤工俭学生及一般留学生等）约五百多人。

大会开会前，由到会各党派，派代表先在会场左侧一小房间内举行预备会，代表国民党左派的有王景岐（浙江人、早卒），代表共青团（以国民党左派名义）的有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任卓宣、吴琪及我，代表醒狮派（国家主义派）的有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代表三民导报派（即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有张星舟（张厉生）、习文德等，共有代表二十四人，开会时推曾琦为主席（以他年龄最大），我任记录。

预备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决定大会的口号问题。以曾琦为首的国家主义派，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大会口号，当时周恩来同志以左派代表的身份（国民党左派及共青团），据理坚决驳斥，认为这种口号模糊不清，不能说明当时危害中国的实际对象。并提出大会的口号应当是：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一旗帜鲜明的口号，得到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但曾琦等国家主义派，顽固地坚持他们所提出的模糊不清的口号，而三民导报派则态度暧昧，闭口不言。经过多时的争执，最后提付表决。结果，赞成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革命口号有十二票；而赞成国家主义派曾琦等所提出的口号的只有十一票，本来可说已经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提案（口号）。但曾琦竟耍无赖，强调他要离开主席地位，参加表决，当时我以记录员资格，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予以驳斥。我说：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当双方票数相同时，主席才能参加表决。现在，赞成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大会口号的有十二票，而赞成你们提出的口号的只有十一票，所以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口号已经通过，没有理由再付表决。多数赞同。曾琦始哑口无言。于是

预备会议就决定以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口号交付大会讨论。

华人大会于当日下午二时正式开会，发言非常踊跃，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许德珩、刘清扬等均在大会发言，曾琦、李璜等亦在大会发言，预备会提出的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为到会大多数所通过，并经久不息地热烈鼓掌。反帝反封建气氛之热烈，为历次旅法华人会议所未有。这次大会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大会，成为对到会的华工、学生等进行革命宣传的大会。

在这次大会以前，旅法侨胞（包括华工、学生）还很少听过帝国主义的名称，更很少理解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危害性。通过这次大会，侨胞的觉悟提高了。国家主义派、三民导报派黯然失色，他们的谬论，没有多少市场了。从此，华工、勤工俭学生，参加革命组织或同情革命组织及其外围组织的，日益增多。所以这次大会播下很多革命种子，对尔后迭次革命活动特别是大革命运动，有极大关系。

# 党的优秀儿子——鲁生烈士

许 杰

鲁生同志，是无名英雄，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牺牲时才二十四岁……。

## 富有革命理想的爱国青年

鲁生同志，少年时代胸有大志，聪颖好学。他在湖北省黄梅县中学毕业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山河破碎，有志的鲁生忧心如焚。他反复吟诵岳飞《满江红》词，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他感叹地说：“从头收拾旧山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一代的神圣使命。”

一九三七年暑期，革命前辈董必武同志来武汉，接见进步青年，鲁生同志参加了，受到老前辈熏陶后，立志为抗日救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黄梅县成立“抗日后援会”、抗日工作团、少年抗日先锋队等，鲁生同志被选为后援会副主任，并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少先队党支部书记。同年参加黄梅县县委，被选为县委青年委员。

鲁生同志带领少先队下乡宣传抗日道理，发动群众筹建抗日武装。他瞒着家庭，挖开家里的钱窖，把父亲寄回来的五百银元连同妻子的首饰，统统的献了出来。在党的领导下，这支抗日救

国的武装筹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一天下午，鲁生同志刚到家，就被家里人捉住锁在后楼，他的妻子同情他参加革命，告诉他，父亲听说他参加共产党后，怕失去独子，断了传宗接代人，打电报给家里，“只要鲁生来家时，把他锁起来”。鲁生同志听了非常气愤：提笔写了一首小令：

“父！父！尊你是严父，我说你是笨蛋！无国那有家？血洒长天便是雨！去！去！谁也留不住！”这首小令表达了青年鲁生同志爱国志向和革命的热情与信念。在他妻子积极支持下，他离开家庭，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洪流中去了。

二十二岁的鲁生同志，离家后领导抗日先锋队锄奸杀敌，威震鄂东。日寇飞机经常从九江十里铺机场起飞，对九江一带进行狂轰滥炸，无数百姓惨遭杀害。为了打击日寇嚣张气焰，鲁生同志只身到机场探明情况，率领两班少年先锋队员，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潜入机场，摸到机场油库和两架飞机身边，同时放火，顿时烈焰冲天，轰声动地，七十桶汽油化为乌有。胜利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是中国青少年爱国爱民不怕牺牲的英勇行动。后来湖北省党组织决定，将少先队改编黄梅县抗日第四中队，鲁生同志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这支党领导下青少年武装，活跃于九江一带，屡建奇功，有一次苏联空军志愿军一架飞机，因故降落在黄梅县境界，鲁生同志得知后，连忙率领队伍保护这架飞机，协助它安全起飞，受到组织奖励和苏联同志的赞扬。

### 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党组织调鲁生同志任安徽省桐城县中心县委组

织部长，并带领一部分武装，深入敌后汤家沟等敌占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块地区，封建势力的统治很厉害，土匪横行，日寇不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地形复杂，敌伪顽匪都相当活跃的环境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何容易。但是，鲁生同志毫不气馁，他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和县委同志研究有关问题，分析敌友我的情况，做好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当地有一股打着新四军旗号的近百人的土匪武装，党组织确定为争取对象，交由鲁生同志负责这项工作。

鲁生同志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一九四〇年三月的一个上午，他只带两个随身人员，深入了匪巢。在席上，匪首方英问：“鲁先生来此有何贵干？”鲁生同志诚恳而坦然地说：“日寇占领武汉，日蒋不战不和、互相勾结，想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力量。桐东地区只有你们和我们两支抗日力量，我们都是日寇清剿的对象。国民党桂系部队不但不抗日，反而封锁桐北山区，想致我们于死地。我们之间面临着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局面。所以，我今天来想和你们共商抗日大计，把两支队伍联合成一支部队……”鲁生捏紧拳头说：“捏紧拳头有力量。”突然，一个匪头唰的一声拔出驳壳枪，对准鲁生的胸口说：

“姓鲁的，你想来收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便宜事。你知道它……不是吃素的，是不认识人的。”顿时剑拔弩张……。鲁生同志微微一笑，用手轻轻地拂了一下他那松乱的头发，他那又黑又亮眼睛里闪耀着逼人的正义的光芒，他从容地说：“人生可以流芳百世，也可遗臭万年。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共产党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们都是抗日部队，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我这

次来不是为争权夺利，只要有利于抗日，我鲁某当一名小兵也可以。大敌当前，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我们之间斗，不仅毁了我们两支抗日部队，而且会成为民族的罪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既有几十万新四军作靠山，又有全国人民给予支持，只要我们坚持抗日到最后胜利，就不失为留芳百世的英雄，请诸位三思……”方英听后，微笑地摆手说：“聆听高见，顿开茅塞。周队长把枪收起来。”方英又说：“天无二日，军无二主，不知你我如何联系才好。”鲁生从容不迫的慢慢坐了下来。对方英说：

“这个容易。我们成立新四军江北独立大队，下设三个连队，一二连归方先生、周先生领导；由我担任三连连长，大队长由方先生担任。我兼管大队政治工作。”那个动枪的周队长频频点头笑着说：“老兄高见，佩服，佩服……。”

谈判虽然成功了，有了这支抗日武装，没有站稳脚跟的根据地还是不行的。鲁生同志亲自率领独立大队党支部人员，深入到湖沼地区，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成立各种抗日组织，组织自卫队，建立区政权，乡政权。他一面整顿独立大队，一面领导队伍打敌伪，缴获了一些枪枝弹药，壮大队伍补充新战士。约略不到三个月，土匪成性的周队长（周小斋），因过不惯共产党军队的艰苦生活，在暗地里和敌人派遣来的特务勾结了起来。从内部鼓动叛变，企图谋杀鲁生同志，消灭独立大队。由于鲁生同志十分注意在连队建立党组织，把队伍掌握到了党的手里，周小斋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天傍晚，周小斋醉醺醺地回来，对他连队一排长周孝先说：“老弟，好日子快到了，你一心跟我干，到那边是不会亏待你的。共产党、新四军有什么好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用没

用的，在这里是活受罪。”周孝先知道周小斋要叛变，酒后吐真言。他立即将这个情况向鲁生作了秘密的汇报。鲁生同志表扬了周孝先这个新党员，并马上召开县委会研究了对策。首先将敌人暗暗派来的坐特周柏茂处决，切断了敌人与周小斋的联系。周小斋闻讯后，惊得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见阴谋败露，立即命令他的连队，急行军叛变投敌。周小斋急如星火，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敌营。由于士兵们只知道有任务，不知有什么任务走得那么急，急行军又弄得十分疲乏，便在路旁几棵大柳树下自动地坐下来休息。周小斋怒目圆瞪，向士兵大发雷霆“赶快走！不走任务完成不了。”正在他气急败坏地打骂士兵时，突然发现鲁生同志站在他的面前，他回顾四周，特务排已举着枪虎视眈眈的把他们包围起来了。鲁生同志走向在树下路旁的士兵，士兵立刻立正，鲁生挥动着手说：“周小斋叛变投敌，并妄图消灭独立大队，杀害大队领导，罪恶滔天，是民族的败类，他应该受到惩罚。同志们都是受骗的，你们都是愿意抗日的，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们都怒视周小斋。这时周小斋困兽犹斗，喇地一声拔出驳壳枪对鲁生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啷的一声，周小斋驳壳枪落在地上，周小斋被捆起来了。排长周孝先走到部队面前，义正辞严地揭露周小斋与特务分子勾结，企图谋害鲁生和大队长方英，把抗日独立大队搞垮的阴谋。战士们听了周孝先揭发，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枪毙周小斋。这个死心塌地的土匪，受到了人民的惩罚。

从此以后，独立大队变成真正的抗日部队。这支队伍保护了长江中游一带地区，使桐城县东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巩固陈瑶湖、青山水圩这块长江中游的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大队长



方英同志，在鲁生同志长期帮助下，表现很好，工作积极，担负起了大队长的职责，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遗憾的是，他于“皖南事变”后，日寇扫荡中，和鲁生同志一起壮烈牺牲了。

一九四〇年七月间，独立大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团第二大队，团长是林维先，第二大队大队长是方英。鲁生调任桐庐县委书记，兼挺进团第二大队政治教导员。由于有了这支队伍，——陈瑶湖这块身处长江中游的抗日救国桥头阵地站稳了脚跟，日伪不敢轻易下乡清乡扫荡，土匪也收敛多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时，大别山国民党桂系部队一七六师勾结地方保安团章千部，集中三千兵力，向陈瑶湖根据地扑来，扬言要活捉鲁生。这时第二大队驻守根据地。鲁生同志接到情报后，立即把兵力埋伏在湖河之间的芦苇丛中。敌人的先头部队乘八只木船向北开来，一时驳壳枪、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敌船打来，敌人连船带人全部葬身鱼腹。等到敌人大队人马来时，我们的挺进团第二大队早已无影无踪了。

鲁生同志声誉威震陈瑶湖地区，敌人对他胆战心惊。出高价要买鲁生同志的头。但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鲁生，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青年人。虽然他只二十三、四岁，但陈瑶湖一带人都爱称他为老鲁。婆媳不和找老鲁去评理，夫妻吵架找老鲁去调解。陈瑶湖一带人民没有一个不认识老鲁的。孩子们见到老鲁围拢过去拉着老鲁的手，摸着老鲁驳壳枪上的红缨。老鲁爱人民，人民爱老鲁，已经成为陈瑶湖一带人民的佳话。

一九四一年古历正月十三，鲁生同志为了保护皖南突围过来的同志，保护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和方英同志率领第二大队，

对付日寇三千兵力。日寇上有飞机，下有坦克，长江里有兵舰，海、陆、空联合向我陈瑶湖根据地清乡扫荡，企图消灭皖南突围过来的新四军和我主力部队，摧毁这块根据地。十三日拂晓，敌人大部队逼近陈瑶湖根据地中心——林家花园村时，鲁生同志亲自带着大队特务排与敌人奋战，拖住敌人主力，让皖南突围过来的大部队迅速转移，一连打退日寇数次进攻。特务排机枪子弹打完了，战士牺牲很多。在弹尽后，鲁生同志背部中弹。他把枪上的撞针卸下来抛入湖中，高喊：“壮士饥餐胡虏肉……”向敌中冲去，壮烈牺牲。

鲁生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到陈瑶湖一带，人民无限悲痛，有的泣不成声。为怀念人民贴心人，人民在鲁生同志牺牲地点——林家花园立起英雄碑——鲁生之墓。每年清明季节，陈瑶湖人民，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去鲁生同志墓前敬香烧纸，也有捧着鲜花插在鲁生坟上的，也有放声痛哭的。

鲁生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党的好儿女。他的光辉形象永活在人民心中。

（一九八一年六月）

## 张子意同志长征日记片断

这是我的长征日记片断。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岁月，这本日记只剩下断简残篇。日记写得异常简单，有时每日仅记一两句话，显得只有骨头没有肉。但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化石般的片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一九五六年回忆长征时，我曾写道：“我们是踏着同志们的血迹前进的，我们是跨过同志们的尸体前进的；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让同志们踏着自己的血迹前进，让同志们跨过自己的尸体前进。”我要永远循着毛主席指引的长征道路前进！

笔 者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于医院

### 一九三六年

七月十日 时雨时晴

本日军直率十七师到达唐牙沟露营。（五十里）

七月十一日 雨

本日军直及十六、十七师均到达西倾寺。出席十六师政治部部务会议。（九十里）

**七月十二日 雨**

本日十六师移鱼头寺，军直及十七师仍在原地休息。召集军政部务会议，讨论粮食问题，组织先遣工作团。

**七月十三日 晴，下午雨**

本日我军直及十六、十七师，上两坡，下高岭。到达绒玉宿营。掉队现象极严重，昨日我模（范）师亦到达鱼头寺。（一一〇里）

**七月十四、十五日**

我军在绒玉休息筹粮。十四日，我模（范）师及十八师均到达绒玉。筹粮无成绩。

**七月十六日 晴**

本日全军（缺十六师）由绒玉出发，到达王楼宿营。（六十里）

**七月十七日 晴，雨**

本日全军（缺十六师）到达哑公寺宿营，十六师到王楼。（五十里）

**七月十八日 晴**

本日全军在哑公寺一带休息筹粮，准备向阿坝前进。十八师获耕牛百头，粮食千斤。

**七月十九日 雨**

本日我军直及十六、十八师和十七师，模（范）师两师之直属队，由哑公寺向阿坝前进，到达作木沟露营。（七十里）

王震同志率模（范）师袭牛场未回，十七师随三十二军在原地未动。

**七月二十日 雨**

本军过两山，到达离阿坝一百二十里露营，我十七师及模范

师袭牛场无结果，亦由哑公寺出发跟进。（九十里）

**七月二十一日 雨**

本日我军到达离阿坝五十里地之山下露营，三十军同志送来牛一百二十头。

连日天雨，粮缺帐棚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七十里）

**七月二十二日 上午雨下午晴**

本日我军过二山到达阿坝宿营，山下天气极寒冷。

定出四天筹粮突击计划，预计筹粮五万六千斤，每人准备十五斤干粮。（五十里）

**七月二十三日 晴**

本日我三十二军及十七师、模范师均到达。十七师、模范师因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sup>①</sup>，致部队极疲困，两师减员达二百人。

下筹粮突击通令。仍在原地筹粮。

**七月二十四日 晴，微雨**

今日全军仍在西岸原地筹粮，教（导）团、军直成绩稍好，十六、十八师次之，模范师及十七师均无成绩，现共得粮约万斤。

草地雨季天气真坏，晴雨无定，冷热时变，犹戏子之一日百变无常态也。

这几天抓住收粮和改善给养、恢复疲劳的动员。

**七月二十五日 晴**

我军仍在上阿坝对河原地驻扎，今日架桥成，十六师全部渡

---

<sup>①</sup> 作者注，臭尸，是指先头部队宰马为食，剥去皮肉，留下骨架已发臭。我部队取骨架上的残肉而食之。

过河。

少数民族武装骑兵零星时出没，袭击渡河点及散朵人，伤数人。

七月二十六日 晴

今日二方面军总部到达阿坝，我军全部移过河东。军直驻中阿坝。（三十里）

七月二十七日 晴

今日全军在中、下阿坝休息筹粮。二军及三十二军在上阿坝休息筹粮。

晨召开各部长谈话会。

七月二十八日 晴

本军在原地筹粮。上午召开部务会议，检查和总结从甘孜出发后行军中的政治工作，甘泗淇同志出席。

下午到十八师，巡视一营之二个连，战士情绪颇高。

七月二十九日 雨

今日军直及十六师移下阿坝。

下午召开营长、教导员以上干部会。

七月三十日 雨

今日全军由下阿坝出发，向葛曲河前进，途遇大风雨雪雹，经郎垭到达离热诺廿余里地露营。（六十里）

七月三十一日 雨

今日经热诺牛棚，上山左手下坡走错了路，（本应向东，乃向北）到达山坡露营。分配各部人员，加强各师领导。（六十里）

八月一日（八一纪念） 雨

今日沿河上，折向南，到达箭步塘露营。

协同首长讨论十八师问题。

草地天气寒冷，虽入三伏，亦不能离皮大衣。（六十里）

八月二日 晴

今日我军（缺十七师）到达葛曲河露营。（过两个小山及水草地）十七师离我三十里露营。（一百里）

八月三日 晴

今日全军在葛曲河休息，进行节粮与卫生运动。

出席十八师排长、支书以上干部会，总结行军中经验与教训，开展反彭福祥及三连政指错误的斗争。

集合全军讲话与检查武器、卫生。

八月四日 晴

今日全军（缺十六师）向包座前进。十六师留葛曲河担负守备任务。我们沿河上，经三段碍路行三十余里，到牙磨河。出席十八师座谈会。（六十里）

八月五日 晴

今日我军经廿四马鞍腰，到达上色既塘露营。召开全军（缺十六师）首长及营特派员以上联席会。（五十里）

八月六日 晴

本日经中色既塘，到达下色既塘露营。到包座尚须二天行程。（六十里）

八月七日 晴

今日经严朵坝翻垭，前进二十余里露营。我们已胜利地通过了草地。（七十里）

八月八日 晴

今日经马旗子，到通松潘之大道，进至上包座宿营。

此地居民逃跑，房屋已非平顶而是木板盖斜顶。（七十里）

**八月九日 晴**

本日我军直及十七师，模（范）师，经中包座（十五里）到达下包座（三十里）一带宿营。

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四十五里）

**八月十日 晴**

本日我军在下包座休息筹粮。

召开政治部部务会议。

**八月十一日 晴**

今日仍在原地休息。

进入包座后，天气渐热，正午时只能穿单衣。

我们已胜利地结束了第一个战役，经过一月的时间，已进入甘南，开始进到了第二个战役阶段。

此地四五天可到罗塔、哈达铺，即汉人地区，人烟稠密之地。

**八月十二、十三、十四日 雨**

我军在下包座一带休息筹粮。

出席模范师政指以上干部会。（十四日）

召集部务会议，传达总政保障计划。

召集师级干部会。

**八月十五日 雨**

本日模范师出发，接守桥任务，其余在原地休息。

召集部务会议，总结各部长巡视工作。

**八月十六日 雨**

本日我军向甘南进，经救济寺，走十八里地宿营。十六师、十八师仍在救济寺之线宿营。（五十里）



**八月十七日 雨**

本日我军继续前进，经隘路，过六次桥，到达茶里公坝及俄界之线宿营。（沿河下）（七十里）

**八月十八日 雨**

本日前进因俄界公坝约十里处之隘路，有少数民族反动武装放枪为害，白昼不能安全通过，故即在俄界宿营休息。（十五里）

**八月十九日 雨**

本日仍在俄界休息，晚继进，由俄界前进十五里露营。通过卡子。十六、十八师均为水阻未来。

**八月二十日 晴**

本日我军直及十七师，向哇藏寺前进，到尚差二十里处露营。（六十里）

**八月二十一日 晴**

本日向银固花园前进，到毛也寺宿营。经石门万险桥，形势极险峻。（七十里）

**八月二十二日 晴**

本日我军到达纳子沟附近宿营，今日沿途有回族群众卖东西，此为一月来所仅见。（八十里）

**八月二十三日 晴**

本日我军到达旋窝宿营。（经纳子沟）。（七十里）

**八月二十四日 阴，微雨**

本日我军过一高山，下坡后即到大坝子，脱离山沟，进到平原汉人地区，人烟极多，是晚，到达麻子川宿营。极痛快之一事，是解除一月余脱离群众之痛苦。（九十里）

八月二十五日 阴

本日到达哈达铺，九军一部列队迎接。谈论一般地方情形问题。

召开部务会议，讨论筹集粮资政策与扩红。（三十里）

八月二十六日 阴

本日我军在哈达铺休息。

往保卫局（西北）讨论地方工作与具体运用新策略路线问题。

下午四时举行六、九军的联欢大会。

本日下午十六、十八师亦齐到哈市。

八月二十七日 雨

本日仍在原地休息。

昨晚召开师级首长会议。

今天下午召开全军党员大会。

九军出发，向荔川前进。

八月二十八日 雨

本日十八师开往岩昌，其余仍在原地休息。

参观十七师一营各连队。

八月二十九日 晴

今日我军直及十六、十七师向阎井前进，经荔川、八里庄，到达阎井宿营。市等于哈达铺，但更加萧条。（八十里）

八月三十日 晴

本日我军在阎井镇休息一天。

晨，集合全体讲话；政指以上（缺十六师）讲扩大红军与群众工作方法问题。出席十六师文书以上会议。

**八月三十一日 晴**

本日我军向礼县前进，到达马坞里宿营，本镇有反动武装卅余人，被驱逐。全镇百余家。（八十里）

**九月一日 晴**

本日我军到达礼县附近，前卫队部攻城未下，城内约有王均部一营。现已将城包围。早集合十六师军直训话。（九十里）

**九月二日 晴**

本日仍在礼城附近休息。

此地产麦、菽、包谷及一部分大米。梨子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比南方落后些。

下午移房子。（五里）

**九月三日 晴**

本日我军直及十六师移城东北陈家窑，齐家窑一带。

今日晨飞机来数次，王敌一旅来增援礼城，我因兵力未集结，未出迎击。敌进城。是日黄昏，我全部放弃礼城，退至东川一带。

（三十里）

**九月四日 阴**

本日我军仍在东川一带休息。我模范师已到。

**九月五日 晴**

本日仍在原地休息。

召开全军政指以上会议，报告目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我们的工作。

**九月六日 晴**

本日仍在原地休息。

召开部务会议，布置各部工作与订出工作计划。

**九月七日 晴，夜雨**

仍在原地休息。

扩红，筹资，均无成绩。

今日病，卧床。

**九月八日 晴**

仍在原地休息。

谈直属队工作问题。

**九月九日 晴**

本日军直及十七师移岩城，十六师移固城。

下午召开军直政指，支书，特派员联席会，检查工作与指示三天的工作日程。（十五里）

十七师以一营向永平镇，另一营率侦察连向礼城威力侦察。

岩城约百余家群众多逃跑，经过我们的工作后，现大部分回家。

**九月十日 阴**

本日十七师开永平镇，军直仍在原地休息。

晨与祥锋赤兴谈大胆运用统一战线问题，及组织地方武装。

发出组织工作计划及宣传教育计划。

起草目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九月十一日 雨，下午晴**

上午结束地方工作，责成总支及组织部检查军直三天工作执行程度，检查纪律，组织收容。地方部召集群众大会，请民伏，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部组织军直各机关的画壁队。召集侦察连支部大会，开展反土匪主义斗争，下午移永平镇集结。（四十里）

**九月十二日 晴**

本日上午，在永平镇休息。下午移红和镇。

我十六、十八师，将由固城取直道到此地集结，预计今天可集固城。（六十里）

**九月十三日 雨**

本日我们仍在红和镇休息，十六、十八师大部均已到。

上午布置军直政治动员。

下午出席模范师排长以上干部会。

**九月十四日 雨**

上午仍在原地休息，等待全部集中。

下午出发，向天水镇前进，到达罗家堡附近宿营。

今日我十七师之一营于罗家堡附近，俘获敌王均部二十一旅之十五瓦无线电台一部（由天水送十九旅部的），消灭敌步兵一连，俘敌四十，缴枪四十，此为当前伟大胜利之开端，士气百倍。

（三十里）

**九月十五日 晴**

今日我军由余家村出发，到达平南川宿营。出席十六师排长以上军政干部会。（五十里）

**九月十六日 晴**

今日我军经娘娘坝，李子围到达白纳夹宿营。（七十五里）  
我前卫师在李子围消灭敌一连。

**九月十七日 晴**

本日我军经高桥，大小水川坝，苟家店子到马家庄宿营。发政治命令。（九十里）

**九月十八日（九一八纪念）晴**

本晨我前卫师占领两当县，将保卫团全部消灭，缴枪六十条，衣三百套。

全军（缺十八师）到城宿营。（六十里）

今日午后六时，我十八师之一部，袭占微城，缴军衣百余套。

**九月十九日 晴**

本日我军（缺十八师）向凤县前进，我留此地布置工作。给十八师指示信。

**九月二十日 晴**

上午十时召集驻两部队班长、党的小组长以上的活动份子会，讨论两当工作。

下午出席卫生部会议。

晚召工作委员会谈话。

**九月二十一日 阴**

早饭后偕张苏出西门看地形。

召集工作委及后方机关，十六、十八师一、三营会议，检查工作，定出七天工作计划。

**九月二十二日 阴转晴**

上午本部全体人员回两当城。敌机来。

下午部务会议，报告半个月扩红突击运动计划。组织各区突击队。送大无线电到徽县。

**九月二十三日 雨**

分配各路突击队出发到永宁、显龙、杨家等镇。召集县工委谈工作。

**九月二十四日 晴**

本日召集供给，卫生机关会议各一次。

**九月二十五日 晴**

上午分配教导团学生与组织突击队。

下午率教导团突击队十二人到永宁镇。

晚出席十八师政治部部务会议，检查扩红与群众工作。

**九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召集教导团突击队会议，谈论扩红运动与发动群众斗争。分配九人到梁家哑，三人到永宁镇。

下午召集供给卫生机关会议，讨论供给、卫生机关的政治工作。

晚，召集永宁区突击队会议，检查扩红工作。（换头号派克一枝）

**九月二十七日 晴**

自永宁镇归即害流行性感冒，体温升至 $38^{\circ}5$ ，用福白龙注射，未起床。

**九月二十八日 晴**

本日服药，仍未起床。

**九月二十九日 雨**

本日稍好，但头昏四肢无力。

**九月三十日 雨**

给各扩红突击队关于最后突击周的一封指示信。

写信给各突击队长。

今日病愈而头甚痛。

（旧历中秋节）

**十月一日 阴雨**

从今日起（至七日止）进行最后扩红突击周。

与十六师政委谈突击周工作与战斗准备。

**十月二日 晴**

举行全县民众抗日大会。

写信给各路突击队。

李信来信扩红共二十四名外送十八师十名。

**十月三日 晴**

进行战斗准备与结束地方工作。

谈新兵政治工作问题。

解决保卫局案件。

**十月四日 晴**

本日我军直率武宣陆川由两当城出发，到达马家庄一带宿营。（六十里）

给各师指示信。

**十月五日 晴**

本日由马家庄出发到达李子园宿营。我武宣袭娘娘坝，（有敌一营）稍有缴获。张辉同志牺牲。（一一〇里）

**十月六日 晴**

本日我军经许家坝、大门镇，到达天水镇附近宿营。（九十里）

**十月七日 微雨**

本日我军由天水镇一带出发，在罗家堡与由盐关来之敌战，被敌截击大行李，我晏福生同志牺牲。是日到红和镇。（五十里）



**十月八日 雨**

我军本日到固城一带宿营，我总指挥部亦到。（四十里）

**十月九日 晴**

本日我军经上下店子到达渭河边之五十里铺（当地人叫五十铺，又名盘安镇）渡过渭水，在河边一带宿营。此地人烟颇稠密，但出麦少，杂粮多。（九十里）

**十月十日 晴**

本日我军在原地休息，进行扩红筹粮与整理部队的各项工作。

整理与健全扩红突击队。

检查新兵营工作。

**十月十一日 晴**

本日我军到达礼辛镇宿营。途遇敌机轰炸伤亡五六十人。晚，病倒，体温达40度以上。（五十里）

**十月十二日 晴**

本日我军到尚家河。我随十八师仍在原地休息。体温39度。

**十月十三日 晴**

本日我随十八师到达尚家河。

这一带居民危害军队，抢枪杀人，群众全不在家。（三十里）

**十月十四日 晴**

本日二时出发，经李家店子，直到通渭城宿营。我主力则经马家店子到东峡口。

城虽大而商业全无，人亦稀少。（七十里）

**十月十五日 晴**

本日常经龙阳镇到达蔡家镇宿营。我主力昨夜到此地。（七十里）

**十月十六日 晴**

本日我军在原地休息筹粮。卫生部伤病员亦由通渭城移来。

**十月十七日 晴**

本日我军经四沟峡（大休息后，下午三时出发）到达青江驿一带宿营，与九军遇。（一百里）

**十月十八日 晴**

我军移老军坡苏家堡之线。

红五团代表团来慰劳。（二十里）

**十月十九日 晴**

本日在原地休息。

晨，举行与五团代表联欢会。

召集营以上政治干部会。

**十月二十日 晴**

本日仍在原地休息。

进行物质给养保障的动员。

**十月二十一日 晴**

本日我军在原地休息，贺、任、关来老居堡，同往平凤镇与一军团首先会面。（三十里）

**十月二十二日 晴**

本日我军开新隆镇一带，我们同往将台堡一军司令部，于中途经清真总寺午膳。（九十里）

**十月二十三日 晴**

本军在新隆镇一带休息，与红一师三团联欢，并组织参观团。

**十月二十四日 阴**

本日在将台堡召集全方面军营以上党的活动分子会，报告新

的策略路线。

**十月二十五日 晴**

本日我军到达硝河城之线宿营。

规定连队及党内主要动员与教育内容是：（一）回民问题与对回民纪律；（二）给养与供给的保障。

（新→将三十里→硝十五里）

**十月二十六日 晴**

本日我仍在硝河城一带休息。

进行编制问题的动员和准备工作。

**十月二十七日 晴**

本日四时出发，到达穆家溶大休息。

我卅二军在袁家河，与平凤镇来之敌接触。

下午三时由穆家溶出发，达洪湾子前几里路的川儿湾一带宿营。（二十五里）

**十月二十八日 晴**

本日我军经木头沟，向阳明堡前进，十时到达木头沟前约五里以上的冯家庄宿营。（二十五里）

**十月二十九日 晴**

本日我军经阳明堡，向沟井子前进，模范师、十七师为右纵队，于红羊坊附近遇敌（胡宗南部）战，我左侧遇敌骑兵第六师，汤祥锋叛变投该师，敌骑兵十师进攻曹家洼之我第四师。

黄昏时我撤退经鸦儿沟到离红井子十里的相铜川宿营。（七十里）

**十月三十日 晴**

本日我军经刘家井，到达吴家庄附近大休息（约四十里）下午三时军直和十六师出发，经干盐池（五十里）到达陂坝上（三

十一日二时) 休息会见一军团队伍。(一三〇里)

十六师本晚因未得改道命令，未来。

十七师、十八师、模范师本晚十二时出发，向陈家湾取直，首次晨与我会合。

**十月三十一日 晴**

本晨出发，到陈家湾大休息，会见十五军团部队。到达麻春堡附近之董家堡子宿营。

我一军团之一、二师，及十五军团之一个团（参加战斗的一共仅四个团）与尾追我之骑敌第六师战，将敌全部消灭之。（三十里）

**十一月一日 晴**

本日，我军经罗家山到达海家湾宿营。

到方面军总指挥部。（三十里）

**十一月二日 晴**

我军本日开双河铺，我们到指挥部参加活动份子会。

朱总司令报告关于战争动员问题。

确定编制与干部问题。

**十一月三日 晴**

本日，我军在双河铺休息，我们返部，进行重新编制的动员和工作。

三、四日改编完毕。

**十一月四日 晴**

本日我军进到马营一带，进入战役准备位置。前卫四十九团与由海源向黑城之敌骑兵接触。

在中马营与下马营一带宿营。（四十里）

**十一月五日 雷**

本日仍在原地备战，进行战争动员与准备工作。

昨晚下大雪，今天仍未止。

**十一月六日 晴**

今日准备进行战斗，合击周、孔两师（未成），我军到双河铺附近集结，是晚，在李家长河杨家湾之线宿营。（三十里）

**十一月七日 晴**

（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中央政府成立五周年纪念）

本日我军仍在原地备战。

举行晚会，纪念十月革命节。

敌丁德隆师，进到下马营，侦察队到杨家湾附近。

**十一月八日 晴**

本日我军经吴家要险、杨家要险，到李旺堡东北之九牛转一带宿营。

**十一月九日 晴**

本日我军进到李旺堡、木家团庄、五百户之线筹粮休整。

出席四十九团政指谈话会。（二十里）

**十一月十日 阴、晴**

本日我军仍在原地休整筹粮。我率随军红校学生，经蔡家沟向预旺堡前进，到达扁木川宿营。（四十里）

**十一月十一日 晴**

本日到达预旺堡。会见刘参谋长。

晚到新庄子随校。召政治部人员谈工作问题。

**十一月十二日 晴**

本日随校开茅居井，我返预旺堡，到和尚铺总指挥部，讨论随校工作。

晚，率第四连于预旺堡宿营。

**十一月十三日 晴**

本日和陈率第四连，向茅居井前进，到达离该地十里之处宿营。总部亦到。

我六军往王家团庄配合作战未成。（六十里）

**十一月十四日 晴**

本日率第四连经茅居井新庄子，到达梁家河宿营。（七十里）

**十一月十五日 晴**

本日率第四连经虎家湾马伏川，到达甘里沟口随校宿营。

晚召集政治部谈话会。（八十里）

**十一月十六日 晴**

本日我到河连湾省委与后方勤务部，解决随校物质问题。会见富春、劲光、至诚等。

下午随校开木钵。

晚到甘里沟口总指挥部。

**十一月十七日 晴**

本日在总部停留一天。

下午参加总部党的特别小组会，讨论部队整顿与教育问题。

**十一月十八日 晴**

今日由甘里沟口动身，经环县（三十二军军部）新营湾，到达离木钵十里地宿营。（六十里）

我一、二、四方面军，今日集结准备消灭胡敌丁师。

十一月十九日 晴

(长征周年纪念日)

二、六军团的长征，从去年今日开始，今年今日结束——  
经木钵红大三科，到曲子附近张溪本校。

总结长征的胜利：

在整整一年内，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横扫湘、黔、滇、康、甘五省，前后冲破了敌人李、章、陶、李（云杰）、陈、樊、汤、郭、郝、万、孙、王等十二个纵队，二、三百个团的包围、追剿，进行了大小数百战，有名的如瓦屋场战斗、便水战斗、毕节将军山战斗、则章坝战斗、以则河战斗、来宾铺战斗、普渡河及其附近几次战斗和各次攻城战斗，俘获人枪各在五千以上。占领过辰（溪）、叙（铺）、新（化）、晃（清）、清（溪）〔湘省〕；江（口）、石（阡）、瓮（安）、黄（平）、修（文）、扎（佐）、黔（西）、大（定）、毕（节）、盘（县）、〔黔省〕；奎（乡）、赫（章）、寻（甸）、盐（兴）、牟（定）、姚（安）、盐（丰）、楚（雄）、祥（云）、宾（川）、鹤（庆）、丽（江）、巨（甸）、富（民）、镇（南）、普（朋）、中（甸）、〔滇省〕；定（乡）、得（荣）、稻（城）、理（塘）、白（玉）、〔康省〕；微（县）成（县）、康（县）、两（当）、〔甘肃〕等共四十余县城。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

- (一) 突击湘中，全国震动。
- (二) 横扫黔省，所向无敌。
- (三) 威振云南，龙云丧胆。
- (四) 追剿之敌，叫苦连天。
- (五) 克服天险金江。
- (六) 战胜雪山草地。

(七) 远出陕甘；全国红军会合。

(八) 长征胜利，英雄万古留芳。

于长征纪念之节日

十一月二十日 晴

本日休息一日、举行庆祝长征胜利纪念大会。

报告总结一年长征的胜利。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

从今日起，三天内进行开学与参战准备工作。（一）完成入学鉴定；（二）整理内务，整顿房舍、操场；（三）上三次课，主要内容：内务条例，武器拆卸、保管，礼节。其目的是实现六大要求。（四）准备十天粮食。

晚：军事政治测验汇报。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晴

继续进行测验；准备教育计划及教材。

三十二军，二军共来学生六十余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晴

本日仍进行开课准备工作与测验。

下午出席高级班第一次党的支部大会，讨论关于学习问题与选举支委会。

一方面军消灭敌丁师廖旅。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

今日举行第一次全校党员大会，报告随校创办的重要意义与随校党的任务。

晚上举行政治部部务会议，讨论第一周政治常识教育计划与内容，并解答为什么将工农苏维埃改为人民苏维埃及其阶级性。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 晚大风**

本日上午出席总支委员会，订出一周工作计划与会议内容及总支的工作。

下午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并有独立师剧社演剧。晚，政治部与李铨谈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晴**

本日我校移木家寨，二营（二、三、六连）仍驻杨渠张渠。

下午三时移动，集合讲对驻地居民关系与纪律问题。

上午参观团出发到三科参观。

**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日各连接课程表进行操课。

上午到高级班上课。（世界知识）

敌一〇六师（沈师）进攻曲子，因我独立师力量不集结，无很好准备，仓卒应战，致曲子失去。晚敌又退出曲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

本日我一、二、三、四、六连，开赴曲子参战，我率上级科、高级班，开木钵，与三科合并。敌机轰炸曲子附近十余次。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晴**

本日仍在木钵，整理后方机关与合编。

**十一月三十日**

本日高级班赴保安。

同高级班谈话，关于：（一）学习的重要意义及应注意事项；（二）关于二方面军内部学员的团结与互相帮助；（三）关于党内斗争与一、二、四方面军的团结。

随校在半月内，因作战环境关系，至今未正式进行训练。物

质亦未得到应有补充。

**十二月一日**

本日夜袭曲子未成。

**十二月二日**

本日到温东坪校部。

目前，学校的物质保障，成为中心任务，特别是发扬部队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一切困难来准备一个月的粮食和柴火，来马上解决套鞋，袜子，手套等迫切问题。

**十二月三日**

部队仍在原地以备战姿势休息，进行预备教育与整理组织内务，筹粮柴等。

**十二月四日**

本日我校由温东原移木钵凉水湾宿营。（四十里）

**十二月五日 晚室内温度降至0℃**

本日我校移驻殷家桥。进行整理内务房舍。

午，召各连长、政指谈：整理组织，内务清洁与物质保障。

巡视一、四连，内务清洁，一般的是装具安置不一致，不整齐，被服房舍不清洁，背包折的不整齐，枪架多未做好。室内布置不清雅，列宁室尚未布置。

须规定整理内务的一致办法。

须举行大洗涤与大扫除。

〔编后记〕这份珍贵的史料，张子意同志生前不同意用他个人名字发表，一直拖下来了。张子意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我们非常悲痛。为了纪念他，征得其家属同意，现予以刊载。

# 难以忘却的往事

——访李德生同志

本刊记者 石肖岩

前些时候，李德生同志在京期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写革命回忆录，是我们每一个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传下去，对我们的后代温故知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特别提到，我们党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党内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及时地把他们的经历整理出来，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无价的精神财富。

李德生同志，河南省光山县（今新县）人。他的家乡李家凹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天灾人祸今去明来，黎民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怨声载道。十一岁时，母亲不幸去世，父亲肩负不起全家老小的生活重担，他被迫自谋生路。开始流落他乡，学做裁缝，由于旧世道的黑暗不公，师傅对徒弟极为刻薄，动辄棍打辱骂。他忍无可忍，回到了家乡，在一户富农的家里当了个放牛的牧童。这时，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地主老财的刻骨仇恨。一九二九年，光山县闹起了苏维埃，贫苦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搞得

轰轰烈烈，李家凹也热闹起来，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人们扬起了头。李德生报名参加了童子团，不久，又参加了牧童工会。一九三〇年，随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不断壮大，十四岁的李德生毅然投身部队，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英勇冲杀。

当我们希望李德生同志详细谈谈他的革命历程时，他十分谦虚地说：“我个人自小从军，在党指挥下战斗，没有什么可谈的。要谈，我谈谈我印象深的一些事情吧。当时虽然缺吃少穿，但为了打倒地主老财，我们这些青年热情很高。打仗时，枪不好，子弹少，但不怕死，敢打敢拼。宿营时，身上盖点草，往地上一躺，就休息了。冬天的夜晚，对我们是一个难关，冻得睡不着，就烤烤火，或跑跑步，驱除寒冷。行军时，一口气就是几十里，冬天有时连鞋子也没有，还踩着冰凌走。有些困难是今天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苦，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心里都知道。可那时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悲观，没有人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而是只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我们干革命是为了全体穷苦人翻身，情绪非常乐观。那时候，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叫做《红军三大任务》，歌词大意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大家是这么唱的，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

李德生同志告诉我们，一九三一年秋，由于张国焘等人在鄂豫皖苏区实行错误的“肃反”，致使许多好同志不幸遇难。当时，“AB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帽子满天飞，逼、供、信十分盛行。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三十二团那个营，排长以上的干部都遭到了诬陷。有的同志被反绑在板橙上，用麻绳勒住大姆指，用棍棒撬开嘴，用长嘴壶往里边灌辣椒水，受尽了种种严刑逼供。即使在这样一时黑白不分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还表示了坚定的

革命信念。他们相信党，相信苏维埃政权，没有对革命抱有一星一点的怨言。李德生同志说，这是我党历史上张国焘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时间不长，危害却极大。我那时候是一个战士。当时全营还侥幸留下了一个排长，因为他刚从外单位调来。这位同志很快地担负起了营长责任，又率领着全营战士冲锋陷阵。

说到这里，李德生同志对我们说，我常常想到一件事，革命的漫长道路上，有许许多多好同志牺牲了，就我自己的不少战友，我就亲眼看到他们先后默默地倒下，没有留下一点东西，甚至有的安葬在荒漠的原野上。对于这些无名英雄，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宣传宣传呢？记得我刚刚加入红军时，由于年纪小，懂得的东西很少，有个叫夏公富的班长热心地帮助我，他知道我是牧童出身，根子正，有阶级感情，就告诉我，要革命就要为无产阶级奋斗，为穷人奋斗，要实现这个奋斗，就要跟着共产党，党是带头人。他的话里没有多少词，可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共产党好，党员是红军中的先锋和模范。在他的启发下，我才认识到了党。以后在部队行动中，他教我怎么行军打仗，帮我背枪；宿营时又把洗脚水打到我的跟前。这些事情今天看来虽然都很小，可那时却和旧军队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红军是有着完全平等的官兵关系。一九三一年，我经过他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夏公富同志后来担任了排长、连长，三二年年初打固始县豆腐店子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光荣牺牲了，当年才不过二十岁出点头。他很年轻，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默默地献了身，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呵！象这样的同志有很多很多。又如三二年秋打湖北重阳辛集，我所在团的团长林维权同志牺牲了。长征到川西松潘地区，团长李相衡同志又牺牲了。抗战时期，牺牲了营长张效文，教导员毛

大洲。抗战胜利后，重庆停战协定刚刚签订，胡宗南就暗地从洛阳派了一个师到豫北孟县一带抢地盘，我所在的三纵七旅十九团被迫自卫还击，给敌以重创，可是，副团长张林先同志牺牲了。后来，我担任了十七旅旅长，打襄阳时牺牲了团长苟在合、副团长杨毅；淮海战役中牺牲了团长杨寿山。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中，我所在师的副师长蔡启荣、团长曹国英、团政委张明甫同志也不幸牺牲了。以后，我所在的军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又有不少同志为保家卫国捐躯。这些同志，真可以称得上是为中华民族的利益前仆后继，而不惜个人的一切！

访问中，我们见到李德生同志左手掌残疾和头部伤疤，经反复询问才知道，在二十年的戎马生活中，他身受五处枪伤，几经险境，可李德生同志笑着说：“这是国民党、日本鬼子和伪军留给我的‘纪念’，好让我不忘记过去的苦呵！”他又认真而严肃地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虽然只是一些个人的感受，然而在今天，我觉得有必要让青年们多知道一点。有的人对我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却以为这本‘经’要常念，不然，会数典忘祖的。对于这一点，也是你们《革命史资料》的宗旨之一吧。”对此，我们点头称是。

#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

高 军

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同工农劳动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在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从一九二〇年起，逐步认识到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象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一九二〇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就组织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酝酿。一九二〇年一月，陈独秀要避居上海，李大钊在送他到天津上船的路上又讨论了建党问题。

陈独秀走后，李大钊在天津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一个苏俄朋友家“集会商谈”，相互交换了对革命的意见<sup>①</sup>。这次会见被敌探发觉，第二天在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为了防备敌人破坏，李大钊马上通知与会诸人注意后，便立即返回北京<sup>②</sup>。

---

<sup>①</sup> 李大钊在此之前已经和苏俄朋友建立了联系。据穆勒《在革命烈火中》说，一九一九年夏李大钊就同俄共党员H·布尔特曼在天津建立了联系。布尔特曼后来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主席。见彭宏伟等译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原载《远东问题》，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又见穆萝节译的《国内战争时期苏俄与东方邻国》，第三九一页。

<sup>②</sup> 见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章志致张鸿藻、董振修》的信。

李大钊返京后，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党。他和邓中夏等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于是，一九二〇年三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sup>①</sup>。在这之后不久，李大钊积极着手建党工作。他根据近代国际国内政党建立的作用与经验，尤其是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认为要组织“民众的势力”，“从事革新的运动”，实现“中国彻底的大改革”，“中国C派（即共产主义者们）的朋友”，现在急需组织一个“坚固的精密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他说，建立这种团体并不是孤立的，“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sup>②</sup>

一九二〇年三月间，共产国际派威金斯基和马马耶夫、萨赫雅诺娃，随带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等来到中国。据说他们的任务有三：“第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第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第三，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并挑选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sup>③</sup>。他们先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介

<sup>①</sup> 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在党发起创建后，大都成为北京党组织的成员。

<sup>②</sup>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二卷第二期。

<sup>③</sup> 见（日）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历史》日文版第五卷，第六二〇页。又见彭宏伟等译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原载《远东问题》一九八〇年第四期。此文讲威金斯基等来中国任务有三：一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二是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三是考察是否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绍与李大钊见面。李大钊邀集许多进步人士与他们座谈，并举行欢迎会、讲演会。李大钊曾与威金斯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的意见。四月，他介绍威金斯基等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把马马耶夫留在北京帮助建党工作。

威金斯基等到上海后，由于是李大钊介绍来的，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陈独秀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他从北京避居上海后，并没有灰心，相反，准备大干一场。他曾提出：“现在如不能用武，就改用文”<sup>①</sup>，以启发教育人民，准备革命力量。因此，他把《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改弦更张”，大谈政治，宣传社会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sup>②</sup>，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sup>③</sup>，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应当把资产阶级统治者手里的权利夺过来<sup>④</sup>。为此，他用了很大精力去研究劳工问题及如何提高工人的觉悟问题。他亲自到工人中去，并用通俗的语言来启发工人，说明“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sup>⑤</sup>。一九二〇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陈独秀领导在上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他们不仅在《新青年》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专刊，而且还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上海药业友谊

① 见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章志致张鸿藻、董振修》的信。

② 这里提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

③ 见《本志宣言》，《新青年》七卷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

④ 见《告北京劳动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晨报》。

⑤ 见《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七卷六号，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发起召开了“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会前曾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设立了专门筹备机构，陈独秀被“众推”为“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顾问，在筹备会上被特请演讲劳工问题”<sup>①</sup>。这次庆祝活动，虽然受到当时上海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的破坏，但在陈独秀等人积极努力下，仍然坚持在老靶子路的荒地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sup>②</sup>和《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sup>③</sup>。陈独秀这时乃是一个“不尚空谈”<sup>④</sup>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进行切实的革命工作，正在准备组织革命政党。

威金斯基的到来，使陈独秀非常高兴。他们“一见如故”，进行了多次交谈。威金斯基认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sup>⑤</sup>，需要组织起来，统一思想，进行切实的革命工作。陈独秀基本同意威金斯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他对威金斯基谈了他到上海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等一系列工作，介绍了上海文化思想界的情况。他建议威金斯基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们见见面，进行一些座谈讨论，并请威金斯基等介绍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威金斯基很满意陈独秀这个安排。

当时，在上海宣传社会主义，影响比较大的，一是陈独秀领

① 见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 见一九二〇年五月三日上海《民国日报》。

③ 见一九二〇年五月二日上海《时报》和一九二〇年五月三日上海《民国日报》。

④ 见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

⑤ 见周佛海《往矣集》：“扶桑箕影溯当年”，一九四四年九版。

导的新青年社，他和李大钊等组织出版《新青年》月刊，是“五四”后宣传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实际已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最有影响的众望所归的领袖。二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参加的还有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刘大白、沈仲九等<sup>①</sup>。他们出版《星期评论》周刊。这个刊物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指导和经济支持下出版的。他们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后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获得了盛名，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在这同时，还有国民党左派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就是邵力子等。这个刊物从一九二〇年起，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著称的。《星期评论》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停刊后，其主要成员大都转到《觉悟》副刊撰稿，从而更扩大了它的影响。三是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他们大多数是研究系的，他们在上海出版《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一起，曾同情五四运动，自命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成员，“五四”后，也大谈起“社会主义”来。一九一九年九月，他们还以“北平新学会”的名义出版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从一九二〇年九月第三卷起改名《改造》，由梁启超亲任主编），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曾大量登载有关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造成一种拥护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客观”地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假象。实际上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为了进行遏止而采取的一种“调和”的办法，目的就是使其“稳健化”，就是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

<sup>①</sup> 见一九五六年九月杨之华的回忆。

张东荪这类“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包括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都是有影响的，陈独秀就把他当作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来看待的。

在陈独秀的组织下，威金斯基很快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联系上了，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组织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曾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sup>①</sup>、沈雁冰、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座谈讨论是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有的当事者回忆说曾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sup>②</sup>。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大约在五月间，威金斯基提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个意见得到参加座谈讨论的多数同意，因为这也正是多数同志的想法。正如一九五六年七月陈望道的回忆所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但是，张东荪不赞成，参加过一次酝酿就退出了<sup>③</sup>，并且很快暴露了他的假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到了起草党纲时，其中有一条“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他借口说他不能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也声明退出了<sup>④</sup>，后来变成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国民党极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不久也退

① 又名震瀛

② 见一九五七年七月邵力子的回忆，一九五六年七月陈望道的回忆，一九六一年七月沈雁冰的回忆。

③ 见一九六一年七月沈雁冰的回忆，周佛海的《往矣集》中的《扶桑筭影溯当年》，一九四三年版。

④ 见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出了<sup>①</sup>。陈独秀等坚定不移。陈独秀为此先后召开多次会议来酝酿讨论，还给北京的李大钊、张崧年（申府）去信商量，定下党的名称<sup>②</sup>。大约在这年七、八月间<sup>③</sup>，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召开的一次会上，根据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的精神<sup>④</sup>，大家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推选了陈独秀为党的书记<sup>⑤</sup>。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就这样首先在上海建立了。这就是后来人们通常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sup>⑥</sup>，或叫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sup>⑦</sup>。

关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时间说法很多。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运动》和米夫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说是一九二〇年初；一九二一年党的“一大”后写的一份材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是一九二〇年中；一九五四年李达给上海革命纪念馆的信、一九六一年七月沈雁冰的回忆、陈公培的回忆和周佛海的《往矣集》中“扶桑笈影溯当年”说是一九二〇年夏；一九二四年中共中央妇女部的一个报告和一九五六年九月杨

① 见一九二五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一九五六年施复亮的回忆，陈公培的回忆。

② 据一九七九年九月张申府回忆说，“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间，陈独秀给我和李守常写信，主要是谈建党的事，其中谈到党的名称问题，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认为就叫共产党，随即给陈独秀回了信。”

③ 据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转引的材料说，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一七日，在北京由维连斯基—西比亚科夫（系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是由他负责派遣威金斯基等到中国来的）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苏共党员会议，会上特别指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具备客观条件。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由威金斯基还有斯托扬诺维奇、马马耶夫、佩尔林等帮助下，召开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④ 见李达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⑤ 1920年底，陈独秀应邀到广东作教育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书记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对党的组织的认识不一致，愤而辞去代理书记。交由李达代理书记。见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李达给上海革命纪念馆的信。

之华的回忆说是一九二〇年秋。还有，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一九二五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一九三八年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九五四年袁振英的回忆等，说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施复亮的回忆说是一九二〇年六月；一九六一年七月沈雁冰的回忆说是一九二〇年七月；一九六四年郑佩刚的回忆、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张申府回忆是说一九二〇年八月或七、八月间。这些说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有一定根据的。如果把上述说法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因为他们是根据不同的材料或经历不同而作的，因此就有所

⑥ 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一九三六年陈潭秋的《回忆党的“一大”》，一九五一年胡乔木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时沿用了这个名称，以后就普遍地叫起来了。实际上当时没有叫过这个名称，而是叫中国共产党。这有很多历史材料证明。一九五六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有一件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是叫这个名字。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中在回答蔡和森来信中提出要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时，也指出“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摆上海出版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一九二五年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也指出：一九二〇年成立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我党直接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共产党底历史与策略》也明确指出：陈独秀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是年九月，北京的共产党也开始组织起来”，“独秀到粤”也立即“组织共产党”，于是湖北、湖南及东京等处，都陆续组织起来了。一九二七年三月，恽代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也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俄国革命思潮逐渐输入中国，陈独秀先生首先接受了这种思潮，开始宣传、组织共产党，并领导青年努力做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周佛海在《我逃出了赤都武汉》中也谈到“民国十年暑假得到上海通知，定于七月开各地共产党代表大会”。一九三〇年六月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也指出：“一九二〇年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董必武和尼姆韦尔斯谈话也谈到“一九二〇年五月，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李达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中，一开头就强调指出，“一九二〇年夏，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还有陈望道、施复亮、张申府等写的回忆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⑦ 见一九五四年六月《共产党》月刊“影印者说明”。

不同。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确实是有一个人过程，我们上面的概述就是说明这个过程。

关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最初成员的说法也是很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材料说：“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但未列名单。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提到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戴季陶及一女的共七人。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也说是七人，他提到的七人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提了八人，比葛萨廖夫多提了一个李达。在当事者回忆中，施存统回忆说：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陈公培回忆：有十几人参加”，除施存统提到的五人外，还提到名字的有沈玄庐、刘大白、戴季陶、沈仲九及一个女的。李达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和他自己，提到了七人。袁振英回忆说：有陈独秀、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李达、刘少奇和他自己，提到了十五人。邵力子、沈雁冰、周佛海回忆他们都参加了党的发起，沈雁冰和周佛海还提到了张东荪。张申府回忆还有赵世炎。郑佩刚、梁冰弦回忆他们也参加了，还提到有尉克冰<sup>①</sup>。另外，包惠僧回忆还有李启汉。林伯渠回忆他也参加了。上述种种说法，除了少数的是因为记忆出入外，大体上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多次酝酿

<sup>①</sup> 见海隅孤客（即梁冰弦）的《解放别录》中的“自由人”，一九五一年香港版，和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郑佩刚的回忆。

的发起过程。其中提到的戴季陶、张东荪，他们可能参加过酝酿建党的活动，但或许根本就没有参加组织，戴季陶可能表示过参加，但不久就退出了。还有郑佩刚、梁冰弦、尉克冰、沈仲九、刘大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不久就退出了。其中提到的金家凤、叶天低、刘少奇，可能是把青年团和共产党搞混了。金家凤、叶天低是参加主持青年团工作的<sup>①</sup>，刘少奇自己回忆是参加的青年团，转党是一九二一年冬的事<sup>②</sup>。综上所述，把记忆出入的和随即退出的除外，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达、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林伯渠等参加。上述的一些人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活动之后，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如施存统和周佛海先后到了日本，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陈独秀、李季、袁振英和沈玄庐到了广州，李季稍后又到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也很快到了广东。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的组织的发起人。在这同时，李大钊在北京也积极酝酿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他和张申府同陈独秀就建党问题不断交换意见，在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后，就明确分工：“南方由仲甫（即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sup>③</sup>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过程中，曾先后几次起草中国共产

---

①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袁振英的回忆。

②见《团结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人民日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

③见《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版。



党党纲草案<sup>①</sup>，但原件都已遗失。一九五六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一件《中国共产党宣言》，它是由英文稿译成中文的，根据译者<sup>②</sup>说明<sup>③</sup>，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制定的，“没有向外发表”，曾“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很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发起过程中曾起草的一份党纲。这个文件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第二是“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指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

<sup>①</sup> 见一九五五年李达的回忆，一九六四年李震瀛的回忆，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陈公培的回忆和施复亮的回忆。

<sup>②</sup> 这个文件是作为远东民族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社会主义者组”讨论用的，译者可能是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译者的英文署名是 Chang，即姓张的。从中国共产党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看，姓张的一是张国焘，一是张太雷，可能性更大一些的是张太雷，这个时期他一直担任翻译工作，译出了不少东西。

<sup>③</sup> 译者说明全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个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个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个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需〕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更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供〕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Chang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的；在生产工具为少数人私有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财产和货币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

第三是“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指出：“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一切特殊势力的根源，要是没有人能够聚集他的财产了，那就没有特殊阶级了。”

这三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理想。

第二部分是讲“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从内容看，主要是讲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文件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着重讲了两层意思：

第一，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用强力”“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打倒资本家的国家”。正如文件中指出的：

“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哪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而且指出：“阶级斗争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斗争也是一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斗争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

斗的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这种争斗的增长，是历史的法则。”

第二，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阶级争斗”，“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文件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为此，“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在如何夺取政权上，文件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里它是很强调“产业组合”的作用，而且还指出：“当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夺取政权后怎么办？文件指出：“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要继续，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这一部分是讲共产党要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泛的劳动群众，积极向资产阶级开展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

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第三部分是讲“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着重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文件指出：“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斗争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影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斗争变作劳动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俄罗斯的阶级斗争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当着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状态是自然的。在一定的时期，这种俄罗斯的状态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状况在各国也是会必然的。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方式的。”

第二、“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文件指出：“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斗争，现在在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斗争，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既即时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的仇敌，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仇敌的目的。这就是说要用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

会，而这个阶级是要造成将来的世界，并受历史的使命，要成就这件事业。”“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文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就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但是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如反动革命的势力，都已消灭了。也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的实现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从上述内容可知，《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文献，也是我们现在见到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份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这个文献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发起时，就是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后，立即抓了三项主要工作：一是马列主义宣传；二是开展工人运动；三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 (1) 马列主义的宣传。

中国共产党发起后，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很重视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专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内容包括演说（实际

上是评论)、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读者投稿、时事、调查、通信、小说、诗歌、闲谈、趣闻等十一项专栏,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李震瀛、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是主要撰稿人。他们大都是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明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道理,如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资对立、工人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等等,文章短小精悍,很有说服力。颇受工人欢迎,被工人誉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sup>①</sup>

创办《劳动界》这样的刊物,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尝试。这个刊物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从而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为此,《劳动界》非常重视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在第二册上特别登了《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从第三册开始专设工人“读者投稿”专栏,从第三册到第十九册刊登工人来稿就有二十来篇。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普遍认识。他在这篇来稿中说:“工人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sup>②</sup>为此,他号召工人要一面做工,一面联络,把工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这说明工人阶级通过共

<sup>①</sup> 见《劳动界》第五册“通讯”专栏,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二日出版。

<sup>②</sup> 见《劳动界》第七册,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

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接受了马列主义，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个刊物在全国劳动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用马列主义团结教育工人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扩大马列主义的宣传，回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决定把《新青年》变为党的公开的理論性的机关刊物。从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开始，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实际上是《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第一篇政治宣言。他在文章中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点名批驳了胡适和张东荪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还批驳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明确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sup>①</sup>随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了批判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施存统、周佛海、李季等都发表了宣传马列主义观点的文章。

《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是译载当时搜集到的英、美、日、法、俄等国报刊及一些著作上有关俄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情况的材料。其中译载了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关于列宁的介绍，还有十月革命后有关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情况，主要译者有李汉俊、杨明斋、李震瀛、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同时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李大钊就发表

<sup>①</sup> 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

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sup>①</sup>。在这篇文章中，曾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和苏俄“劳农政府”的建立，还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等人的情况，其中列宁小传就有六页之长。

《新青年》旗帜鲜明的宣传马列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列主义流派，对于扩大马列主义的影响，从思想上巩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为了向共产主义者进行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推动党的组织的扩大发展，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即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又创办了大型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陈独秀在为本刊写的第一号《短言》中明确指出：“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洲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破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我们要从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非由生产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就是“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sup>②</sup>。这个短言，既是《共产党》月刊的代发刊词，也是初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

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一批初步探讨中国革命纲领问

---

① 见《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② 见《共产党》第一号，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初步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驳斥了“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区别，不能提倡社会革命”<sup>①</sup>的谬论，指出，中国不但有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有国际的资本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着最严重、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的贫苦农民几千年来就遭受着封建地主的最残暴的压榨和掠夺。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sup>②</sup>。他们反对当时的省自治运动，认为这是“缙绅运动”，“其结果真正的平民得不到一些好处，反而多一重压制，加多一层掠夺罢了。”<sup>③</sup>他们还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政策”和工会运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而主张效法俄国革命，实行以工人为主的武装起义，即他们称之为“直接行动”和“无产阶级突发的群众运动”，推翻反动剥削阶级的政权，“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然后无产阶级就借着“社会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sup>④</sup>。对于农民的作用问题，有的文章也谈到了，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sup>⑤</sup>因而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到农民中去开展工作的任务。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立即找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道路，

---

①② 见江春（即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二号，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③ P·生《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三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

④ 同③。

⑤ 见《告中国农民》，《共产党》第三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

但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共产党》月刊用了大量篇幅宣传共产党的知识，这包括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列宁的一些重要原著如列宁在俄共九大上的演说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也译载了。这些对于刚刚发起建立的共产党是很重要的思想武装，使党的发起成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提高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而且了解到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就是实际的榜样。

《共产党》月刊在宣传马列主义建党思想的同时，特别组织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共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此外还写了很多篇专门论文。这对划清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纯洁党的思想，教育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月刊还注意防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明确指出：“第二国际，是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是资本家代表的组织。而第三国际是有最进步工人的万国联合会。这些工人，是立志或者推翻资本主义或者死亡。”说明，第二国际“就要可耻的死去了”，第三国际“是被压迫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sup>①</sup>，社会主义者，要按照共产国际指出的方向前进<sup>②</sup>。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它发起建立时，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没有接受第二国际的影响。

---

<sup>①</sup> 见《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月刊第三号，一九二一年四月四日。

<sup>②</sup> 胡炎（即李达）《第三国际（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起起》，《共产党》第一号，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共产党》月刊，是当时国内各地社会主义者必读材料，还寄给旅欧的社会主义者学习，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也曾流传。它发行量最高达五千份，是半秘密半公开的刊物，每期的目录都在《新青年》上登载，在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影响较大，对于党的发起工作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给当时在法国的蔡和森的回信中就曾称赞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sup>①</sup>并曾设法把其中的文章推荐到长沙《大公报》发表。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还曾利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个阵地，作为党的外围刊物，在宣传马列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发起组织还曾利用上海“工商友谊会”办的《伙友》（前七册），向店员工人进行阶级教育，陈独秀曾为这个刊物写了发刊词。党的发起组织还开展了进行演说和办学校等多种形式的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不久，就在上海纱厂比较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一所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是李启汉等。这是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一种好形式，是和工人建立联系，发现和培养工人骨干的好形式。通过上述的宣传活动，为党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2）开展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经过向工人的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迅速提高，尤其是工人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和党取得联系，迫切要求党领导帮助组织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

当时，在上海组织工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帮助工人

<sup>①</sup> 见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新民学会通讯集》第三集。

群众摆脱旧式帮会和资本家操纵的“工会”的障碍。党的上海发起组织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教育工人不要为了一帮一派去互相残杀决斗，要团结起来共同去向“资本制度下底工银制度”去斗争。<sup>①</sup>对于黄色工会进行彻底揭露，告诉工人群众，“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sup>②</sup>使工人懂得，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

在党的发起组织的帮助下，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到会的有各工厂发起人七八十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俞秀松、李启汉等六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会议由海军造船厂工人筹备会书记李中为临时主席主持会议。他首先报告，指出发起本会的宗旨就是为“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之痛苦。”他说：“要达到这个宗旨，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这五种工会，都是妨碍我们工人底组织，我们很该留心注意。我希望我们这个工会，不和资本家握手，不和政客流氓握手，不分同乡不同乡，只叫限制绝对的机器工人。我们对于这个工会，都要负起极大的责任，去大大地联络，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工会。”<sup>③</sup>会议欢迎陈独秀等六位“参观者”为名誉会员，杨明斋、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演说。他们都称赞机器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好。说明工人只有组织起

① 见《谁叫我们这样苦斗》，《劳动界》第十七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五日。

② 见《真正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二册，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③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九册，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来才有力量，才能更好地和资本家斗，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陈独秀强调指出，工人的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体，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sup>①</sup>为此他说，“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sup>②</sup>会议讨论了“机器工会章程”（草案）。这个章程是由李中和陈独秀等一起起草的，包括六章三十二条，是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最早章程之一。会议还讨论了工人开会的问题和设立事务所及经募处等问题，陈独秀被推为经募处主任，李中、陈文渔、李杰、吕树仁、陆征章五人为办事员<sup>③</sup>。

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开过仅一个多月，各厂工人参加工会的就达到三百七十多人。于是，就在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近千人<sup>④</sup>。这是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并出版了工人的刊物《机器工人》。同年十二月，又改组成立了印刷工会，会员有一千三百多人，也创办了工人的刊物《友世画报》。同时，在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还成立了纺织工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为了推进工人运动的开展，一九二一年一月间，成立了一个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sup>⑤</sup>，专门组织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上海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就是由他们组织的。他们很早就进行准备，四月十七日，在渔阳里六号召开了由上海“十多个劳工团体”代表参

---

①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九册，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机器工会成立大会记》，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⑤ 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见闻》。

加的“五一纪念筹备会”。会议一致决定“发起‘五一’纪念大会”，并推定筹备员五十余人，准备在法租界开纪念大会<sup>①</sup>。筹备会向各报馆、学校、总商等都发出庆祝五一通知，要隆重地开展一次集会和游行活动。但消息被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知道了。四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就派了包探对大会筹备处渔阳里六号进行搜索，并无理禁止人民举行集会和游行。于是筹备会就临时把大会地点改在公共租界。但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极力破坏，就在五月一日这天，“警察和兵士都荷枪实弹，在大马路巡梭，公共体育场，除了派兵警巡察外，还架了几枝机关枪，如临大敌”。这样，到公共体育场开会是不行了，于是又改了地点，“一在杨树浦附近，一在车袋角附近，都是偏僻地方”，上海各界工人和学生很踊跃地参加这次纪念大会，杨树浦会场有一万多人参加，车袋角会场也有几千人到会，会上“发言的很多，并且都十分激烈”<sup>②</sup>。原计划开完会进行示威的，因会议开到五点多，并且下起雨来，所以，两会场都在高呼“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了纪念大会。这一天，还有上海工商友谊会、徐家汇南洋公学学生会举行小型纪念会<sup>③</sup>。上海各报或写纪念文章或报导纪念消息，在上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五一纪念大会”结束后，“五一纪念筹备会”立即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一“通告”，指出：“我们为纪念一年中最有意义的时节而组织的本会，承诸方面援助，不胜感谢，如今‘五一’已经过去了，本会当即宣布解散，所有因被压抑而不能实现的处所，誓将明年再来努力”<sup>④</sup>。

① 见《上海劳动节之经过》，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② 见《上海劳动节之经过》，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③ 见《劳动纪念日之上海》，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一年五月三日。

④ 见《上海劳动节之经过》，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表达了广大工人群众继续斗争的决心。

### （3）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后，立即于这年八月在上海又发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具体负责团的发起工作的有杨明斋、俞秀松、李震瀛等，办公地点在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青年团发起后，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付大庆、周兆秋、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文平等<sup>①</sup>。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在渔阳里六号开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这是一个专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学社是半公开性的，门口挂出牌子，报上登出广告，实际上，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学社由杨明斋具体负责，他和威金斯基的夫人库茨涅佐娃主讲俄文，李震瀛、沈雁冰教授英文，李汉俊教授法文，李达教授日文。主要是学习俄文，因为其中大部分学员是为了到俄国去深造而在这里补习的。所以，他们的主要课程，除了俄文外，还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同时参加上海党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在这个学社的学生，一般经过一段学习之后，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它又是一个青年团学校。

一九二一年春，这个学社的学员先后有二十多人分成三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任岳、王一飞、许之桢、付大庆、周兆秋、谢文晋、汪寿华、彭述之、华林、卜士奇、梁百达、廖文平等<sup>②</sup>。

<sup>①</sup> 见一九五五年一月许之桢的回忆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肖劲光的回忆。

<sup>②</sup> 见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肖劲光的回忆。

这个学社在一九二一年冬结束，其学生除了一部分赴俄学习，其他就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在培养党的干部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及其开展的各项工作，在全国各地产生深刻影响。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党发起之后，积极和国内各地还有国外（旅欧、旅日等）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联系，推动并帮助他们迅速建立了党和团的组织。一九二〇年九月，北京党的组织就开始酝酿，十月正式建立了党的组织<sup>①</sup>，先后参加的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张太雷、高尚德（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劫、黄日葵、朱务善、李骏等<sup>②</sup>，同年十一月，北京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十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谌小岑、张太雷在天津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up>③</sup>。一九二〇年九月，广州也开始酝酿建党，一九二一年一月，陈独秀到广州后，帮助正式建立了广东党的组织，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sup>④</sup>。一九二〇年秋，广东酝酿建团，一九二二年上半年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up>⑤</sup>。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湖北党的组织建立，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等<sup>⑥</sup>。在湖北党的组织建立不久，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十月间，毛泽东等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何权衡、易礼容、陈昌、彭璜、夏曦等马克思主义

① 见一九二一年七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② 见《“一大”前后》（二）第八十六至二二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月版。

③ 见谌小岑《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④ 见一九二一年七月《广东共产党的报告》和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

⑤ 见谭平山的讲话，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广东《青年团周刊》第四号。

⑥ 见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一年董必武的回忆和包惠僧《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见闻》等。



者核心。一九二一年春，山东党的组织建设，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sup>①</sup>。一九二二年八月，在山东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〇年底、一九二一年初在日本留学生中建立了党的小组，成员有施存统、周佛海等<sup>②</sup>。一九二一年二月在旅法的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了党的小组，成员有赵世炎、张申府、陈公培、周恩来、刘清扬<sup>③</sup>。同时，还以蔡和森、李维汉、罗学瓚、向警予、蔡畅、张昆弟等新民学会旅法会员，以李富春等工学世界社员和以赵世炎、陈公培、李立三、刘伯坚等劳动学会会员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核心。在此基础上，一九二二年六月，由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发起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sup>④</sup>，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一九二一年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转党，成立了旅俄支部<sup>⑤</sup>。此外，在香港<sup>⑥</sup>和四川重庆<sup>⑦</sup>也有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从发起到各地党组织建立的一年时间里，把各地共产主义者迅速地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sup>⑧</sup>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① 见一九五七年马保三的《山东党组织的发端》和一九五七年五月贾石亭给中国近代史所现代史组的信。

② 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施复亮的回忆。

③ 见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九年张申府的回忆。

④ 见一九八〇年四月傅钟的回忆。

⑤ 见一九七九年肖劲光的回忆。

⑥ 见一九六二年三月至一九六四年五月梁复然的回忆。见《“一大”前后》（二）第四五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又见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给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和南京都有了共产主义小组。转引自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原载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亚非人民》一九七一年第四期。

⑦ 见《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⑧ 见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驻赤塔色职工国际代表IO. И. 斯穆尔斯基给共产国际的信，信中说：“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十二名代表参加者代表了总共五十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

# “团结御侮文件”及其产生经过

金立人 陶德民

“团结御侮文件”是指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四先生联名发表的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旗帜鲜明地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十年代中期，在党领导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救国会运动迅速普及全国，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时隔一个多月，七月十五日，全救会的领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便联合署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这个小册子。它是在十年内战的局面下，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呼吁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一个历史文件。这个文件比之全救会的宣言、纲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表现在：

一、公开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国策。宣言曾批评国民党“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并指出，“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止境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sup>①</sup> 这批评无疑是很尖锐的。然而，“团结御侮文件”以公开信的形式，进一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蒋介石。文件写道：“蒋先生屡次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式准备抗日。……但是五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个主张是失败了，……而惟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已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蒋先生置亡国灭种的危祸于不顾，依然继续剿兵，继续内战，”将“不能见谅于天下后世。”<sup>②</sup> 当蒋介石正调集三十万军队，协助阎锡山进攻抗日先锋队，并令张学良、杨虎城向陕北红军后方进攻之时，在国统区公开抨击他的反动政策，并提出“真正的准备抗日，决不是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而是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sup>③</sup>，这对蒋介石说来，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四个月后，他便以此作为重要“犯罪事实及证据”，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君子”，并通缉正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陶行知。次年四月三日，又由江苏省高等法院提出《沈钧儒等案起诉书》，所列举的十条罪状中，有四条是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一文件的。

二、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言曾

---

<sup>①②③</sup> 分见《救国言论集》第10、143—145、144、11、150、148、153—154页。

提及：“共产党也已经修改了一部分的政治主张，表示愿和各党各派诚意合作抗日。”<sup>①</sup> 不过未予置评。而“团结御侮文件”中则明白无误地写着：“中国共产党于去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中国红军领袖也迭次发出通电，吁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sup>②</sup> 当时，在国统区的官方宣传中，充斥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诬蔑之词。四位先生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压制，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对于唤起广大民众、爱国人士以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共同起来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三、提出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以抵抗共同的民族敌人的问题。宣言是一般地要求各党各派合作抗日，而“团结御侮文件”则着重指出了：“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并且提出：“国共两党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挽着手，为着打倒北洋军阀为着打倒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吗？我们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民族敌人的威胁之下，这已经分裂了的两党，为什么竟不能破镜重圆。”<sup>③</sup> 文件结尾处又引用了曹子建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sup>④</sup> 以后，停止箕豆之争，共同抗日救亡，便成了许多爱国政党、团体和进步人士时常引用的一句口号。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团结御侮文件”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各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同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

<sup>①②③④</sup> 分见救国言论集第10、143—145、144、11、150、148、153—154。

《致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之公开信》，对这一文件和全救会的宣言、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毛泽东同志还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四位先生“表示诚恳的敬意”，并表示“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如此重视这一文件，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是如此仇视这一文件（如前所述），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一文件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联系到“七君子事件”以后发生的一些事变，如“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再度成立等，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文件所起过的一定历史作用。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时，需要重视这一代表了救国会运动正确方向的历史文件。

关于这一文件的产生过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胡愈之同志曾经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较早的记载要算是陶行知先生为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所作《团结御侮文件》一诗加的注了——“团结御侮一文件，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经我修改。与邹韬奋先生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字发表。”<sup>②</sup>这一记载大体上正确地反映了文件的起草和修改、署名和发表的过程。

然而，在文件的起草人问题以后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张仲实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邹韬奋先生的生平、其思想和事业》一文，其中指出：“团结御侮文件”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小册子，即是先生

<sup>①</sup> 《救国时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第四版。

<sup>②</sup> 《行知诗歌集》第248页。

所起草的。”而沈钧儒先生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为纪念陶行知先生逝世周年而发表的谈话中，则提到：“四人署名的‘团结御侮，小册子，……是由邹韬奋、胡愈之二位先生起草，适陶行知先生经过港地参加讨论，所以后来带到上海，即由我和乃器、韬奋、陶先生四人签字发表。”<sup>①</sup>这样，关于文件的起草人就有了三种分歧的说法。

最近，我们就这一问题请教了胡愈之同志。胡愈老认为沈钧儒先生一说“是合符事实的”。

根据目前的查考，我们以为“团结御侮文件”的产生过程大体如下：它是由邹韬奋、胡愈之两先生在香港所起草，陶行知先生曾参加讨论和修改。邹、陶两先生在港先行签字。而后文件被带到上海，由沈钧儒、章乃器两先生修正并加入签名，最后以四人联合署名的小册子的形式公诸于世。

---

<sup>①</sup>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第24页。